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考察當代廢棄物：自由、治理與生命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aste:
Freedom, Governance and Life**

指導教授：高國魁 博士

研究生：劉佑晞 撰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二月

February 2021

致謝

終於來到撰寫謝辭的時候了。完成這份論文，代表人生的一個段落就要結束、新的旅程即將展開，有一種如釋重負又興奮緊張的心情。

這段路走得比預想慢一些，但幸好我沒有放棄。一路走來，我得到許多師長、家人、朋友的幫助與鼓勵。若沒有他們，研究所生活恐怕會變得無趣且痛苦，此份論文也難有現在的面貌。

首先，感謝我的家人給我最大的支持與包容。看著同儕進入職場打拼，偶爾想起父母無意間流露的擔憂，難免心生愧疚。謝謝你們接受我的選擇，包容我的任性；更要謝謝你們在經濟與精神上的支援，讓我順利完成學業。

我在政大度過了愉快且充實的學生生涯，感謝在這裡遇見的每一位恩師與夥伴。謝謝黃厚銘老師、陳宗文老師、馬藹萱老師、陳信木老師和鄭力軒老師提供的助理或助教工作，這些是支撐我走過研究所生活的重要基礎。當然，更要感謝老師們的教導與鼓勵，那些在課堂與讀書會上收穫的，是我最珍貴的學術寶藏。謝謝佩怡助教對每一位研究生的用心，協助我們完成各項行政程序，還傾聽了不少我在學業、生活上的煩惱。謝謝我的大學好友靖恩、偉誌、乃卉、盈婕、祐瑄、廷榆、安佑，你們的陪伴讓不時現身的焦慮、困擾有了一個可以傾訴的地方。還有研究所的夥伴煒涵、佑涵、千瑜、孟庭、曉芳及學姐潘宣，雖然我不常在學校現身，但每回相遇的幾句寒暄、幾段討論最終都成為研究生活的養分。謝謝一直陪伴在身邊的宥儒，感謝她看見我所有的踟躕，總在我最自我懷疑的時候毫不吝嗇地對我說：「你很棒！」

感謝每一位在田野中遇見的夥伴。謝謝「看守台灣協會」、「O2 Lab 海漂實驗室」、「荒野保護協會台北分會」提供蒐集經驗資料的契機。同時，也感謝大方與我分享零廢棄生活的實踐者們帶來多樣的生活洞察。

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張君玫老師與萬尹亮老師為論文提供豐富、精準的修改意見。謝謝君玫老師的課堂與文字，總能恰到好處地接住我的想法與疑惑；謝謝尹

亮老師的回饋跟鼓勵，與老師的討論為此研究帶來許多洞見和啟發。

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高國魁老師。從大學到研究所，國魁老師一路陪伴著我學習、成長。謝謝國魁老師對我以及這份作品的悉心指導，每一次和老師對談、收到老師仔細的審閱與修改，都是我最珍惜的學習歷程。因而我總是期盼著，在無際的學海之中以老師為榜樣努力前進，盡可能地學習、吸收那些縝密、溫柔又謙虛的思想和態度。

論文的完成算是一個階段性的紀錄，將這段成長過程裡對自我生命的部分探索與反思藉由這部作品、這個主題來訴說。然而有關分類、秩序與生命的思索大概並不會就此暫停，因為那對我而言或許是根本且長久的課題。

祝願所有的生命在這浩瀚的宇宙中皆有其歸屬。

佑晞

2021年3月於政大



摘要

在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廢棄物對我們而言是既熟悉卻又陌生的東西。本研究旨在探討廢棄物與其行為背後的複雜系統秩序建構。本文採取多重理論的分析架構，分別從消費、治理與污染的三個層次考察廢棄物的當代意涵。

首先，本研究試圖釐清現代拋棄式生活形成的隱藏社會因素，論證指出較少被討論的廢棄邏輯實際上在支撐消費者社會的運作動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接著，分析將轉往垃圾治理的場域。透過分析當代垃圾治理，我們考察私人廢棄與公共衛生的關係，發現到了消費自由和垃圾管理的共謀。同時，我們反省將廢棄物問題轉嫁給技術的謬誤，因為此治理的觀點只是持續針對消費文化和生態自然的秩序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最後，跟隨廢棄物溢出的腳蹤，我們以生態循環的視角來面對汙染的問題，觀察廢棄物在環境中的流動與移轉。有別於治理視角之下的惰性客體形象，本文援引跨學科的經驗資料來證成廢棄物不可治理的能動性，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觀念秩序與物質生命的緊密交織。

總結以上論證，本文強調當代廢棄物的文化意涵和社會角色，而且超越人類剩餘與技術治理的視域，鋪陳秩序與廢棄之間的生命連帶。

關鍵字：廢棄物、垃圾研究、社會秩序、消費文化、垃圾治理、環境污染

Abstract

As a part of daily life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waste is something familiar and yet foreign to u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systemic orders in the making of waste products and acts. A multi-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adopted to interpret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s of waste and wasting at three levels, including consumption, governance and pollution.

First of all, the study seeks to clarify the hidden social factor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rowaway living, arguing that a less discussed logic of waste/wasting actuall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upport of the kinetic operation of consumer society. Thereafter, the analysis turns to the field of waste governance.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private waste and public health only to discover the collusion of consumer freedom and garbage management. We also reflect on the fallacy of passing the problem of waste on to a question of technique since the standpoint of governance only keeps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orders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ecological nature. Finally, following the spilling footprints of waste, we confront the issue of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ycling, observing the mo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wast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Unlike the image of inert objects under the governmental gaze, the discussion will demonstrate the ungovernable agency of waste by resorting to cross-disciplinary empirical data. The main purpose is to show that ideational order and material life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cultural meanings and social roles of contemporary waste, and elaborates beyond the horizons of human surplus and technical governance an unseverable bond between wasting and ordering life.

Keywords: waste, garbage studies, social order, consumer culture, wast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無處不在的人類「足跡」.....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從源頭思考.....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理論與經驗.....	6
第四節 章節安排.....	8
第二章 文獻回顧：垃圾研究的主流典範	11
第一節 概念的定義與釐清.....	12
第二節 污穢概念的建構：價值與秩序.....	14
第三節 秩序的邊緣：隱形的垃圾與群體.....	17
第四節 垃圾的治理：技術與政策.....	19
第五節 社會與技術的秩序.....	20
第三章 自由的秩序：拋棄式生活的形成	24
第一節 建立消費者社會：維穩的神話結構.....	26
1-1 選擇的自由：從生產到消費整合.....	27
1-2 無盡的欲望：現代消費主導特徵.....	30
1-3 消費的神話：自由與安定的需求.....	33
第二節 揭露拋棄式社會：生命時間的跨越.....	35
2-1 物質烏托邦：豐餘與過剩.....	35
2-2 預告的死亡：商品時效與計畫淘汰.....	38
2-3 時間的解放：拋棄用品與家務勞動.....	44
2-4 新鮮的永恆：賽璐玢與有機體.....	49
2-5 乾淨的大眾：衛生觀念與廢棄精神.....	52
第三節 消費以廢棄為本：新奇時尚的勝利.....	57
第四章 治理的秩序：垃圾的公私兩極化	60
第一節 從商品架到垃圾堆：浪費儀式的遺跡.....	60
第二節 公領域的治理：生命政治與公共衛生.....	64
2-1 骯髒的城市：傾倒與掩埋.....	68
2-2 大火燒不盡：焚化與能源轉換.....	72
2-3 分類再分類：回收與減量.....	74

2-4 公共技術化：計算與管理.....	79
第三節 私領域的治理：個人衛生與家戶垃圾.....	80
第四節 公／私領域的矛盾：私人廢棄的公眾問題.....	87
第五章 生命的秩序：廢棄物的流動生態.....	91
第一節 溢出的垃圾：失效的治理.....	91
第二節 再思廢棄物：跨界的流動.....	102
2-1 廢棄物藝術品.....	102
2-2 海洋廢棄物：塑膠污染與環境荷爾蒙.....	106
2-3 廢棄與污染.....	111
第三節 新廢棄文化？從拋棄到永續的消費生活.....	113
第四節 廢棄作為生命形式的標記.....	116
第六章 結論.....	118
參考文獻.....	123



圖目錄

圖一：賽璐玢包裝平面廣告.....	50
圖二：拋棄式紙杯平面廣告及部分內文.....	55
圖三：《生活》雜誌中有關拋棄式生活的文章.....	58
圖四：「看守台灣協會」在景美清潔隊試辦細分類的回收處.....	77
圖五：廚餘處理機廣告.....	85
圖六：海邊垃圾場.....	94
圖七：廢棄物堆積的海岸（一）.....	95
圖八：廢棄物堆積的海岸（二）.....	96
圖九：變質岩（ <i>Metamorphism</i> ）.....	104
圖十：塑膠珊瑚（ <i>Plastic Reef</i> ）.....	104
圖十一：海洋廢棄物.....	105
圖十二：茗荷附著的海廢拖鞋.....	108

第一章 緒論

「我們眼前最大的威脅，恐怕不比自己的廢棄物更光彩。」

“The most immediate threat, however,
may be nothing more glamorous than our own waste.”

Ronald Wright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2017

第一節 研究背景：無處不在的人類「足跡」

台灣作家吳明益在小說《複眼人》裡描述了瓦憂瓦憂次子阿特烈駕駛泰拉瓦卡出航，擱淺於一座「垃圾島」上的情境：「島看起來無邊無際，並不是泥土組成，而是五花八門，各種顏色混和的奇怪東西組成的，整座島浮動著一種怪氣味。」

¹ 阿特烈利用島上各式各樣「不太腐化的材料」製作捕魚工具和房屋，最後隨著這座「島」漂流，撞上了台灣東海岸。

這座阿特烈認為的「島」，其實是漂浮於太平洋上的「垃圾渦流（trash vortex）」，因為其中佈滿各式各樣的塑膠垃圾，也有人稱其為「塑膠濃湯」。1997年，Charles J. Moore 駕駛船隻行經北太平洋亞熱帶環流（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gyre）海域，發現自己被一大堆的塑膠垃圾給包圍了：「到處都漂流著塑膠垃圾，有瓶子、瓶蓋、包裝紙和各種碎片。」² Moore 的發現讓神秘的垃圾渦流進入了大眾視野，這塊區域後來被稱為「太平洋垃圾帶（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相比之下，「垃圾島」的描述就顯得並不那麼適合了，因為這一片垃圾渦流其實沒有明確的邊界可言。無論如何，海洋中確實充斥著各式各樣的人造廢棄物，其數量十分驚人。

儘管海洋科學家早在1970年代就開始研究海洋廢棄物（marine debris）污染，

¹ 在小說中，「泰拉瓦卡」是瓦憂瓦憂人用樹枝、藤條和芒草等製作而成的草船，根據傳統，瓦憂瓦憂的次子要在出生後第一百八十次月圓乘坐泰拉瓦卡出海（吳明益 2016：26、44-45）。

² Charles J. Moore 隨後投入研究北太平洋垃圾帶中的漂流垃圾，並成立組織 Algalita 海洋研究與教育基金會（Algalita Marine Research and Education）。引文出自其作品，轉引自 Freinkel 2011：175。

但情況並沒有因為科學家們的持續關注而有減緩的趨勢。2015年，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的海龜專家 Christine Figgener 與她的團隊，在哥斯大黎加外海捕獲一隻重達35公斤的雄性欖蠟龜。當牠被帶上船，研究員發現似乎有什麼東西卡在牠的鼻腔裡。他們將異物拉出一小部分進行取樣分析後，確定這是一根塑膠吸管，於是決定將它移除。其過程被紀錄成影片，欖蠟龜時而痛苦地閉眼、時而發出不舒服的叫聲，隨著吸管一點點被拉出鼻腔，混雜著血水汨汨流下。這支影片在台灣及其他國家的網路上廣泛流傳，掀起了一股「保護海洋，禁用塑膠製品」的環保風潮。

海洋並非人類的主要生活場所，卻隨處可見人造廢棄物；我們每天生活的土地更是早已被垃圾包圍，或甚至直接建造於垃圾之上。2011年，中國紀錄片導演王久良用作品《垃圾圍城》記錄下北京周邊幾座垃圾場的現況。垃圾場密集的程度，簡直像將北京城牢牢圍住似的。³ 如同 Italo Calvino 在其作品《看不見的城市》中所描繪的城市李奧尼亞（Leonía）一般。李奧尼亞城的人們喜歡追求新的事物，因此每天都丟掉非常多的東西以便給新事物騰出空間。丟出去的物品會被清道夫帶去城外堆疊；久而久之，「一座難以摧毀的廢物城堡包圍了李奧尼亞，佔住了每個方向，像相連的山脈一般（Calvino 1993：144）」王久良的作品既寫實又毫不客氣地揭露了一個現代的李奧尼亞城，同時也揭露了當代社會最不願面對的黑暗真相——垃圾。

在網路上搜尋關鍵字「環境議題」，無論是何種版本的「十大環境危機」、「人類面臨的十大環境問題」，一定都有「污染（pollution）」與「廢棄物（waste）」這兩項。⁴ 這些人類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by-product）」，通常被以最

³ 中國導演王久良（1976-）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自 2008 年起，他開始追蹤北京周邊垃圾污染的情況。歷時四年，跑了 13,000 公里，記錄下五千多張照片及六十多小時的影片，才終於完成了第一部環境紀錄片《垃圾圍城》。這部紀錄片在中國網路上迅速走紅，卻也因為踩到北京當局的政治紅線，很快就從網路上「被消失」了。這恰恰印證了「垃圾」是當代政府及部分利益集團試圖不斷掩藏的骯髒秘密。2016 年，王久良推出第二部環境紀錄片《塑料王國》，入圍台灣金馬影展最佳紀錄片與最佳剪輯，再次引起廣泛討論。

⁴ 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大體上包括：（1）環境污染（2）全球暖化（3）臭氧層破壞（4）酸雨（5）自然資源消耗（6）人口過剩（7）廢棄物處理（8）生物多樣性減少（9）森林面積減少（10）海

簡單粗暴的方式處理。「眼不見為淨」就是其中一種。我們將生活、生產的廢棄物交給清潔人員，理所當然地認為廢棄物會進入我們建立起來的垃圾處理系統，然後消失不見。垃圾場通常位於較偏遠的地區，就連處理的過程最好也要「眼不見為淨」。但事實是，這些被推出生產生活視域之外的廢棄物，並沒有如我們所願的消失無蹤。正相反的，它們總是現身我們為其設計的處理系統之外，在自然界中流竄，在生態圈裡潛伏。人造廢棄物不斷堆積，直到數量多到無法被自然消化，不時又闖回文明社會，帶來了「生態危機」。

人造廢棄物帶來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人類文明的遺骸已經蔓延到地球生態圈的每個角落，遍佈天空、山川與海洋。即便是還未有人類生活的地方，也可以找到我們的另類足跡——廢棄物。然而，文明社會的進步價值似乎從未將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所應承擔的倫理和政治責任納入考量（Latour 2019）。在面對環境的巨變與破壞時，往往要發展到情況嚴重的地步，我們才意識到或願意承認自己的行為帶來了何等災難。我們的行動總是不夠迅速有效，一樁又一樁的悲劇還在持續上演。

廢棄物污染與氣候變遷一樣，都是全球尺度下的生態危機，影響了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繁衍生息，包括人類自身。當人造廢棄物開始蔓延，從人跡罕至的地區透過食物鏈、自然循環等系統通道再次返回到文明社會中，甚至影響人類健康與生活時，我們才終於意識到廢棄物污染的嚴重性。當天空下起塑膠雨，當海洋不再純淨，當人類糞便裡、新生嬰兒體內，都含有非自然物質之時，廢棄物污染已成為難以被忽略的經驗事實。我們必須承認，在過去短短兩世紀以來，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影響不僅使得地球開始發燒，它也正被我們生產的廢棄物掐住咽喉，要窒息而死了。

據計算，全世界每年產生大約 20 億噸的都市固體廢棄物（municipal solid waste），其中至少有 33% 沒有被以友善環境的方式妥善處理。全世界平均每人

洋危機。雖然不同資料會有差異，但是基本上項目相同。資料參考整理自：RL Singh and PK Singh (2017)；Nichols (2019)。

每天產生 0.74 公斤的垃圾，但分佈不均，從 0.11 到 4.54 公斤都有。在高收入國家，儘管他們的人口只佔世界 16%，卻生產了全世界垃圾量的 34%，大約 6 億 8 千 3 百萬噸。到 2050 年，全球垃圾量預計會增長到 34 億噸。而且，在 2016 年全球因垃圾處理產生了大約相當於 16 億噸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主要來自開放式且缺乏監管的露天垃圾場。這些溫室氣體約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此外，對大多數國家而言，城市垃圾治理是一大財政負擔。特別是在中低收入國家，垃圾治理的預算約佔市政預算的 10%~20%。雪上加霜的是，這項預算往往還要跟其他的預算競爭，例如乾淨的用水、教育、醫療等。這使得中低收入國家在垃圾處理這條路上走得更加艱難。垃圾的氾濫與糟糕的治理所造成的影響對於貧窮人來說更是不成比例地嚴重。他們往往必須忍受被垃圾包圍的居住環境，許多貧民窟甚至就座落在垃圾堆裡（Kaza, Yao, Bhada-Tata and Woerden 2018）。總而言之，廢棄物問題不僅威脅自然環境，也牽涉到社會發展的全球性問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從源頭思考

本研究是關於人類廢棄行為及其產物的考察。廢棄（waste）在英文中可作為名詞與動詞使用，在本節的討論裡，「廢棄」一詞亦兼指行為和物件，動詞和受詞。⁵ 廢棄是一種動物性、自動性的行為，意即是人類與其他生靈共同享有的經驗現象；但同時，它也是一種象徵性、建構性的社會行為。廢棄行為與秩序建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廢棄行為，社會建立起一套有關潔淨與危險的制度，而當代的消費生活更是建立在廢棄行為的基礎之上。從行為後果來看，廢棄物的處理又是一個棘手的伴生問題，因為縱使看到了廢棄物污染的問題，我們依舊沒有「更聰明地廢棄」或「更好地廢棄」。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歷史階段，廢棄的社會性質依然保有過往的痕跡，因為文明與廢棄之間的關係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樣，朝向一個更理性化、更有效率的美好未來前進。相反地，筆者認為，當今人

⁵ 在其他更加具體的文脈中，讀者也將看到名詞的「垃圾」或「廢棄物」，以及特指行動的「廢棄行為」，相關說明詳見第二章、第一節「概念的定義與釐清」。

造的廢棄現象恰恰體現了文明社會最實在的混亂與無能為力，但同時也飽含有創造的可能與生命力量。現代人仍舊擺脫不了對於廢棄的恐懼與慾望，我們與廢棄之間有著超越消費經濟學與衛生科學的複雜關係。或許，廢棄在本質上具有一種神聖性，只是這個神聖性從宗教、氏族的光明神壇走下來，深埋進消費社會的世俗塵囂之中，隱藏到了神聖的黑暗背面。

人類的廢棄，與其物質特性相互交融，透過文明理性的現代治理，從社會影響到自然。「廢棄」在 Marcel Mauss 所描繪的誇富宴裡是自發並必要的、在 Georges Bataille 的普遍經濟中是基礎且弔詭的、在消費社會裡是隱藏卻根本的、在生態環境問題上更是暴露而急迫的。環境問題的惡化，將廢棄的研究從生產、消費的社會制度層次，擴展到了生態、行星的物種生命層面上。因此，筆者認為，我們無法忽視關於人類廢棄行為及其產物的具體研究，而且不能僅止於輕描淡寫。正如美國都市計畫技師、麻省理工學院城市與地區設計教授 Kevin Lynch (1990) 所說，人類對廢棄的態度與行為，是隨著社會制度的改變而不斷變化的。更何況，在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人類廢棄行為逐漸成為全球環境問題的潛在主因，從而使廢棄的學術研究更顯得重要且迫切了。

廢棄可說是生命的基本條件之一。在所謂的文明出現之前，過著採集與狩獵的智人祖先及其他人屬物種，就已經在廢棄了。隨著農業的發展、部落、王國與帝國的建立，人類不再逐水草而居，生產與生活垃圾當然也就不能留在身後置之不理。城市的發展帶動了人們對於居住環境的重視；技術革新改變了個人的生產與消費行為；污水及相關生活廢棄物的處理亦成為政府治理的效能指標。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自然要逐漸轉移、扣連至技術政策的層次，同時也成為環境工程等應用學門的研究對象。

技術與政策的反思性研究是重要的。我們當然要感謝環境工程專家針對廢棄物治理的系統優化。但筆者也認為，僅從科學管理的角度研究廢棄物顯然是不夠的。這樣的討論將我們與事物的關係限縮在固定的工具理性範圍內，單純將廢棄物問題視作是技術與政策的觀察和介入對象，進而限制了治理方案的選擇。筆者

相信，回到源頭思考人類的廢棄行為與秩序建構的關係將有助於拓展、加深我們對於廢棄現象的理解視野。

說起廢棄物，我們最常問：什麼材料應可以回收？什麼材料又不能回收？什麼材料可用來取代？總而言之，廢棄物要怎麼處理掉才能降低環境的衝擊？這類提問將廢棄當作消費行動的結果與副產品，是既成的事實，並試圖從處理端來思考廢棄問題。這使得廢棄與消費之間產生了論述上的斷裂。完全將廢棄問題轉嫁於政策處理領域，這某種程度上掩藏了廢棄在當代消費邏輯中扮演的基礎且重要的角色。導致我們很少追問：廢棄行為如何產生？廢棄與社會秩序的關係為何？既然廢棄使問題叢生，為什麼我們仍然深陷泥淖，持續不斷地、變本加厲地生產廢棄物？總而言之，我們與廢棄的關係為何？

本研究主張，要深入了解人類廢棄的社會意涵，必須探索消費社會中廢棄行為的各種型態與發展，同時思考廢棄產物與社會秩序、自然秩序的共生關係。我們希望回到廢棄現象的源頭上，探究人類的廢棄行為及其產物的邏輯和機制，描繪消費社會中廢棄的實質意涵，目的是希望闡明廢棄在當代所扮演的角色。循著廢棄物生成、管控、外溢的三階段路徑，本研究將分別從消費文化、治理技術、環境污染的三個面向來理解「廢棄」的當代意涵，從而指出廢棄與秩序、與生命的雙重交織性。

第三節 研究方法：理論與經驗

針對廢棄行為及廢棄物的研究涉及各個方面，既有具體實證的經驗研究，也有抽象思辨的理論考察。這些研究的豐富程度絕對是令人驚艷的。無論人類學、歷史學或社會學，已有不少學術前輩及各領域專家討論過污染或廢棄的相關議題，也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思想寶藏。

法國哲學家 Michel Serres、Georges Bataille、Jean Baudrillard、被喻為「後現代性的預言家」的社會學大師 Zygmunt Bauman，以及寫下人類學必讀經典《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的 Mary Douglas 等，都為本研究指引了廢棄思

考的道路。從廢棄的視角中，這些思想家們先寫下他們對於社會秩序的另類認識，再將目光轉向了人類與生態、物種與環境的大議題。

誠如上節所述，本研究試圖回到廢棄行為的源頭思考，以便從技術政策的科學層面跳脫出來，重新梳理社會人與廢棄物的吊詭關係和矛盾情結。這需要先清楚分析廢棄研究的多重理論路徑，釐清不同研究取徑對廢棄議題的描繪。對理論觀點的強調能夠提供對廢棄行為更全面、後設的思考。黃厚銘（2010）指出在以實證主義為主流的研究中，對「經驗」的認知往往是狹隘的，認為「經驗」應是科學的、客觀的，因此特別強調經驗現象對理論真實性的符應。然而，理論與經驗的關係不應該侷限為歸納的關係，理論的建構並非為了追求普遍的抽象法則。理論應當是為了提供一套具有啟發性的觀點，有助於我們如何理解經驗現象。換句話說，在廢棄的學術研究中，有多重理論路徑的交織，不同理論觀點都分別建立起對此議題的一種理解。唯有進入到理論的層次釐清廢棄在當代的意涵，才能夠理解經驗層次中廢棄行為之所以如此形塑的脈絡。

理論路徑的重建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發展經驗層次的分析。受限於研究規模，本研究並不著力於進入「廢棄」概念生成的歷史。換句話說，筆者並非要開展出龐大複雜的有關廢棄的歷史研究。因此，我們將論述框架限制在消費主義興起以降，重點討論當代消費邏輯如何扭轉物質生命的期限、跨越有用性價值，並在廢棄的基礎上搭建消費帝國。對此，本研究將以理論為優先，作為其餘一手或二手經驗資料的分析基礎，嘗試釐清當代消費與廢棄的關係。此外，為呈現消費研究與廢棄物治理研究之間的論述斷裂，本研究亦將討論台灣社會的垃圾治理政策。在經驗資料的蒐集上，本研究將採用次級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回顧探討台灣垃圾處理的歷史，指出現代性技術治理的失效，以及被歸類為「垃圾」的失序物質的不可治理性。同時，試圖將垃圾的政策治理連結回到消費社會的運作邏輯之中，說明廢棄的治理意涵如何成功地成為消費秩序建立的幫凶。現代性治理的失效以及當代廢棄物污染問題將大眾的目光轉移到浪費性消費的實作上。在環境污染的脈絡下，廢棄的意涵又再次發生轉變，跳脫出社會建構論的層次，更廣泛地連結

到生態／生命的秩序。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說明當代廢棄的多重意涵，其中包括支撐起消費邏輯的浪費意涵、掩蓋消費主義陰謀的治理意涵，以及跨界污染的生命意涵。分別將以三章的內容論述之。

在此之前，筆者首先爬梳垃圾研究的主流典範，並對相關概念做具體說明，作為進入主要論述前的文獻回顧。在第二章，筆者將以目前主流的垃圾研究取徑為主要討論對象，分別說明垃圾如何被視作社會秩序的問題或技術治理的問題。首先，援引 Émile Durkheim 及 Mary Douglas 的相關理論，說明污穢概念的形成與秩序建立之間的關係，以及污染如何從神聖宗教的教義中分離，降臨到世俗衛生學的領域。承襲社會學精神，筆者亦將回顧相關經驗研究，說明垃圾的象徵意涵如何關聯到社會中特定群體（「垃圾人」）的處境及身分認同。主流垃圾研究的另一取徑為技術治理的分析，也就是著重垃圾處理的技術及政策研究。這類研究將廢棄物視作可確知、可計算的治理對象，因而忽略了其不可測量性，容易陷入技術理性的陷阱。最後，筆者將指出兩種取徑的缺失，主張廢棄問題既是社會問題也是科技問題。因此，在隨後的主要章節中，筆者將試圖尋找社會文化與技術科學兩種取徑的共同理論議題。Douglas 等人已經在理論上指認污染、雜訊、廢棄物等與秩序系統的密切關係。所以，無論廢棄物的型態或狀態如何轉變，順著廢棄物考察，理應能夠發現系統、闡明秩序的邏輯。由此觀點出發，筆者將「秩序」作為論述的主導概念，著重於廢棄生成與秩序建構的關聯，試圖討論當代廢棄現象背後更加複雜的結構與文化。

本研究分別以〈自由的秩序〉、〈治理的秩序〉、〈生命的秩序〉三大章節來討論當代廢棄主題中消費、衛生、污染這三個經驗層面，並闡述三種秩序之間從合謀到對抗、至終是涵攝等關係。筆者首先將目光轉向消費社會中的廢棄，藉由 Bauman 與 Baudrillard 兩位學者的理論論述，嘗試探討當代「拋棄式生活」的形

成，以及廢棄行為與消費文化的關係。在第三章中，我們將試圖說明消費研究與廢棄研究之間的論述斷裂，指出廢棄被化約為消費結果的危險，進而必須強調 Bauman 與 Baudrillard 理論論述中廢棄作為消費之基礎的重要角色。消費社會是當代人的生活環境，同時也是廢棄行為難以割捨的集體脈絡，本研究試圖反轉消費與廢棄的主從關係，指認廢棄在當代早已不僅是消費的結果，同時也是支撐起整個消費王國的基礎。筆者從消費社會的物質豐裕出發，指出廢棄文化的物質基礎，而「方便」、「新鮮」、「乾淨」等新文化價值則為消費經濟之內的拋棄式生活提供社會正當性，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廢棄的負面意涵，使得浪費在當代文明裡取得勝利，建立起消費社會的自由秩序。

而後在第四章，筆者將繼續說明將廢棄處理轉嫁給政策治理的觀點謬誤。拋棄式生活遺留下大量廢棄物，很自然地將引起下一個問題：人們實際上是如何處理這些被視為無用的應排除之物？為了回答此問題，我們必須回頭考察有關垃圾治理的歷史與現況。本研究主張，垃圾治理是消費社會的後台場域，負責確保垃圾問題不會進一步成為前台消費生活的威脅。換句話說，治理的目的在於保障消費自由的持續滿足，並創造乾淨的社會空間。此外，過往的研究較少著重垃圾處理的儀式意涵，但實際上無論治理的技術手段為何，廢棄物的治理就是對秩序界線及分類的再次確認與維持。所以，垃圾治理的本質即是秩序界線的治理。筆者將以次級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為佐證，於本章分別討論公／私領域中的垃圾治理，進而指出治理實踐的結果：創造、深化了公私領域的分野，並弔詭地形塑了廢棄物既公共又隱私的含混性質，同時也改變、甚至於趨同了人們與廢棄物的性格。

消費的自由秩序以及治理的技術秩序令我們與廢棄之間產生一種既親密又疏離的曖昧關係，以此掩蓋物質的實質浪費，直到廢棄物的環境污染戳破了豐餘烏托邦的假象。循著秩序與界線的思考，我們將論述視角轉移到溢出的廢棄物上，也就是具體說明被歸類為「垃圾」的失序物質如何成為自然界中流竄的污染物質，進而宣告治理界線的失敗。在第五章的討論中，筆者將倚重 Serres 的理論論述再思秩序與界線的意涵，並指出生態污染的視角如何改變我們對廢棄物的理論認

知：從可象徵建構的遺留物、可技術管控的「死物」，轉變為生態循環的流動物。廢棄物質的能動性在生態操作的視角下彰顯，流動的廢棄物反過來成為生命的標記與系統的中介。在此，問題意識將著重於廢棄研究中觀念秩序與物質生命的密切交織。

最後，作為結論的第六章中，筆者將總結本研究主張之廢棄的當代意涵，強調當代廢棄早已發展出比世俗衛生學更豐富的意涵與社會角色，並且重申現代人與廢棄物之間的難分關係：廢棄物質既是社會秩序的雙生，也是生命勞動的本質。同時，我們也將補充說明本研究的限制及反思。



第二章 文獻回顧：垃圾研究的主流典範

現代人的特長就是生產垃圾。我們已經學會如何快速地丟棄，好讓生活可以不必為這些小事情耽擱。當我們撕下食品包裝時，會立刻把它丟掉，幾乎是種單純的反射動作。但也並非所有廢棄都如此「順理成章」。有些廢棄行為需要經過漫長且複雜的考量，可能還牽涉不少情感上的糾結或舉棋不定。舉例來說，當你在大掃除時發現了一個小時候很喜歡的玩具，即使它跟食品包裝一樣，都是塑膠材質，你肯定也不會再玩它，但卻一時無法決定要不要丟掉，好像若是將它拋棄，童年回憶也隨之離去一樣。

那麼，到底什麼是垃圾？垃圾是一個異常模糊的概念範疇，其具體內容會隨著歷史、文化、時間、地點、物質、心情等因素改變，擁有難以捉摸的特性。一個物品在特定情境條件下是垃圾，但在其他情境中則不是；同樣的東西可能對某個人來說毫無用處，卻是另一個人的寶藏。⁶ 垃圾有沒有一個具體的形式或內涵可供我們指認？又或者，垃圾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的經驗性特徵，能夠加以理論化分析？

廢棄是個充滿挑戰的課題，同時具有足夠的吸引力，讓各領域的學者們投身其中。垃圾作為人類社會無法忽視的產物，而廢棄行為又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而有所差異，因此自然具有社會科學的研究價值。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看見垃圾不同的面向，如同展開一張繽紛的圖畫。我們不但可以在形形色色的廢棄研究中看見垃圾的各種型態與性質，甚至可以由此了解我們如何看待他人的世界，又如何關連物質的世界。

本章將概要回顧社會科學的垃圾研究，指認這些研究的分析取徑如何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複雜的日常現象。筆者將在這些文獻中梳理出垃圾研究的主流典範，由此說明本研究如何在文獻的既有基礎上，理解廢棄的當代意涵。

⁶ 英文有一句諺語即是：“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就是指對某人而言毫無價值的東西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寶物，體現的了物質價值的流動性。

第一節 概念的定義與釐清

廢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把沒有用的、不需要的東西丟掉或拋棄，使之成為廢棄物或謂垃圾。「廢棄」的英文為「waste」，同時可作動詞、名詞與形容詞用。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第七版）》（2009）釋義，waste 意指「使用不當」或「非充分利用」（動詞與名詞），也就是「浪費」、「糟蹋」、「白費」的意思。此外，在部分語境中，也有「殺死」、「打敗」（某人）的意涵。waste 作為名詞使用除了意指抽象的「浪費」以外，還可指稱實體的物質材料（materials），譯作「垃圾」、「廢物」、「棄物」等。它也可以與其他名詞結合，具體指稱「被浪費的」、「被廢棄的」某物，例如廢棄土地（waste land）、廢水（waste water）等。Sabine Barles（2014）指出，我們用來描述廢棄的相關詞彙與廢棄的歷史脈絡是無法分割的。⁷ 她歸納出三種表述垃圾的語彙，分別著重於廢棄的不同面向。首先是有關價值的表述，通常與損失（loss）或無用（uselessness）有關，例如英文中使用的 refuse、garbage。這通常是我們對廢棄的最普遍理解，意即將廢棄物視作生產或消費活動後遺留下來、已使用過、毫無價值的物質，是挪用（appropriation）的產物（Lynch 1960；Scanlan 2005）。第二種表述則與髒污（dirt）有關，或此類具有令人噁心、反感等特質的東西，例如排泄物。第三種表述則有關組成廢棄物的物質，例如英文中的 rubbish 來自字源 rubble，表示碎石、瓦礫。這三種不同面向的表述實際上分別體現了有關廢棄的三層理解。前兩者分別與文化價值的建構及秩序界線的維持有關，第三種則著重於垃圾的物質性（materiality）。

中文語境裡亦有可以與這三面向表述相對應的語彙。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5）釋義，動詞的「廢棄」意指「因失去利用價值而捨去」。「垃

⁷ 舉例而言，在塑膠還未發明以前，19 世紀人類生活的廢棄物主要以排泄物、破布（rag）、骨頭（bone）為主，而那些靠收集、買賣這些廢棄物維生，或沿街收購舊貨的人，也因此被稱作「撿破爛的人（the rag man；the bone grubber）」或「流動舊貨商（the rag-and-bone man）」（Lynch 1990；Barles 2014）。沖水馬桶與下水道系統還未普及前，家戶排泄物通常收集在「糞桶」中，再由專門的工人——「糞伕」——上門收走處理（董宜秋 2005；潘淑華 2008）。這種古老的清潔活動也被稱作「倒夜香」。但隨著該糞便處理方式逐漸被沖水馬桶、抽糞車等取代，這些與之相關的語彙也漸漸不再被使用了。

圾」是「穢物、塵土及被棄的東西的統稱」，範圍較廣；而「廢棄物」的意涵則相對具體，是指那些「易污染環境的固體、液體」。一般來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將丟棄的東西統稱為「垃圾」。唯有在環境保護議題、城市規劃管理的專業學術領域中，有關專家才會對「廢棄物」進行詳細的分類，例如「自然廢棄物」、「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物」等等。因此，在中文語境的使用上，「廢棄物」一詞往往帶有環境污染的影射語意。污染問題作為廢棄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當然是該議題中的重要面向。然而，本研究試圖討論的當代廢棄行為顯然不止於此，其中同時涉及到人類價值的評估、社會秩序的建構，以及物質運動的作用。因此，為了呼應英文「waste」的用法，筆者在使用「廢棄物」一詞時並不會侷限於環境污染的脈絡。此外，當在象徵與秩序的脈絡下談及廢棄物對秩序界線的威脅時，筆者則將交替使用「髒污」與「污穢」來對應「dirt」一詞。其餘的討論脈絡中，為了稍加區隔其他關聯的名詞與「廢棄物」——例如「garbage」、「trash」——筆者將使用「垃圾」作為此類泛稱，指代那些被丟棄的無用之物。大致上言，「廢棄物」、「垃圾」與「髒污」既有共通的特性，亦有差異的側重點，筆者將視討論脈絡交替使用。

根據我國所制定的、用以規範廢棄物處理的《廢棄物清理法》(2017)，廢棄物主要可分為兩類：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主流的廢棄學術研究(waste scholarship)大多集中在城市廢棄物的討論，也就是家用廢棄物、生活排泄物等，發展出許多相關的歷史或田野研究。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事業廢棄物在所有廢棄物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逐漸升高，最大宗的垃圾來自農業、工業與建築建設等大型工程。⁸ 近年來，也有不少研究者將目標轉往大型工業廢棄物，但本研究仍將聚焦於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廢棄行為，希望從這些被忽視的、無標記的(unmarked)人類行為裡，尋找理解當代社會的鑰匙。

回顧主流垃圾研究，可以將其分成兩種主要取徑：一種是將垃圾當成社會問

⁸ 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統計年報(2019年版)，我國事業廢棄物產生總量從民國97年(2008年)16,944,447公噸增加至民國107年(2018年)的22,178,067公噸。

題來處理，採取價值建構論的觀點理解廢棄；另一種則將垃圾看作科技問題，著重於探討廢棄物處理的技術政策。而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大多著重在廢棄物處理政策及技術的探討，亦有部分專注討論與垃圾議題相關的社會群體，比如拾荒者與清潔員。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回顧這兩種垃圾研究的取徑。

第二節 污穢概念的建構：價值與秩序

垃圾是生活的產物，具有特殊的社會文化意涵。垃圾的社會建構論考察可以追溯到有關污穢概念的形成。污穢的概念與社會分類有關，而分類的問題是「社會人類學最原初、最基本的關懷」（Needham 2012）。Émile Durkheim 與 Marcel Mauss 在《原始分類》（*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中寫道：

所謂分類，是指人們把事物、事件以及有關世界的事實劃分成類和種，使之各有歸屬，並確定他們的**包含關係或排斥關係**的過程。……我們對事物進行分類，是要把它們安排在各個群體中，這些群體相互有別，彼此之間有一條**明確的界線**把它們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Durkheim and Mauss 2012：2-3）（粗體為筆者所加）。

對 Durkheim 與 Mauss 而言，分類並非單純的個體心智或活動的產物，不是人類自然形成的。所謂分類圖示（schema）「不是抽象理解的產物，而是某一過程的結果，而這個過程是由各種各樣的外來因素組成的」（Durkheim and Mauss 2012：8）。在人類社會的分類行為中，除了將事物進行歸類以外，不同的類別之間還有特定的關係甚至等級秩序。所以，在 Durkheim 與 Mauss 的理論中，原始社會的分類模型所體現的就是社會本身。在具有情感、宗教意涵的分類邏輯中，產生了相對於個體的集體神聖性，社會秩序隨之而生，將社會人及事物進行分類整合。

人類學家 Mary Douglas 追隨 Durkheim 的腳步，在其 1966 年問世的專書《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中將污穢（dirt）定義為「喪失位置／位置不當

之物 (matter out of place)」：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啟發性的研究進路，它暗示了兩個情境：一系列有秩序的關係以及對此秩序的違背。這樣一來，污穢就絕不是一個單獨的孤立事件。有污穢的地方必然存在一個系統。污穢是事物系統排序和分類的副產品，因為排序的過程就是拋棄不當要素的過程 (Douglas 2018 : 48)。

Douglas 認為，污穢的概念是象徵的 (symbolic)，與物的內在性質無關，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鞋子本身不是骯髒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骯髒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穢的，但是把烹飪器具放在臥室中或者把食物濺到衣服上就是污穢的。」(Douglas 2018 : 48-49) 換句話說，只要與系統的分類相牴觸，或是落入正常的分類體系之外，任何東西都可能成為污穢 (Douglas 2018)。

將污穢與潔淨區隔，牽涉到系統性的秩序與分類。但是，我們對污穢的感知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排除，而是認知系統的積極挑選。去除污垢的行為則是一種重組環境的積極努力。Douglas 借引 Bartlett (1932) 的圖示 (schema) 概念，說明我們作為感知者所具有的創造模式的傾向：

在不斷變換印象的混沌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建造了一個穩定的世界，在那裡，事物都具有可辨認的形狀，這個世界位於深處並且具有永久性。在認知的過程中，我們也在建構：接受某些提示，拒斥另外一些 (Douglas 2018 : 49)。

所以，在認知的層次上，垃圾這種概念範疇，彰顯了廢棄行為發生的圖示：當我們決定丟掉某樣東西時，首先在認知中確認了其可拋棄性 (disposability) 或至少是可拋棄的 (disposable) (Kennedy 2007)。由此可見，某些在觀念上運作的東西，形塑了我們的廢棄行為，以建構我們認知中的穩定模式。反過來亦可以說，我們的廢棄行為一定程度上就是對秩序的維持與整飾。而垃圾作為此結果，也可

說是與我們創造生活世界的想法密切關聯（Scanlan 2005）。

污穢概念的確知，以及社會秩序的維持，皆需要依靠儀式。在原始社會中，污穢的概念往往與宗教相繫。透過教義的規範以及儀式的反覆確認，建構起一套包含污穢概念的秩序系統。人類學家過去致力於尋找原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而污穢與宗教神聖的分割與否就成為他們所認可的具體證據。但是，Douglas 指出，傳統西方社會人類學所認為的他／我之分其實並不那麼絕對。無論是原始或現代社會，皆存在一種劃出潔淨與危險之界線的社會秩序。只是，現代污穢的概念脫離了宗教的神聖性，建構在環境衛生的基礎之上（Douglas 2018）。

然而，「衛生（hygiene）」並不總是現代廢棄行為的最主要或者唯一考量。髒污是一個與環境及文化相關的概念，如同日常生活與家務勞動的不斷變化，我們對垃圾的定義以及日常廢棄行為自然也會隨著地理與時間的變遷而有所差異（Lynch 1990；Strasser 2000）。Gavin Lucas（2002）認為，廢棄行為總在衛生（hygiene）與節儉（thrift）的道德模型中拉扯。他針對 20 世紀歐洲與美國地區的家戶廢棄行為進行深入研究，指出家庭生活廢棄物的產生和處理與歷史脈絡中的文化因素有關。不同時期的社會秩序對於衛生或節儉的強調，顯然影響了家戶對物品的使用、保存與丟棄。⁹

即使社會對有用／無用或乾淨／污穢的界線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及文化脈絡中有所差異，但不能否認的是，幾乎所有文化都會留下其存在的痕跡。在城市消逝之後，殘骸就成了歷史的見證。垃圾作為生活的遺跡，同樣也紀錄了人類生產與消費行為的變遷軌跡，成為映照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垃圾考古學（garbage archaeology）透過對掩埋場的挖掘與分析，得以描繪出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人們的消費習慣、飲食生活習慣與人口組成。換句話說，吾人可以透過研究垃圾來了解我們的社會（Rathje and Murphy 1999）。垃圾甚至可以成為殖民歷史的見證者，

⁹ 20 世紀作為消費文化興起的重要歷史轉折，很明顯地能夠看到整個世紀前半與後半家戶廢棄行為的差異。在消費社會中「節儉」的考量敗給了「衛生」，加速強化了拋棄式生活的形成，當然也引發了 1960 年代對於「拋棄式社會（throwaway society）」及「消費者社會（consumer society）」的批判（Lucas 2002）。

比如 Myra J Hird 及 Alexander Zahara (2017) 對加拿大原住民居住地垃圾的研究，讓我們了解殖民者帶入了什麼樣的規制與影響，從而改變了原住民族的生活與文化。

與此同時，垃圾也和創造 (creation) 與毀滅 (destruction) 的價值循環有關。Michael Thompson (1979) 就認為，物件的價值來自人類的社會生活。他依照價值創造的動態過程，將物件分為三個範疇：臨時物件 (transient)、垃圾 (rubbish) 及耐久物件 (durable)。臨時物件與耐久物件代表物質文化中可見的、有價值之物，而垃圾則代表了與其相反的、在我們生活外圍，不被看見、沒有價值的物件。垃圾是連結臨時物件與耐久物件的中間範疇 ('in-between' category)，它提供了從臨時物件轉換成耐久物件的可能途徑 (Parsons 2008)。由於垃圾是無價值的，因此反而成為了重新再被賦予價值的可能性本身。

根據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垃圾價值是象徵的，廢棄行為是建構的。唯有價值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垃圾存在的結果。有系統才有污穢，思考垃圾就是對於價值及秩序的思考。而那些遊走於秩序邊界的物或人，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群體，往往都是令人不悅，甚至危險的。

第三節 秩序的邊緣：隱形的垃圾與群體

垃圾的存在是對生活秩序的威脅。原本一件一件分開、獨立的物品如今全都堆在垃圾桶里，相互擠壓、滲透。垃圾散發出的惡臭時刻提醒著我們這些危險之物的存在。因此，我們急於將垃圾丟到生活界線之外，積極地維護周圍環境，以重拾對系統秩序的掌控。垃圾象徵虛無、遺忘與死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盡可能地不要將注意力放在垃圾身上，維持著「眼不見為淨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的表象，也同時無視那些與垃圾有關的群體——清潔員或拾荒者，以及其他被社會廢棄的人群。

美國人類學家 Robin Nagle 認為：「從『丟棄』垃圾這樣的用語就能明顯看出大家對垃圾漠不關心的態度，『丟棄』這個舉動雖然明確，但也模糊。我們不會

說把垃圾『收起來』，因為那有存放的意思；我們也不會說把垃圾『放到』某處，因為那有小心處理的意思（2017：44）。」我們將垃圾丟在垃圾桶裡，然後給清潔隊員，送往它該去的地方。至於到底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既不清楚也不關心。因此，Nagle 決定一探究竟。她對紐約市清潔隊詳細的田野研究向我們展現了街頭那些「隱形」工作者的生活。清潔員做著風險極高的工作，卻總是被人們遺忘。他們不如消防員、警察那般受人尊敬，卻是一個城市最不可或缺的守護者。若是沒有清潔員，城市將無法保持乾淨。但是，垃圾在當代社會的負面象徵意涵使得這些努力工作的清潔隊員形同隱形。

處理垃圾意味著觸碰髒污，具有被污染的危險。垃圾的象徵意涵同時賦予其關聯行為特殊的社會意義：我們處理髒污的方式，以及我們對乾淨環境的標準成為建構社會地位的一種途徑（Lynch 1990）。處在階層金字塔頂端的人理所當然地生活在最乾淨的環境裡，無需承擔被污染的風險。而相對的，那些與別人的垃圾為伍，在垃圾堆裡翻找生存機會的人，往往是社會最底層、最邊緣的群體。¹⁰

與此精神相仿，胡嘉明、張劭穎（2016）也看到了這類「垃圾人」特殊的生活處境。在北京市邊緣，來自中國四川、河南等地做著廢品生意的拾荒者，離鄉背井，靠打工、收垃圾為生，同時支撐起完整的廢品回收產業。他們群居在像冷水村這樣的「城鄉交合區」，也就是「垃圾中轉站，非農非城、混雜的空間和社區」，城市邊緣的灰色地帶。在這份田野研究中，可以看到垃圾這種具有髒臭性質的物質是如何流動在城市與城郊之間，流動於這些垃圾人的一生與世代之間，牽連著外來者與北京城，也牽繫著拾荒家庭與故鄉的情懷。垃圾這種特殊的物質，不僅是冷水村居民生活、經濟活動的核心，也形塑了這群人、這個地區，甚至與之相連的中國城市化進程。

¹⁰ 拾荒通常是社會中窮人的主要生活經濟來源。維多利亞時期的記者 Henry Mayhew（1851）在他所發表的一系列關於倫敦勞工階級生活的文章，就描述了在垃圾堆中撿拾破布、骨頭等還具有經濟價值物品的拾荒者（bone-grubber）的生活（轉引自 Lynch 1990）。在美國，1910 至 1930 年代是拾荒經濟的黃金時期：收入較低的工人會從垃圾中尋找還可以修復的物品以賺取額外的收入，甚至創造屬於自己的垃圾經濟王國（Lynch 1990）。

無論是政府組織的清潔員，還是遊走在城市邊緣的拾荒者，其生活與群體認同都與垃圾這種特殊的物質息息相關。垃圾混雜、隱形的性質不僅形塑這個含混的物質範疇，也形塑與之有關的社會群體。垃圾「除了是一種具有衍生經濟價值的物質之外，還是一種不斷生產文化價值、定義社會邊界，甚至是身分政治、有能動性的物質」（胡嘉明、張劭穎 2016：xiii）。「垃圾人」的有關研究揭發了這些在秩序系統邊緣被忽視的群體，點出了垃圾的象徵意涵是如何與他們相交融，形塑其特定的文化價值與身分認同。垃圾的社會建構觀點的確有助於我們理解廢棄的社會文化意涵，以及象徵失序的垃圾如何影響特定邊緣群體；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不同垃圾的物質作用；簡言之，廢棄物的多元物質面並未在這類研究中充分體現。

第四節 垃圾的治理：技術與政策

在主流研究中，垃圾除了被視為社會秩序的問題，也被視為處理技術（*treatment technologies*）的問題。台灣的相關研究除了拾荒群體的研究外（黃清和 2005；杜雅玲 2000），另一大宗就是有關垃圾處理的技術與政策。這其中包括了對台灣都會區垃圾處理政策轉變的歷史研究（黃大祐 2013）、垃圾處理與資源回收政策的分析或評估（陳韋名 2005；林玉墩 2006）、有關焚化爐設置的正義及環境運動（陳孟瑜 2003；林怡瑩 2004；許雅斐、葉穎超 2004）等。這些研究的核心是垃圾的治理，涉及技術與政策的不同層面，以及垃圾治理所延伸出來的其他社會課題。

垃圾處理是都市化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後工業革命以降的城市生活基本上就是座落在自己的垃圾堆裡：「城市生活所產生的每日垃圾就直接被丟在街道上，等著被豬隻吃掉或被大雨沖走」（Lynch 1990：44）。這連帶導致公共衛生及居住環境問題，因為就連居民使用的飲水系統都被垃圾給污染了。遍地腐爛、發出惡臭的垃圾顯然不是一個現代化城市應該有的東西。有關治理政策的研究，將垃圾這種東西轉譯成了技術的問題，需要被處理、被管理（Gregson and Crang 2010）。

廢棄物處理的方式與人口、工業、生產技術等息息相關，主要有傾倒、焚化、回收、源頭減量這四種。在檢視廢棄物處理的歷史變遷時，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人們如何差異地看待「垃圾」這種東西。從可作農業肥料的有機廢棄物，到作為工業原材料使用的破布、骨頭，再到塑膠為主的新型態廢棄物，我們不斷在尋找、更改新的垃圾處理方式（Barles 2014）。垃圾意涵的社會變遷首先是作為原料在不同產業之間流轉，然後演變成廢棄物被大宗傾倒掩埋，如今又因應環保意識的崛起而再次成為回收利用的資源。

但是，無論採取何種處理方式，無論是做為資源或廢棄物，當我們將垃圾研究聚焦在技術與管理手段上，其實已經預設了垃圾的可確知性（determination），使得討論很快地就滑向處理技術（treatment technologies）（Gregson and Crang 2010）。¹¹ 垃圾的治理研究通常忽略了其不可測量性，利用技術政策將垃圾化約為量化單位（例如公噸），陷入了法蘭克福學派所稱的技術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的神話，更不用說，垃圾的治理政策常將我們對垃圾所不知的部分放入括弧中不予討論（Hird 2012, 2013）。

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啟蒙理性的技術政治顯然不攻自破。當我們一方面將垃圾視作需要且可以管理的對象，一方面卻又不得不面對嚴重的廢棄物問題時，儼然就是 Bruno Latour（2012）所說「從未現代過」的人。

第五節 社會與技術的秩序

本章回顧了垃圾研究的主流典範，首先說明有關分類秩序的建立是如何與污穢的垃圾相關聯。循著 Durkheim 對原始分類及宗教神聖的研究，Douglas（2018）首先定義了污穢的概念，即「位置不當之物（matter out of place）」。¹¹ 她強調，有差異的地方才有污穢。在 Douglas 眼中，沒有所謂生來就是污穢的自然東西。污

¹¹ determination 照其字面直譯應為「可決定性」。但是，為了強調垃圾在技術治理政策下被化約為密度、重量、材質等可測量、可分析的明晰的治理對象，筆者將該詞譯作「可確知性」，以此對照後文所指出的，垃圾在實際操作上的不可治理與不可共量。

穢是系統分類的產物，是象徵概念的範疇。原始宗教混雜著污染的觀念，使穢具有神聖的特性。在現代社會，穢走下神壇，與神聖性分離，降臨到衛生學的世俗領域。但是，Douglas 認為，神聖與穢的分離並不能作為區辨原始與現代的指標。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秩序系統中依舊包含污染的觀念，並且透過日常儀式維持潔淨與髒污的界線。也就是說，「我們關於穢的觀念表達的也是象徵體系，世界上不同地區間污染行為的差別只是細節上的」（Douglas 2018：48）。所以，對 Douglas 而言，醫學唯物主義並不能解釋有關穢與污染觀念之表達中有關象徵系統的層次。¹²

垃圾是揀選與分類的結果，來自於系統又威脅著系統。我們積極建構社會秩序，同時也承認無序的潛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儘管致力於創造秩序，卻也不會簡單地詛咒無序」（Douglas 2018：106）。在現代性秩序創造的過程中，「廢棄物成為矛盾狀況的象徵」（Bauman 2018：56）。即使在現代，髒污依舊具有原始宗教的神聖性力量（mana），讓我們既害怕又著迷（Lynch 1990）。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於《廢棄社會》中寫道：

廢棄物同時既神聖亦邪惡。它催生了所有的創造，同時也是創造的最大障礙。廢棄物是崇高的，它獨特地混合了魅力和厭惡，同時激起了獨特的敬畏和恐懼（Bauman 2018：56）。

污染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來回辯證的關係，因為唯有結構世界被清楚地界定，污染才有危險的可能（Douglas 2018）。穢違背的是秩序，並且冒犯了我們維持事物正常順序與純淨的努力。在現代社會中，這種結構性界線又呈現為純粹的二元對立：事物被暴力地區分為有用與無用、生與死、保存與廢棄。對於秩

¹² Douglas 在《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第二章中討論了世俗的穢（secular defilement），開宗就點出醫學唯物主義（medical materialism）對理解我們自己關於穢概念上的缺失：「比較宗教學一直以來被醫學唯物主義所困擾。有一些人認為，即使是最奇特的古代儀式也具有衛生學基礎。另有一些人儘管承認原始儀式的目標對象是衛生學，卻對其可靠性持相反的態度。在他們看來，有一個巨大的深淵將我們對於衛生的可靠的觀念與原始人錯誤的想像分隔開來。但是這兩種研究儀式的醫學角度都是不成功的，因為它們均未能直面我們自己關於衛生與穢的觀念。」（Douglas 2018：42）

序和潔淨的追求，讓我們強迫症似地希望所有東西（包括人）都要非此即彼，那些介於中間的（in-between）、過度的，都是無法忍受且危險的（Lynch 1990）。於是，現代人努力用各種方式，確保垃圾的無用性，並試圖管理和清除那些對秩序具有潛在威脅的人、事、物。

分類協助我們釐清事物之間的關係與階序。秩序的建立需要劃分出界線與類別。於是，無法分類的、遊走在界線邊緣的，或是被系統排除的，都是污穢，代表的是無序的混亂。對 Durkheim 來說，原始分類體現的就是社會人的分類。物的階級關係也影響著與之相關的群體生活及認同。這些事物，「不管是人還是非人」，正是在現代秩序的設計中「被指定為廢棄物」，而擁有了種種「神秘的、令人敬畏、害怕和厭惡的本質」（Bauman 2018：56）。垃圾的社會建構強調其象徵意涵，代表無用、無序，具有污染的危險。與這些「垃圾」彼此呼應的有一群「垃圾人」：他們不是專門負責處理城市廢棄物的清潔工，就是依靠撿拾、變賣垃圾為生的拾荒者，因為和垃圾牽扯上關係，從而成為秩序邊緣隱形的群體。我們都經歷過垃圾車擠壓垃圾時飄出的酸臭味，也或許目睹過拾荒者俯身在垃圾堆中。這些都是令人不悅的經驗，彷彿觸碰那些垃圾的是我們自己。垃圾人與別人不要的東西有著直接的接觸，因而總是被與骯髒、惡臭聯繫在一起。他們遊走在社會秩序的邊緣，同時又弔詭地是現代性秩序創造的基礎，於是成為 Bauman 所謂「被拋棄在黑暗中，不得不蜷縮在模糊隱蔽背景中的事物」（2018：50）。

原始宗教透過儀式來維持污穢與潔淨的區隔，而在現代社會中，清潔就是相對於污染的日常儀式。我們打掃居所，並不是要把它弄得多麼一塵不染。相反的，太乾淨的地方反而容易讓人覺得不舒服。打掃與整理，是為了展現我們維持與重組秩序的能力（Lynch 1990）。英國實境節目《垃圾屋剋星》（*Call the Cleaners*）帶領觀眾直擊英國最髒亂的居住環境，有囤積癖好的屋主，或是因病痛纏身無法自行打掃的獨居老人，有各種因素阻止了他們將自己的居所打掃整潔。觀眾首先見證到廚房發黑的油漬與發霉的食物，以及沾滿穢物的廁所、被雜物堆滿的走廊或閣樓……直到專職清潔人員協助整頓後，終於重新恢復宜居的狀態。垃圾屋強

烈的前後對比，顯然能夠帶給觀眾一種舒暢感，彷彿事物又重新回到正常秩序。所有不安與危險都隨著房間裡的垃圾一併清空了，屋主的人生似乎也可以從此走上正確的方向。

環境秩序的治理對象也從家戶擴及到城市與國家。現代城市的指標之一，就是街道的整潔與秩序。在垃圾的現代治理中，象徵的社會秩序被轉譯成技術問題，透過掩埋、焚化、降解、回收再製等技術手段，企圖維持現代性的秩序幻想。換句話說，現代人將秩序的想像擴展到了垃圾的無序之中。自宗教神聖性分離出來的污穢，貶抑了神秘的、混雜的危險性，現代的垃圾變成了純粹科學、量化的治理對象。垃圾治理成為現代性秩序神話的一齣劇碼，卻諷刺地被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無情戳破。

在下一章中，筆者將從消費文化開始考察，詳細說明「廢棄」如何參與在社會秩序的建構當中，成為消費社會的隱藏基礎。隨後兩章裡，我們還將會看到，垃圾治理是如何在整飾我們與廢棄之間的界線，而垃圾又是如何逃逸出治理秩序，成為不可治理的環境污染物。

第三章 自由的秩序：拋棄式生活的形成

「為了持續生產而需要依靠人為刺激消費的社會，就是一個以垃圾與浪費為基礎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像建造在沙子上的房屋一樣。」

“ A society in which consumption has to be artificially stimulated in order to keep production going is a society founded on trash and waste, and such a society is a house built upon sand. ”

Dorothy L. Sayers
“*Why Work?*” ,1942

有人的地方，就有生產與消費。迪士尼動畫電影《瓦力》(Wall-E) 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在大企業的不斷鼓吹下，消費主義全球盛行。過度消費產生大量的垃圾，已經發展到了近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地球被各種垃圾佔據，吞噬了所有生物的生存空間。於是，人們登上太空船，留下機器人「瓦力 (Wall-E)」負責清理地球上殘留的垃圾。移民太空的人類終於找到了更廣闊的垃圾場，得以繼續沉浸在消費主義營造的美好幻象中：慾望——消費——廢棄的不斷循環。

實際上「消費」並非是由當代社會所獨享的活動，甚至不是人類所專屬的經驗。消費與廢棄如同孿生兄弟，總是肩併著肩同時出現。「消費 (consume)」一詞甚至本就意涵有「摧毀、耗盡、浪費與窮盡」的意思 (Williams 1976；轉引自 Featherstone 2009)。若以廣義的角度來理解，我們皆承認消耗 (consume) 是維持生命的必要條件之一，所有有機體皆然。¹³ 但人類與動物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會欲求比基本生存所需更多的東西。我們消耗／消費不僅是為了生存，更是為了生活 (Bauman 2001b)。再者，綜觀長久以來的人類消費史，只要稍加探究消費型態在不同歷史時空下的演變，便不難意識到當代消費在社會、群體或個體層次的特殊性。在近代，人類消費商品的數量節節攀升，在消費行為的表現

¹³ consume 一詞在字典中的解釋有消耗、耗費及燒毀、毀滅的意思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第七版 2009)。消費通常指稱人類社會特有的，透過金錢或交換滿足欲望的行為。筆者在此文脈中為了強調有機體共同分享的生命經驗，即透過吸收、進食等行為轉換自然能量的過程，故將 consume 翻譯為「消耗」而非「消費」。然而，在其餘專指人類經濟生活之活動的脈絡下，該詞仍將被統一譯為「消費」。

上有了巨大的變革。廢棄行為也伴隨著消費文化變遷而產生了型態與數量上的驚人變化。

因此，若要深入了解當代拋棄式生活之形成，勢必要先描繪現代消費的特殊表徵。消費實作深受技術創新的影響，無論是具體的技術變革或是抽象的社會制度，皆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整體規範與秩序。工業革命與大眾市場之興起是消費規模、行為及文化轉變的兩個重要歷史時期。首先而言，技術革新讓商品的生產更加快速和多變，經濟財富的累積也逐漸豐厚。伴隨而來，是消費生活的興起與大眾市場的普及。我們的生活重心從生產活動逐漸轉為消費活動，消費資本主義亦同時將整體社會從「工作倫理」帶往「消費美學」的文化（Bauman 2003）。

全球性的消費實作已經為社會帶來新的生活、文化和政治秩序的想像，傳統社會的規範與承諾在大眾消費的洪流中逐漸瓦解。生產與消費的社會角色產生了變化，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亦然。我們的廢棄行為也隨者消費文化的轉變而不同以往。但是，消費活動的變遷往往較為容易成為討論核心，而廢棄的系統性功能卻總被忽略不計、高度簡化或與消費切割。問題在於，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廢棄是跟隨消費而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屬於後端治理的問題，因此也就未能將其放入消費體系作全面性思考。如同消費行為，廢棄行為亦預設人們的欲望，因此在人造廢棄物不斷累積、流竄的當代，廢棄行為在消費文化中顯然也扮演著關鍵角色。

所以，在本章的論述中，筆者首先嘗試為當代消費之型態特徵作簡要的背景論述，強調現代消費文化如何打造出新興消費階級。在此消費論述的基礎上，本章將導引出當代消費文化所形塑的拋棄式生活，以及這種系統性的廢棄如何進一步維繫消費秩序的穩定。首先須特別說明，消費規模及文化的機轉在社會學與其他學門的討論中仍難有定論，而本章著重探問的是與消費生活密切相關的「拋棄式生活」之形成，試圖回答廢棄如何在充斥著無限欲望的消費系統中運作，希望藉此修補消費理論與廢棄理論的斷裂和間隙。要回答這個問題，描繪消費生活的歷史特殊性是必要的，為的是著重在說明消費文化中無限欲望與持續廢棄的當代關聯；因此，筆者將一定程度地懸置有關消費文化的歷史變遷敘事，意圖僅限於

必要地鋪陳、闡明當代消費的廢棄意涵。換句話說，我們將討論重點聚焦在當代消費文化的特徵及其隱含的廢棄基礎。

第一節 建立消費者社會：維穩的神話結構

我們生活在以消費為核心的時代，擁有的東西似乎永遠也不嫌多。各種理由都能成為消費的動機：為了購買即將發售的新球鞋或新手機徹夜排隊；每季都要添購新衣只為趕上時尚潮流；家裡一定要有一台或不只一台電視機、冰箱、烤箱和微波爐，新推出的氣炸鍋看上去更加方便好用！

晚期現代社會徹底將我們打造成了欲求不滿的消費者。每年生產與消耗的商品之多，可以說產生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其基礎在於不斷生產新的商品以提供消費，滿足消費者五花八門的欲望。這種新的資本主義可以命名為「消費者資本主義 (consumer capitalism)」(Bocock 1995)。消費成為現代社會的新道德，有些信徒甚至認為消費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價值。消費文化從根本上改變我們與消費品及其活動的關係：「我們會用逛街買東西來滿足情感與社交需求，而且會拿自己擁有的東西來定義自己，展現自我價值」(Leonard 2018: 204)。

消費像是一列停不下來的火車，載著消費者不斷往前。根據世界觀察研究會 (Worldwatch Institute) 在 2004 年所發布的報告，全球有 170 億人屬於「消費者階級」，其中幾乎半數來自開發中國家。放眼全球，個人消費支出在 2000 年來到了 20 兆美元，是 1960 年的四倍之多。¹⁴ 黑色星期五是美國年度最盛大的購物日，消費者寧願前一晚夜宿停車場也要搶到「便宜貨」(但實際上並沒有便宜多少)(Leonard 2018)。奮力衝向商品的消費者像被下蠱一般，只顧著拼命將商品搶入懷中，好似電影裡不顧一切撲向活人的殭屍。近十年來，消費戰場更是從實

¹⁴ 該數據來自世界觀察研究會所發布的報告《世界現況 2004：特別聚焦——消費者社會》(State of the World 2004: Special Focus – Consumer Society)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4)，比較基準已經換算為 1995 年的幣值。其他統計資料亦可參考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 所發布的國家數據 (網址詳見附錄)。該統計顯示，以 2010 年的幣值計算，2018 年全球家戶消費支出來到了 47.137 兆美元，同樣是 1970 年 10.9 兆美元的四倍以上。

體打到了網路，由中國電商龍頭阿里巴巴發起的雙十一促銷已然成為華人社會線上版的「黑色星期五」。¹⁵

「理性」似乎不存在於消費者的字典中。消費狂歡的混亂是自然巧合或人為設計的橋段？為什麼東西越買越不夠？消費怎麼成為填補生活空洞的選擇？簡單來說，我們如何被打造成消費者？

1-1 選擇的自由：從生產到消費整合

消費雖然與生命存續有最直接的關聯，但它並非一直都是社會生活的主要核心。在早期現代的社會中，消費和其他社會活動一樣，深受社會規範與文化價值的制約，工作才是社會成員的首要責任。然而，自從大眾市場普及，工作與消費的社會角色顯然發生了反轉。消費構成了晚期現代人的生活重心。在當代，一個合格的社會人首先得要是合格的消費者。Bauman（2003）就指出，我們已經從「生產者社會」過渡到了「消費者社會」中。工作不再扮演當代社會的核心角色，「消費美學」取代了「工作倫理」成為了社會整合的主要動能，消費幾乎控制著我們的整個生活（Baudrillard 1998；Bauman 2003）。

工業革命將人類社會帶入機械化生產，開啟現代性的歷史篇章。Bauman（2003：9-30）將工業社會描述為以「工作倫理」為核心的「生產者社會」。他指出，工作在現代體制中佔有核心位置。勞動是可以販賣的，並且需要透過工資的兌現來證明勞動的自我價值和他人認可。此時，社會秩序的維繫是依靠工作倫理的滲透，要求人們全心奉獻於勞動生活。

然而，工作倫理基本上強調的就是對自由的放棄。在宣揚工作價值的同時，抑制了勞動者「對其喪失自由的抵抗」；換言之，要求人們善盡工作倫理的道德

¹⁵ 雙十一（即每年 11 月 11 日），又稱「光棍節」，原本是流傳於網絡的中國年輕人的娛樂性節日，是慶祝所謂「單身驕傲」的日子。2009 年中國網路電商阿里巴巴公司意欲仿照美國感恩節大促銷在秋季推出一系列打折活動，最終選定 11 月 11 日。雙十一的網路促銷活動獲得巨大成效，根據中國《第一財經》報導，2019 年阿里巴巴公司旗下的「天貓」商城僅用了 1 分 36 秒就突破了 100 億人民幣的成交額。然而，隨者網路消費的興起與普及，中國快遞包裝的垃圾量亦快速成長。根據綠色和平（Green Peace）發布的報告，中國快遞包裝材料的消耗量從 2000 年的 2 萬噸增長到 2018 年的 941 萬噸（風傳媒 2019）。

選擇，在實際操作上卻是「減少或完全消除選擇」（Bauman 2003：26-27）。若想要擺脫受僱的束縛，朝向未來自由及美好生活，就必須要獻身工作。工作成為獲得物質補償的手段及通往美好未來的保障。工業社會為了自主與自由的權利鬥爭開始「逐漸但堅定地轉化成為了佔有更多的剩餘而鬥爭」，「有關社會生活之品質的權力衝突，轉變為金錢收入數量上的鬥爭，經濟利得則成為自主與自我肯定之雄心的唯一表現」（Bauman 2003：29）。Bauman 指出，這種「以金錢報償來評估人類價值與尊嚴的傾向。這也將人類的動機和對自由的渴望，堅定不已地轉換到消費領域」（Bauman 2003：29-30）。

強調以工作榮耀上帝的早期現代倫理已無法滿足晚期現代社會整合的需求，於是該角色讓位給了消費美學。「生產者社會」逐漸轉為「消費者社會」，意味著「社會塑造其成員的方式，最主要由扮演消費者角色的需求所主宰」（Bauman 2003：34）。工作倫理剝奪了生產者的選擇自由，對勞動生活的純粹奉獻，意味著「別無選擇、無法選擇和禁止選擇」（Bauman 2003：26）。相比之下，消費領域正向強調多加選擇、持續選擇，從而補償實現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與生產者社會無選擇自由的社會角色恰好相反，消費者社會對社會成員的道德要求反而是希望其擁有自由選擇的能力，並且要能夠不斷消費。

此外，新興的工業生產模式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勞工與布爾喬亞（Bocock 1995），更進一步推動了消費活動在社會秩序中的擴張。在消費活動還未普及的早期現代性，消費者的定義可以特指某種團體，該團體以消費作為生活的核心，透過消費過程來獲得有別於他人的社會身分及認同感（Bocock 1995）。消費是新興的有閒階級實踐其身分認同的重要方式；他們透過貴重商品的購買、禮物的餽贈、盛宴的舉辦凝聚階級社會的認同感（Bocock 1995；Veblen 2007）。美國社會學家 Thorstein Veblen 對此進行考察，進而提出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來指涉以消費活動展示財富的生活風格。非生產的時間及物質品的浪費體現了有錢紳士的社會身分：

貫穿炫耀式支出的整個演化過程，無論是就物品或勞務或人類的壽命而言，其中最明顯的含義就是為了有效提升消費者的好名聲，必須進行奢侈品的支出。為了要博取聲譽，就必須揮霍（Veblen 2007：85）。

但是，這種消費作為特權團體社會身分象徵的時期很快被大眾市場的興起給打破了。「福特主義（Fordism）」實現了刺激潛在消費的目標。美國汽車製造商 Henry Ford 不僅打造了標準化裝配線的生產模式，為美國家庭量產價格低廉的汽車；他還成功開發出一個由廣大民眾組成的消費市場（Bocock 1995；Leonard 2018）。福特主動幫員工加薪，並且縮短他們的工時。這不僅可以使原本兩班制增加到三班制，同時也讓員工有更多的收入及時間購買自己生產的汽車（Leonard 2018）。至此，大眾有了更堅實的經濟基礎，可以購買原先只是上層階級才買得起的東西。正是這種具有現代新意的「大眾消費」模式才將消費推動、引進每個人的生活當中：「除了一貧如洗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投入了消費」（Bocock 1995：38）。被工作倫理剝奪的自由體驗，終於在消費當中有了新的可能。¹⁶

從「生產者社會」到「消費者社會」的過渡，意味著「人們的生活、認同感以及自我觀念逐漸不再以生產性的工作為核心。各種家庭型態、各種性愛模式、休閒活動與一般消費當中的角色，對人們越來越重要，而取代了工作」（Bocock 1995：13）。在過去，工作扮演著「連結個人動機、社會整合和系統再生」的角色；而現在，這個角色被指派給消費活動了（Bauman 2003：38）。更進一步說，無論是在所謂晚期現代性、第二現代性或後現代性裡，消費都成為社會塑造、規訓其成員的方式。成為理想消費者的必要條件就是「不應該緊緊擁抱任何事物，

16 不過在此時期，職業階級與這批新消費團體的關係仍然密切。直到1960年代，更多類型的商品需求才進一步使消費者的身分認同轉向更不固定的型態。「生活風格」的流行促使消費者開始擺脫社會身分的團體主宰，進而使得消費的選擇不再需要配合身分團體（Bocock 1995）。消費行為開始變得個體化了，意即團體界線與身分認同逐漸變得遠比現代性時期更具流動性和多重化（Bocock 1995；Bauman 2003）。

沒有任何事情應該永遠投身奉獻，沒有任何需要能夠算得上完全滿足，也沒有任何欲望是最終的」(Bauman 2003：35)。我們都成了消費者，在被賦予多元選擇的自由時，也被投入無盡欲望的輪迴。

1-2 無盡的欲望：現代消費主導特徵

相較於生產者社會，消費者社會最突出的特徵大概就是永無止盡的欲望。在生產者社會中，可能動搖社會秩序的新刺激都會被視為威脅，應當被摒除。此外，消費行為原本是緊緊鑲嵌在社會脈絡當中的，跟其他生活面向一樣，都受到習俗與傳統的影響。只要在這兩股力量的作用下，欲望就成為固定且非開放的 (Campbell 2016)。

但是欲望似乎在消費者社會中得到了解放。不知足 (insatiability) 是現代消費行為的最重要特徵。儘管貪婪並非現代社會的專屬特質，而且無數歷史證據也表明，人類總是會對各種事物成癮，比如黃金、掠奪、性愛；但是相較以往，當代消費者的欲望是恆常、普遍、無盡的：

欲望會不斷出現，就像鳳凰浴火重生般，前一個欲望被澆熄後，下一個便倏地滋生茁壯。因此，欲望一旦滿足，新的欲望會立即補上，搶著獲得滿足；剛剛結束，第三個、第四個欲望又接踵而至，永無止盡 (Campbell 2016：34)。

我們持續不墜地購買，並總是會被新穎的商品和服務擄獲，每個人所擁有的物品越來越多，而且似乎總是仍不足夠。沒有哪一個時期的人們和如今的我們一樣每天消費、進而丟棄如此多的物品。

慾望是消費者社會這趟加速列車的燃料。唯有不斷燃起消費者超越生存必需的慾望，才能讓整個體系持續動態地擴張。Robert Bocoock 亦指出，慾望在消費者社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倘若不能透過社會化的過程，讓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確實在現代消費品與消費經驗尋求自己慾望的滿足，那麼，現代消費主義的經濟體系所賴以維持的社會、文化關係就會崩潰（Bocock 1995：116）。

除此之外，現代消費者的欲望還有其他幾個特徵。

首先，現代消費欲望是以享樂原則為核心的。Baudrillard 說：「自工業革命和 19 世紀革命以來，所有政治的和社會的毒性從平等的神話（*the myth of Equality*）轉移到了幸福上」（Baudrillard 1998：49）。Bauman 亦指出：「消費市場召喚了弗洛伊德認為不可能達致的快樂境界」（Bauman 2003：54）。享樂取代生存成為消費的首要目的。生存與享樂的目標實際上是相反的：生存意味著服膺規範，享樂則內涵反規範的能量（Bauman 2001a）。在強調集體規範的古典社會中，追求個人享樂往往是不道德的。但是在現代，消費與欲望反而都是「個人的」：

消費是徹底個別、孤立，而且最終是孤獨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滿足，有賴於抑止與誘發、緩和與刺激欲望，而欲望總是私人的、難以溝通的感覺（Bauman 2003：42）。

這是現代消費欲望的另一個特徵，即與個人主義之結合。Colin Campbell（2016）認為「情緒」已取代「感覺」成為連結心理意象與外在刺激的中介，讓個體透過「象徵資源（symbolic resources）」的運用來控制接收到的刺激，並因此能全盤掌控感受到的快樂。現代人甚至不需要任何外在感官知覺，就可以憑空透過想像力建構出刺激。Campbell（2016）稱之為「自我幻覺式享樂主義（self-illusory hedonism）」。這種透過操弄象徵意象來得到刺激與快樂的現代享樂主義，就是透過「識字程度加上個人主義」才得以實現，因為「識字能力賦予了個人操弄象徵意涵的能力」。現代消費者具有操弄商品的象徵符碼來建構自我形象的自由，結果是選擇的自由成為現代個體自由的具體化身，而這種自由既依賴於市場、又確保市場的存在（Bauman 1992）。

最後，現代消費是無數短暫欲望的連續集合，欲望的滿足必須要即時。在古典社會中，享樂是被延遲的，必須透過付出勞動的汗水才有機會換來未來的美好生活。如上文所述，消費社會以享樂主義為核心，消費者追求的快樂不再被保存於難以達至的未來，亦不再代表不知何時到來的穩定生活。

理想消費者的慾望是無盡的，如同海浪一波接著一波，不留任何間隔與空白。消費社會成功地讓欲望滿足更加及時、短暫也足夠密集，確保欲望不會在正式實現前自我損益且永久延續 (Bauman 2001a, 2001b)。恰是這種如煙火般絢爛短暫的慾望及其滿足，承擔起消費體系的核心功能。消費者社會中的快樂是短暫的、即時的，是一個愉悅的瞬間 (moment)。時效性成為核心價值，穩定未來的承諾已不復存在，神聖性的永恆至福被即時性的慾望滿足取代。及時行樂才是黃金守則，消費者社會不要求考慮未來，甚至某種程度上還需要消費者透支未來，先行付款。恰如 Baudrillard 與 Bauman 所言：

今天，一個新的道德誕生了：消費先行於累積之前，不斷地向前逃逸，強迫的投資、加速的消費、週期性通貨膨脹（節約變得荒謬）：整個體系亦由此而來，人們先購買，再用工作來償還 (Baudrillard 2018: 287)。

消費者社會是信用卡社會，而非存摺社會。是個「當下」的社會。一個需求的社會，而非一個等待的社會 (Bauman 2003: 43)。

在現代消費文化的導引下，消費者的欲望看似能夠在消費行動中獲得滿足，但實際上永遠沒有完滿的時候。消費市場激起欲望的速度快過抒發欲望所需要的時間；與此同時，更換欲望對象的時間也快過擁有物品感到無聊和厭煩的時間 (Bauman 2003)。當欲望被無限切割為一個接一個的即時性欲求；當社會開始強調彈性，而人們不再或無法追求穩定長久的工作；當社會不再保證遙不可及的永恆美好，甚至要求在當下透支未來，則大眾在享受消費社會的自由同時，也因為失去了過往社會可依賴的安定而焦躁不安。即便如此，消費社會並沒有因此受挫，

大眾也沒有逃逸出消費與廢棄的循環。由此可見，消費社會在為自由消費者提供享樂服務的同時，竟也提供穩定躁動的氛圍。自由與安定這兩股看似相對立的力量竟然在消費社會中完美融合，甚至成為維持社會穩固的神話基礎（Bauman 1992）。

1-3 消費的神話：自由與安定的需求

在前段討論中，我們強調在晚期現代性下，消費取代工作成為社會整合的主要角色。消費將原本被工作壓抑的自由渴望解放出來，使消費者浸淫在一種「被給予的自由」中，一種集體性的形式自由，多重且持續的選擇自由（Baudrillard 2018；Bauman 2003）。身為合格的消費者，我們可以自由選擇，並且透過選擇來展現自我（Baudrillard 2018）。然而，這並非意味個體真正從社會規範下完全解放了。Baudrillard（2018）與 Bauman（1992，2001b）皆指出，這種消費社會的個體自由實際上是消費體系自我維持的重要因子。Baudrillard 將其稱之為「由欠缺產生的自由」，旨在消除欲望帶來的緊張，在個體「因為心智因素（緊急、超我、罪惡感）阻礙的過往衝動，能夠凝聚在物品這樣的具體因子上，使欲望的爆炸性力量得以接觸之，而社會體制的儀式性壓制功能也得以在它們身上具體化」。這種「擁有的自由」既沒有攻擊性，又能夠進入體制之中，成為一種道德強制的自由，令個體與社會修好（Baudrillard 2018：322）。

欲望引起的不安全感在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聯姻中被完美地消解了。消費的自由提供給個體追尋快樂瞬間的可能，同時也提供足夠的確定性，免除了痛苦的可能。因為，消費市場保障了無盡欲望的永不枯竭，而且「純粹個人的」選擇是被社會認可的權利。換言之，消費者不必在追尋個人享樂的同時，擔憂社會規範對其自主意志的破壞。¹⁷

¹⁷ Bauman 指出，今日的社會控制恰恰是透過將消費牢固地確立為「個體自由的一個焦點和競技場」來進行的。在消費者社會中，「快樂原則」不再受制於「現實原則」，「處在消費階段的資本主義體制，不但已不再壓制人類追求快樂的傾向，而且利用這種傾向來維護自身的存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與延續，不再是反對個人自由，而是正面積極肯定之（Bauman 1992：76-95）。

現代消費已從工具理性中解放開來，成為不證自明的新秩序（Bauman 2001b）。¹⁸ 消費無需透過他者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因為在以無限欲望為基礎的社會中，消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生產者社會中被視為不理性的及時享樂與追尋，如今反過來成為消費者社會最堅實的理性基礎，具有強大的社會控制功能：

消費只是一個表面上道德淪喪的領域，因為根據 Durkheim 的定義，它不受形式規定的支配，而且似乎陷於無節制和需求的個體偶然性之中。它根本不像人們通常想像的那樣（這就是為什麼經濟的「科學」始終不願意討論它）是一個含混的邊緣領域，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社會規範約束的個體終於能夠在那個屬於自己的「私人」範圍找回一點點的自由和個體自主。消費是一種積極的集體行為：是一種強制的東西、一種道德、一種制度（Baudrillard 1998：81）。

至此，筆者已大致描繪出現代消費秩序的主導表徵和結構。消費者社會為個體自由開創了更廣闊的空間，使得資本主義可以在消費市場中持續延續，創造經濟增長的神話（Baudrillard 1998；Bauman 1992，2001a）。有關消費的分析或批評往往就此踩下煞車，僅在強調消費者的欲望追尋以及系統性的經濟增長，忽略了被消費神話所掩蓋的浪費與毀滅。換句話說，我們經常討論消費大眾怎麼買東西，卻不常討論他們怎麼丟東西。在消費者社會的發展初期，有關廢棄的問題還沒有那麼棘手、那麼彰顯，但是到了當代，廢棄儼然已經成為與消費生活密切相關的一環。廢棄是隱藏在消費市場中不為人知卻根本的一面。Baudrillard（1998：41-42）很早就指出了這一點：他看到有關經濟增長的指標計算如何掩蓋支撐資本主義的消極面，也就是損壞、廢棄的面向。¹⁹ 事實上，恰是這些毀滅與浪費，成就了經濟成長的動能以及現代秩序的建構。接下來，我們將檢視這些被掩蓋或轉化

¹⁸ 所謂「工具性消費」意指作為個體生存必要手段的消費。在這種情況下，消費的目的僅是為了延續生命，是必要的生存模式之一。這種工具性消費的合法性來自與生存條件有關的需求（needs）及規範（norms）。原始消費受制於其工具性（instrumentality），然而現代消費則不具有此限制，意謂它不再需要任何舊有的規範性或工具性關係來證成其合法性（Bauman 2001b）。

¹⁹ 「跟一個理性的系統相比，真正的系統實際上是依靠其被掩藏的缺陷、平衡、麻煩以及罪惡才繁榮起來的。」（Baudrillard 1998：42）

了的負面事實，探討現代廢棄精神之形成，以及系統性廢棄實作如何進一步強化消費巨輪的持續運作。

第二節 揭露拋棄式社會：生命時間的跨越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節儉美德是消費者社會的毒藥。要維持消費行為，不只必須持續創造欲望，還必須持續破壞與廢棄，給新商品騰出空間。當代社會可說是建築於垃圾堆上：當大眾被塑造成消費者的同時，也成為了垃圾製造者，生活在「拋棄式社會（throwaway society）」中。每年有上億元的商品還未賣出就必須被銷毀，甚至可以說生產即是毀滅。為了保持品牌形象與產品價格，奢侈品牌每年都必須銷毀大量商品；快時尚看似滿足大眾追求個性的欲望，實際卻令所有人站在廉價勞工與「過季」商品的殘餘之上。這些毀滅性的作為都被包裝成經濟增長的「必要之惡」，因而被忽略甚至於鼓吹。在本節的討論中，筆者將試圖揭開消費神話所掩蓋的黑暗面，指出當代消費的廢棄基礎。

2-1 物質烏托邦：豐餘與過剩

消費者社會是一個物質豐餘（abundance）的社會。²⁰ 大賣場貨架上總是有各式各樣的商品可以選擇，比如最新推出的汽車有一系列不同的顏色，各個品牌的巧克力都有不同口味和甜度……Baudrillard（1998）就指出，現今人們不再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消費者社會的商品彷彿具有生命的熱帶雨林，大量繁衍地將人圍困。在歷史時代，文明技術製造的工具或建築遺跡見證了人類生命的輪轉。但在消費時代，人類和物品的地位交換了，並且過時已取代不朽的價

²⁰ 在 Baudrillard《消費社會》（*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1998 年的英譯本中，第一章第一節的標題「豐盛」之英譯為 *profusion*，正文中另有其他兩個相似意涵的詞：*abundance* 和 *affluence*。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第七版）》（2009），*profusion* 與 *affluence* 分別意指「大量、眾多」及「富裕、富足」的意思。而 *abundance* 則用來表述擁有「超過需要、必要之足夠的量」（*more than enough*）的意涵。換句話說，與 *profusion* 和 *affluence* 相比，*abundance* 更有強調「超過所需」的狀態，暗示有一種相對「剛好」的標準。該釋義與過剩（*excess*）有更相近的語意空間，皆隱含所謂恰好的標準。因此，筆者選擇 *abundance* 作為「豐餘」的英譯，以凸顯「餘」（多餘、剩餘）的意涵，以此跟下文 Bauman 針對「過剩（*excess*）」的討論做出呼應。

值。現今，是人看著物被生產、成熟和消亡。

消費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行為，意涵針對商品的浪費與耗損（Bauman 2003；Featherstone 2009）。以浪費為表徵的消費行為不僅意指社會物質的豐餘，更實際支撐起消費市場的整體運作，具有以日常實作為基礎的系統功能。Baudrillard（1998）指出，浪費往往被過度簡單解讀為廢棄物的數量統計，該統計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意義。若只是在浪費之中看見那些本應該被消費卻沒有被消費的剩餘，那麼將無法理解浪費的基本功能：

所有社會都一直在浪費、耗盡、花費與消費超過必要需求之外的東西。簡單之極的道理是，個人與社會一樣，在浪費出現盈餘或多餘情況時，才會感到不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這種消費可以發展為「消耗」，是不折不扣的破壞，而且具有特別的社會功能（Baudrillard 1998：43）。

一如原始社會中的誇富宴（potlatch），物質的揮霍與消耗是上層階級藉由財富展示權力的競爭交換，透過「無益的浪費（wasteful expenditure）」來顯示優越地位並且鞏固社會關係。有些人基於有用性的價值作為基礎，單純將浪費看作是非理性的殘渣；但實際上，浪費有更加積極的作用，甚至取代了有用性成為豐餘社會中的主導經濟。換句話說，具有浪費意涵的消費行動才是豐餘社會的生產目的。只是差別在於，消費者社會中的浪費行為已經不是原始誇富宴中的集體化、象徵性浪費，而是被個性化（personalized）、大眾媒體的（mass-mediatised）浪費，進而是一種「系統的、蓄意的、帶有戰略目的的毀壞」。²¹ 但「無論是以暴力的或象徵的形式，還是以系統的、體系的破壞性形式，破壞都注定要成為後工業社會主要的功能之一」（Baudrillard 1998：47）。在 Bataille（1997）的一般經濟學概念中，也同樣強調經濟生產的破壞性目的：「經濟生產不應該與匱乏相連，而應

²¹ 在此，我們做出了區隔：當代社會的個性浪費與原始社會的群體浪費不同。要特別說明的是，這種「個性化」的浪費實際上也是「系統化的（systematic）」，是協助推動經濟生產增長的系統一部分，它必須是共同實作的大眾浪費，而「個性化」僅是以個體自由為名的表徵包裝。前一節論述分享相同的邏輯：當代消費的自由欲望跟個人主義結合，反過來穩固了消費市場的系統運作，同樣地體現了個體化／個性化的系統性功能。

該連結到過剩 (excess) (Featherstone 2009 : 31)。

「過剩」意味有「太多」，而「太多」則暗含「恰好」的預設。Bauman (2001a : 85) 指出，過剩的東西意味不重要、多餘的、沒有它也很好或甚至更好的。同時，過剩或太多也意涵一種行動的暗示，暗示那些東西破壞了和諧，因此是可以被去除的。規範 (norm) 與過剩相互依存：規範是過剩的基礎，而作為基礎的規範往往因此避開被質疑。過剩需要規範成就其意義，同時規範也需要過剩使其存在。換句話說，我們通常將規範作為過剩的堅實基礎，但 Bauman (2001a) 提醒我們，規範是雙腳孱弱的，它無法靠自己站立行走，唯有過剩的經驗或實際上的排除行動，才能讓規範存在意義、彰顯功能效力。事實是，一旦過剩消失了，規範也相應失效，只留下空洞。在以「不斷增產新商品以提供消費」的「消費者資本主義 (consumer capitalism)」中，商品的價值顯然是由使用者來決定的 (Bauman 2001a ; Bocock 1995)。結果是，消費者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開始拓深、逆轉為一種主體化的慾望生產，因為除了人類勞動的本質異化、商品和資本的客體積累，還必須要對過剩慾望的主體操控，才足以保障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剝削。

在規範逐漸瓦解或應說邁向無限的消費者社會裡，過剩就是生活的希望。此刻，過剩取代了普遍現代性規定客觀價值的規範 (norm)，激進地個體現代化為實作創新的規範性 (normativity)，一種自我指涉的，毫無客觀標準的理想。過剩讓愉悅的夢想得以持續，對快樂的追求不再有終點；未來不再指向不朽的穩定狀態，當下的及時享樂才是最重要的事。生活本身成為各種驚奇冒險的集合，每次的消費都是一次新奇的體驗，創造出某種奇蹟的美好錯覺 (Bauman 2001a , 2001b)。在過剩成為規範的新社會中，「多餘」似乎不再有意義，而「浪費」也不再被認為是浪費了 (Bauman 2001a : 90)。實際上，「物質的浪費」這種說法，在消費社會裡幾乎失去意義；因為，以毀滅物品作為基礎的生產模式中，早就已經不存在浪費的可能。換句話說，在消費者社會，沒有人會覺得東西太多。消費社會裡真正的浪費，反而變成是在追尋愉悅的過程中，那些不必要的長時間等待 (Bauman 2001a : 91)。

最起碼可說，在過剩取代規範之後，浪費的意涵發生了根本改變，若非徹底失去意義。當今生活中，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具有一個象徵秩序，能夠畫出「恰好」與「浪費」的界線。如今也不再有什麼事物需要人們持守節儉的美德，因為消費者社會的新規則就是持續地變動，進行破壞性消費，重複不斷地誕生和死亡，此即物質豐盛的烏托邦意象。但弔詭的是，在與廢棄有關的隱藏面消費中，似乎又保存了浪費的原初意涵，那就是時間的基礎存有。筆者將論證，時間的概念在消費者社會裡也出現了重大的變遷。本研究主張，只有從消費偏移到廢棄的視角再思考浪費，才能充分認識時間與勞動的社會關係，進而重新理解人類與物質的生態連帶。

2-2 預告的死亡：商品時效與計畫淘汰

上節闡明了消費者社會中豐餘與過剩的浪費意涵。簡言之，現代消費建築在浪費基礎上，而且該浪費不再是尋求社會象徵、集體儀式或宗教神聖的浪費，而是出於個性化的欲望，包裝在個體化的自由下，實則是牽動生產—消費系統運轉的非道德浪費，甚至無意義浪費（空洞的「浪費」符號）。它必須動員所有消費者投入不懈的毀棄，才能實現其功能化。接著，我們進一步考察，此種系統性的浪費是如何操作的？

我們已知，浪費不再具有原始社會中集體宗教性的象徵行動，甚至也不侷限於某一社會群體為了區隔其他群體的必要揮霍，例如 Veblen 提出的「炫耀式消費」。消費者社會裡的浪費不僅只是個性化的浪費，同時也是「被直接合併於經濟進程中，更根本的、系統性的浪費；是生產系統產出的，功能性、官僚式的浪費。生產系統產出物質消費品的同時，浪費就被建入商品之中，並成為消費品的性質和面向被強制地消費：商品的脆弱性、內建的淘汰以及時效性」（Baudrillard 1998：46）。平行於生產者社會中被視為不理性代表的欲望追尋在消費者社會裡獲得了肯定，如今看似不理性的浪費與毀滅，實際上正朝著更廣泛的經濟理性發展起來，目的是為了推動市場經濟的無限增長。Baudrillard 直言：「如今的產品並

非是為了其實用價值或可能的使用時間而生產，而是帶著其死亡時間而生產的，而且商品死亡的速度提升將帶來銷售的價格上漲」（Baudrillard 1998：46）。在以浪費為基礎的拋棄式生活中，消費商品與人類欲望都被打上期限，在計畫生產之初就已經預約了死亡時間。

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消費商品的過量生產為銷售廠商及整體社會的經濟帶來新的考驗：要如何消耗掉每年生產出來的新產品？如果每個人需求、使用或囤積的商品數量有限，那是否意味著工業產能遲早將必然停滯？經濟成長的趨緩或停滯可謂是資本主義最深的夢魘，因為維持增長神話永不破滅是經濟市場的首要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打造出跟得上生產速度的消費大眾。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指出保證當代消費者欲望無窮的關鍵要素：若要加速消費與生產的媒合，核心在於縮短欲望的時間間隔，讓消費者一直保有「好胃口」（Packard 1960）。如果將欲望置入時間軸來分析，將會發現我們往往只關注欲望中朝向未來的那個部分，也就是朝向追尋滿足。但如此一來，我們似乎無法完整解釋為什麼欲望滿足有「保鮮期」的後設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消費者總在完成一個欲望後就追尋下一個呢？「誘惑」是最常見的哲學人類學回答，意即消費者總是不斷被新東西誘惑，因而對已經得到的舊東西失去興趣。但這仍然無法回答為什麼在「新」與「舊」這一組相對的文化經濟學概念中，「新」總是比較有吸引力？

現代消費的文化分析已經試圖對此做出部分有效的解釋。Bauman（2001b）指出，消費者所欲望的快樂實際上來自追尋本身。因此當追尋到達終點時，它也就不再有提供滿足的可能，必須要持續前往下一段追尋。而這種對於「追尋」的欲望源頭則出自人類的有限生命。為了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對死亡的不安轉移開來，於是我們不斷追尋新的刺激。另一方面，Campbell（2016）則認為，恰是「自我幻覺式享樂主義」所帶來的幻想與現實之落差本身，令我們始終相信夢境中快樂的實現機會在於那些「新」的東西上。這種「不滿」讓我們持續臆測快樂是否能夠存在於下一個新的產品或服務中，欲望因此不減。但是，無論是「追尋的欲望」或「白日夢的快樂」實際上仍是單向的思辨，並沒有更多去談到「新欲望」

生成的同時「舊欲望」的消逝。生命的新生需要死亡的滋養，消費系統的運作邏輯同樣也有類似新陳代謝的隱喻。

筆者認為，在當代消費的經濟邏輯中，「舊」不一定是在「新」生成時才自動汰換：問題在要讓「新」是「新」，首先必須要創造「舊」。消費與廢棄的循環需要在兩股力量的作用下進行，一是消費欲的拉力，二是廢棄欲的推力。若要令「新欲望」有意義，首先得要摧毀當下已經獲得或正在獲得的滿足。²² 「計畫性淘汰 (planned obsolescence)」正是在消費文化的估價過程中，扮演著商品價值摧毀者的經濟系統機制。

談及現代消費的廢棄基礎，計畫性淘汰難辭其咎。所謂「計畫性淘汰」就是在設計、製造商品時，策略性地影響商品的使用壽命，為該產品設計一段有限的使用時間；在此使用期限過後，商品通常就會因為退了流行、失去部分功能或毀損而必須被淘汰，目的是為了激發消費者購買替代品的動機 (Packard 1960 ; Guiltinan 2009 ; Rivera and Lallmahomed 2015)。

這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因為商品的新舊更替並非新鮮事。經濟學家 Nicholas Barbon 在其作品《論交易》(A Discourse of Trade) (1905) 中就談及了時尚與商業的關係：

時尚或衣物的修改是買賣交易的重要促進者，因為它可以在舊衣服穿壞之前就刺激新的消費：這就是交易的精神與活力：它形成循環與賦值，

²² 消費者首先覺得「這個東西我不想要了」或「這個東西沒有用了」，這些物品因而成為「舊的」。但筆者在此要說明的是，此類「新」與「舊」的劃分並非是二元對立或一刀兩斷的。換句話說，「舊」不必然只能消失或完全無價，它也可以重新成為「新」。在所謂臨時物件 (transient) 與耐久物件 (durable) 之間，實際上有一個模糊的過渡空間，那正是垃圾或舊物的範疇 (Thompson 1979)。比如說，在二手市場或古董市場的交易中，實際上存在一些特定的條件與機制，令舊物被重新估價。有時候，舊的東西恰是因為其歷史感或時間性而獲得新價值，例如專屬於某個時代的服飾或用品，或是舊物原物主身分的特殊性等，都能為「舊東西」增加上「新價值」。此外，「新價值」不一定是使用價值，畢竟有些舊貨的原始功能受損，但經過改裝或修復卻可能轉換其功能；或甚至有些舊貨完全失去實用性，但卻有極高的收藏或交換價值。另一方面，例如在風格、時尚的非物質層次，也能見到所謂「復古」潮流的回歸。這也同樣說明，儘管「新」與「舊」的邏輯看似符合現代性所追求的線性時間，但「舊」並不會完全消失，它總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或是在不同的時空以「新」的姿態再度出現 (Scanlan 2005)。在此處，筆者僅是簡要試舉舊貨、古物與時尚的例子，來進一步說明文中所謂「新」與「舊」的運作邏輯；然而，二手交易或古物買賣的經濟社會學機制並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重點，因此不再多加贅述。

各種商品輪流，好讓交易的主體持續運作（Barbon 1905：25）。²³

Barbon 雖然直指自由市場運作的核心是時尚的邏輯，但是計畫性淘汰的廣泛使用是隨著資本主義擴張，在物質豐餘飽和之後才真正建立起來。直到 1920 到 1930 年代，計畫性淘汰才終於成為製造業與銷售業擴張商品市場、賣掉過量商品的主導策略（Rivera and Lallmahomed 2015；Leonard 2018）。²⁴

進而言之，不同產業與個別商品的計畫性淘汰在實作策略上也略有差異。Packard（1960）根據他對美國消費風潮的觀察，將計畫性淘汰的操作方式分為三種。²⁵ 首先是「功能的淘汰（obsolescence of function）」，意即利用功能上的改良或新增來讓新商品取代舊商品。舉例來說，智慧型手機就比傳統手機多了許多新功能，像是照相、錄影、網際網路等。隨著智慧型手機功能的逐漸改良與增多，傳統手機也逐漸被淘汰。即便到了智慧型手機普及的當代，每一代新手機的推出也還是必須在功能上與前一代做出區隔，例如解析度更高的鏡頭、越來越多顆的鏡頭、更滑順的觸控筆、可折疊的螢幕等。Packard（1960）指出，這種功能性淘汰的策略容易被消費者視作技術性的創新或進步，但該策略在後期也容易偏離「技術」本質，也就是利用一些細節的更新來誘惑消費者，但實際的技術水準並非真正的重大突破。

第二種策略可稱為「品質的淘汰（obsolescence of quality）」，也就是為商品「設定死亡時間（death dating）」。這一策略是 1950 及 1960 年代的商品生產所普

²³ 本處的引用頁碼為「自由線上圖書館」（*The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所提供電子書的檔案頁碼。該版本引用的是由 Jacob Harry Hollander 所編輯出版的 1905 年版本。由於電子書頁碼有可能與紙本書頁碼略有出入，因此特別向讀者說明。

²⁴ 「計畫性淘汰」這個專有名詞大概要到 1955 年才正式出現在 *Business Week* 雜誌中。該雜誌中描述的計畫性淘汰具體指涉到從汽車工業到一般消費品的行銷市場擴張（Strasser 2000：274-275）。

²⁵ 在其他關於計畫性淘汰的分析中，研究者們也對具體商業作為進行了歸納與分類（Guiltinan 2009；Rivera and Lallmahomed 2015）。具體內容大致上與 Packard 所提出的三大類相似，僅在次分類或術語選用上略有不同。筆者在比較和統整後，決定採用 Packard 的分類作為主要的架構，再統合或補充其他作者的歸納。在此處，筆者要額外說明，為了呈現清晰的分析邏輯，分類是必要的論證過程，但市場現實中的商品設計通常會跨越多種策略，所以我們通常可以在同一種商品中發現不同類別的計畫性淘汰並存。

遍使用的策略之一 (Slade 2006, 轉引自 Guiltinan 2009)。在生產時預設商品的死亡時間,顧名思義就是這些商品被設計成在一定的使用次數或時間後,就會壞掉而無法使用。為了能夠在期限內壞掉,商品品質常在生產之時就被打了折扣。美國杜邦 (Du Pont) 公司在 1950 至 1960 年代間開始販售尼龍制絲襪,結實的品質讓這款商品獲得了成功。為了提高銷售量,杜邦公司開始將材質調整得較為脆弱,讓絲襪變得更容易破掉,於是需要經常更換 (Rivera and Lallmahomed 2015)。就事實言,尼龍這種人造聚合物,具有強韌耐磨的性質,在二次大戰期間甚至被用來製作降落傘。但表面上,為了掩飾品質的降低,製造商會推出「新款」來創造消費欲的拉力,透過廣告宣傳讓消費者將注意力轉移到新商品上 (Packard 1960)。除此之外,另一種操作的方式就是設定有限的維修服務 (Guiltinan 2009)。例如,拋棄式相機就被設計成無法修理的狀態,許多一體成型的塑膠製品或零件也無法在損毀後更換。又或者推出新一代商品後,舊商品的零件會漸漸從市場移除。無論如何,當舊型號的商品壞掉時,會很難找到可以替換的零件,而維修成本更不比買一個新的便宜多少。無論是更換原料品質,或者是提高維修門檻,其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商品預設的死亡時間到來,最終將消費者推向替代品市場。

商品本身的淘汰,特別是技術革新的影響,還會造成商品使用系統的全盤更替。換句話說,一種商品在市場上的消失,與其服務相關的其他商品也會一併連帶淘汰。這種現象在電子產品上屢見不鮮。當 USB 取代 3.5 英吋軟盤,電腦便不再需要裝載軟盤的插槽和驅動程式。CD 取代磁帶、DVD 取代錄影帶,那麼磁帶與錄影帶的播放器也就沒有繼續生產的必要了,必須一併替換成與 CD、DVD 相容的硬體 (Rivera and Lallmahomed 2015)。

這些透過設計預設商品使用期限的計畫性淘汰,讓消費者被動地需要去尋找替代品 (Guiltinan 2009)。但是,技術創新需要時間,商品品質亦不能太刻意地降低 (畢竟消費者仍會傾向挑選一定程度耐用的),所以這種被動的替代市場仍有局限性。解決這個障礙的最佳選擇,無疑是讓商品在消費者的主體認知中自然「成為」過時的,無論東西堪用與否。這就是第三種計畫性淘汰的策略——「可

欲性的淘汰 (obsolescence of desirability)」。簡單來說，這是讓消費者不再欲求該商品，讓它「看上去」不再符合潮流，進而成為「認知過時」的。可欲性淘汰填補了功能性淘汰的空檔，讓商品的汰換得以變得更快速即時、不再間斷。同時這也讓廢棄成為一種「主動的」選擇。Packard (1960) 引用 Paul Mazur 的說法：「風格 (style) 可以徹底摧毀擁有的價值，就算它們的功能依然完好。」毀滅商品的價值不再需要經由物質的摧毀來進行，因為剝奪附加的非物質象徵反而更加有效。

丟棄的標準無關功能完好與否，而快時尚的運作就是最好的例證。時尚品牌一年可以推出 52 季，各種款式與顏色的更替讓衣物快速「過時」，促使消費者更努力消費來趕上潮流 (D'Avella 2015)。如今量產衣物變得特別廉價，我們更不在乎它們的品質，反正在真正穿壞之前，早就已經退了流行，不再具有吸引力。從 2000 年到 2015 年，全球人口增長了五分之一，衣服產量卻翻了倍，每件衣服平均穿著的次數少了三分之一。2015 年全球共拋棄了價值超過 4500 億美元的衣物 (Kunzig 2020)。根據綠色和平組織 (Green Peace) (2016) 所公布的「購衣習慣調查」，台灣人每年至少丟棄 520 萬件衣服。

作為一種商業策略，計畫性淘汰可謂是拋棄式精神的原型：商品生命被事前配置好的「死亡」給固定住 (Packard 1960; Strasser 2000; Scanlan 2005)。自從計畫性淘汰被社會普遍接受以來，一直都有相關的倫理辯論：在商品中有意內建的 (built-in) 死亡時間，究竟是否符合商業倫理 (Packard 1960; Strasser 2000)？為了生產與銷售更多東西，消耗大量資源是否合宜？顯然，面對社會經濟增長之需求，躁動不安的消費者已經準備好接受計畫性淘汰，以無盡的廢棄慶祝豐餘烏托邦的到來。持久耐用的商品失去吸引力，無論消費者是主動還是被動地廢棄，人們都逐漸遠離節儉的過往年代。現代消費者從出生就被有限生命的商品圍繞，像是拋棄式紙尿布、脆弱的塑膠玩具以及無數的包裝盒袋。

豐餘的烏托邦為廢棄的行為提供了物質社會性，而消費經濟的新文化則為拋棄式生活提供了觀念正當性。Packard (1960) 大致認為，物質豐餘與過度生產是

美國廢棄精神的形成主因。但進一步觀察廢棄生活的形成歷史，我們將會發現廢棄與許多現代觀念的建立和普及也有密切關聯。沿著觀念考察，可知廢棄精神在消費者社會的新文化裡取得了勝利，有效扭轉了生產者社會中對於「浪費」的負面印象，並正面彰顯在「方便」、「新鮮」與「乾淨」這類文明社會的新價值表述上，成為廢棄生活的合理性，並孕育人們與物品之間的新連帶（Strasser 2000；Hawkins 2006）。

2-3 時間的解放：拋棄用品與家務勞動

雖然廢棄是從消費者社會而生，但是在社會結構的歷史變遷下，廢棄現象本身揭顯出「時間」的內涵。而在人類社會之中，時間又體現為「生命」的形式；直言之，時間的流逝提醒人們自身是會衰弱和可腐朽的有機體生命。若傳統社會將生命流逝的恐懼寄託在神聖的宗教信仰，信仰來世或天堂，則現代社會將人類必死的焦慮轉移到世俗的社會理念，首先是要求勞動生產，再來是渴求消費享樂。基於廢棄現象的時間和生命本質，我們將深入分析消費社會中的廢棄精神是如何連結到「方便」、「新鮮」和「乾淨」等文明觀念，改變勞動與時間、衛生與生命的大眾認知。

當代物品的時間性被包裝在上述理想詞彙中，使得消費商品的物質生命大大縮短了。物質烏托邦的消費想像，透過廣告以降各種媒體的宣傳和行銷，規模廣泛地影響了社會大眾。不止間接刊登在報章雜誌、電視網路上，廣告商亦直接打造他們自己的拋棄式商品，包裝、紙盒、紙巾、吸管等，都成為一種具有時效性的商品展示櫃（Strasser 2000）。印有廣告標語的一次性用品，消費者在使用過後就可以將它們直接丟棄，無形之中也受到了廣告內容的潛移默化。拋棄式生活的理想正一步步隨著新觀念的滲透而成形。

相比古典社會，現代社會的廢棄概念更加複雜含混，往往是正負意向相互交纏的。現代廢棄當然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傳統觀念。Lucas（2002）考察二十世紀歐美家戶的廢棄行為，指出家戶的廢棄行為經常陷入「衛生」與「節儉」的兩難。

但是面對疾病與污染，傳統的節儉美德也得退讓三分。在廢棄還未成為流行概念以前，受限於資源的匱乏，所有的垃圾都可被視作「浪費」。精打細算是持家的基本美德，物盡其用才是有「效率」的家務勞動。但是，由於「衛生」觀念的建立，浪費與「低效率」或「不節儉」的關聯開始減弱。在 20 世紀初的家務勞動出版品中，雖然仍會強調勤儉持家的基本規則，但已經開始為衛生保留一些退讓的餘地。例如 Binnie 與 Boxall (1926) 在《家政學》(*Housecraft*) 中寫道：「從隱私與個人衛生的考量來看，適當地丟棄廚房殘餘是重要的」(轉引自 Lucas 2002)。²⁶

從 Lucas (2002) 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歸納，有效率的家務勞動原本專指物品的使用效率，其社會基礎是在物質匱乏之下「勤儉節約，吃穿不缺 (Waste not, want not)」的節儉美德。進入物質豐餘的時代，「效率」的內涵發生了改變，結果是慾望時效比物質生命更短暫。物品的使用價值不再是主要形式，商品的物質豐餘及其符號過剩對照出來時間的匱乏。所以，消費者社會中的「效率」不在於物質利用，而在於時間運用是否合宜、有效。

在生產線上，效率在乎的是作業程序能否提高有限時間內的工業產量。這種對效率的工業化解讀被廣告轉譯到家戶勞動中，變成了「方便」：

就像工廠裡的效率，在家裡的方便就是為了要節約時間和浪費的精力，但這個概念走得更遠一些。工廠的效率是從雇主的角度提供一種完成工作「最好的方式」，從來沒有保證可以不用受工作束縛。另一方面，方便則被用來暗示商品可以讓家庭主婦從令人不快的事務或勞役帶來的麻煩中解放出來 (Strasser 2000：182)。

消費產品提供了從家戶勞動逃脫的可能，在其中時間是方便的核心。當所有勞動都以時間效率為最高原則，犧牲的就是對物質產品的關照。勞動產品本來體現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係，是指人類種屬有意識地透過勞動改變自然環境

²⁶ 本節僅談衛生和效率的關係，另外有關衛生和乾淨的扣連，請續見本章第 2-5 節。

(Marx 2016)。但如今在「方便」的誘惑下，現代商品提供了欲望滿足的捷徑，也同時壓縮了消費者對物質生命與時間的感知。家務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勞動過程，反而逐步被切割成細碎的步驟，部分被現代工業產品替代外包，因此切斷或簡化了家務勞動者與物質產品之間的互動關係。每個拋棄式商品都在大聲告訴消費者：使用這類商品不僅可以免去眾多麻煩，節省大把時間，卸除後續責任，只要丟掉就好了！

方便的時間才是消費的核心，因為時間是欲望滿足的最終阻礙，而不是物質。如果欲望無窮與選擇自由是消費社會的基本美德，那麼合格的消費者應當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滿足更多的欲望。反過來說，時間的浪費是不被允許的，慾望的滿足不該容忍等待 (Bauman 2001a, 2003)。一旦欲望開始加速滿足，生活也開始加快節奏。

對 Veblen 描述的有閒階級來說，時間的浪費是博取名聲、標誌地位的社會手段。勞動是卑賤之人才需要做的事，是貧窮的證據，休閒生活才是高貴的：

從希臘哲學家時代開始到現時為止，某種程度的休閒，和免於涉足類似供人類日常生活目的所需的生產性工序，一直被有思想的人認為是享受一個有價值，或美麗，或甚至是無可挑剔人生的先決條件。休閒的生活不論是就其本身及其後果而言，在所有文明人的眼中都是美麗和顯示高貴的 (Veblen 2007: 43)。

「休閒」意指「非生產性地消耗時間」，有閒階級藉此體現自己「有足夠財力以維持閒散生活」(Veblen 2007: 51)。²⁷ 對比被生存束縛的勞動大眾，有閒階級的時間是豐餘的。財富幫他們免除了工作與勞動責任，得以有多餘的時間過休閒生活，因而自由生活同時意味較高門檻的經濟生活。大眾的時間通常被勞動佔

²⁷ 在 Veblen 筆下，有閒階級的炫耀式消費主要是呈現在金錢和時間的浪費上。之所以稱之為浪費，因為這些時間和金錢的支出「大體而言並不能為人類生活或福祉服務」，而是為了地位比較的主要目的。儘管 Veblen 並未對個人選擇作出道德批判，但仍難以避免以「無用」與「功用」、「勞動」與「休閒」的概念對照，透露某種評價標準 (Dant 2009)。

據，但在外工作的男性或許有機會休假放鬆，而家務勞動的妻子卻完全被困在客廳和廚房裡。大多數沒條件請傭人的家庭裡，家務勞動的主要責任降臨在女性身上。好在量產商品為廣大女性帶來了「福音」：廣告強調女性也應有放假和休閒的權利，只要購買這些新產品就能實現。新興消費品，包括清潔用品、冷凍食品、紙巾紙盤紙碗等等，全都可以提供傭人般的替代性服務，大大簡化家務勞動，進而創造更多休閒娛樂的時間。簡單說，中產家庭也能轉借他物來體驗他人代勞家務的上流生活（Strasser 2000）。拋棄式產品販賣的是一種不必再被繁雜、冗長和沈重的家務責任束縛的日常生活。它們承諾的是提高家務勞動的效率，為消費者省下時間，甚至不需多花力氣照料物品，反正可以用完即丟。媽媽不需要幫寶適清洗尿布，因為幫寶適（Pampers）紙尿布是「可以沖掉的」，只要在馬桶裡短暫浸泡、沖走就大功告成。紙尿布方便到連爸爸也能夠輕鬆上手。在 1960 年代推出的電視廣告中，使用幫寶適的兩名父親在院子裡照料自己的小孩。爸爸熟練地拿起一塊幫寶適紙尿布說：「你不需要清潔，只要沖走就好了」；看吧，處理小孩的尿布「沒有那麼糟」，而媽媽們終於能放心去逛街，享受休閒生活。²⁸

現代化產品透過提供現成品（ready-made）、簡化操作、用過即丟這幾個主要策略來實現家務勞動的外包，達到時間解放的設計效果。使用這些產品能讓事情變得簡單，節省不必要的勞動時間。消費者亦無需擔心欲望滿足的後續事務，因為清洗照料的相關麻煩都將隨著拋棄式產品進入垃圾桶，眼不見為淨。如同雜誌《女性家庭指南》（*Woman's Home Companion*）（1951）所言，拋棄式產品讓消費者可以「把洗碗和洗衣的麻煩塞進垃圾桶裡」（轉引自 Strasser 2000：270）。

「方便」意指從勞動中解放。因此，Strasser 說到：「除了效率，方便也是自

²⁸ 二十世紀拋棄式產品的廣告大多是針對女性而設計，特別是有關家務勞動的產品。其中原因一方面在於女性仍是家務勞動的負責人，另一方面則是「購物」這件事仍被認為應由女性來執行。值得強調的是，在這類廣告中能夠看到男性角色開始增加。儘管大部分內容持續暗示家務勞動的執行者為女性，但廣告商顯然沒有放棄從男性或兒童的角度來詮釋商品的優點。例如，正文提及的幫寶適廣告，就強調父親在拋棄式紙尿布的幫助下也能勝任照護者的角色，因為麻煩的清洗工作已經被該產品省下了。在下文的各種例證中，讀者亦能從中看到性別差異，但由於本文討論的重點在方便性觀念與拋棄式生活的現代關聯，因此有關性別的討論只點到為止。

由的隱喻和同義詞，一種可以由商品提供的幸福，一種奢侈、舒適、解放憂慮的混合體」(Strasser 2000:184)。她引用 Tiernery (1993) 有關身體與科技的現代性論述，指出方便是現代技術提供的主要功能之一，無疑是現代性的內在組成。在技術的支援下，現代家務注重的不只是如何滿足身體的衣食需求，更在於如何快速滿足這些需求。在現代世界中，身體的需求被視作一種「不便、阻礙或令人不悅的」限制，基本上是對時間的侵犯。因此，現代技術的目標在於盡可能用最少的時間滿足消費者最大的需求 (Strasser 2000)。一言以蔽之，拋棄式商品的終極目的是要發揮節省時間的能力，相對上否定了浪費時間的人類身體 (Kennedy 2007)。

美國公司史雲生 (Swanson) 為了處理感恩節多出來的火雞食材，在 1950 年代研發了一款裝在鋁製餐盤裡的冷凍食品。消費者只需將其放入烤箱 25 分鐘即可享用美味晚餐。史雲生將其命名為「電視晚餐 (the TV dinner)」，一上市就獲得巨大迴響，連帶掀起了新興的家庭飲食風潮。²⁹

吃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若要滿足這個需求實際上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和精力，處理食材、烹飪、照料火候等。這些「勞動時間」理應可以省下來，轉變成「休閒時間」，而史雲生的電視晚餐可以實現這件事。儘管女性普遍被認為是負責家庭飲食與消費的主要族群，但實際上對任何性別、年齡或階級的現代人來說，時間都是都同樣稀有的。所以，在史雲生的廣告中，我們可以看到針對不同潛在消費者的宣傳，共同核心在強調電視晚餐的方便、省時。職業婦女就算被工作耽擱了也沒有關係，晚餐不會因此延遲，因為史雲生的「電視晚餐」可以快速上桌。來一頓簡單的晚餐，就能夠趕上稍早的電視節目，「多虧了史雲生，媽媽已經準備好特別的雞肉晚餐，現在她也能看到電視節目的開場了」。不止女性，

²⁹ 有關「電視晚餐」這個名稱的由來，其發明者 Gerry Thomas 在「歷史頻道」(History Channel) 的電視訪問中表示，電視的普及在當時為消費者帶來神奇的休閒體驗：每個人都喜歡看電視；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將一個食品連結到每個人都想看、想擁有的娛樂媒介，那或許會更成功」。和電視的廣受歡迎一樣，這份加熱即食的冷凍火雞暗示了一種新飲食的方便想像，因為消費者不用從頭採買、備料，省去一堆繁雜的烹飪工作。結果證明，購買電視晚餐的消費者們真的是在電視機前邊看邊吃。

史雲生也為丈夫們帶來生活上更大的突破。一支 1950 年代的史雲生電視廣告主持人如是說：「我可以早一點、晚一點，可以在任何我喜歡的時間去吃晚餐，而且我的妻子完全不需要因此慌張，她只要從冰箱裡拿出一份史雲生電視晚餐。」在這些廣告宣傳中，我們可以看到與消費社會緊密相關的一個概念，就是「彈性」（Bauman 2003）。「時間的解放」不僅意指縮短或免除執行家務勞動的時間，進而意涵為了其他生活活動提供彈性變化的可能性，例如工作與休閒。精神欲望可以超越時間，但物理身體卻很難；不過現在，滿足生理需求的必要時間減少了，更多的時間精力就可以花費在工作和休閒上。

在拋棄式產品的廣告宣傳中，時間是以分鐘為單位來計算的（Strasser 2000）。快速調理食品強調使用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吃到美味的食物，慾望滿足的等待時間被大幅縮短了。多虧了像史雲生電視晚餐這樣的產品，我們終於逐漸走入「工作—看電視—消費」的無盡循環。

「時間的解放」意味著欲望、自由的解放。無論性別或是階級，每個人都能有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外界的消費刺激如此之多，要體驗這些新奇冒險，當然不能被家務或工作束縛。「清洗」和「照料」成了一件麻煩事，也就是說，所有二十世紀以前的生活和勞動預設，都在新世紀的廣告之中被形容成了「苦工」（Strasser 2000）。這些廣告諷刺地成為消費者社會的「共產黨宣言」。從洗衣到煮飯，所有家務勞動都可以透過相對應的物質消費達到至少減半的工作數量和時間。拋棄式產品承諾了時間彈性的自由未來，一個無需關照事物、承擔責任的生活世界。

2-4 新鮮的永恆：賽璐玢與有機體

若從上述的討論歸納，拋棄式生活的形成體現了現代性的時間觀，此即超越有限時間對人類生命的束縛。由於人們渴望逃離有機體的必死命運，因此現代科技持續發展，努力突破生命限制。但是，「時間是我們無法逃離世代繁衍與衰弱之普遍進程的證明，因此懶惰（邀請時間來侵蝕生命）必須要被抵制，免得它揭

露了我們控制它的企圖」(Scanlan 2005: 33)。時間流逝是具有破壞性的，對於生命有絕對的威脅。在生產者社會，時間必須用於禁慾工作；在消費者社會，享樂休閒意欲填滿時間。

與生命時間直接相關，拋棄式生活提供的另個文明價值就是「新鮮(fresh)」。透明的塑膠袋裡擺放各式蔬果，一袋袋放在貨架上供消費者挑選。經過特別包裝及擺放的产品靜靜躺在塑膠袋中，就像是水晶球裡的夢幻小屋一樣。還有那些冰櫃裡包著保鮮膜的食材，彷彿剛從屠宰場送來似的，泛著誘人的色澤。塑膠包裝賽璐玢(cellophane)的出現為食物保鮮帶來新的可能性，取代了過去使用的咖啡色牛皮紙或蠟紙。³⁰ 用賽璐玢包裝的餅乾和起司，可以讓你在飢餓的時候隨時取用，完美符合消費者社會慾望的即時滿足。由此推論，當我們使用賽璐玢的拋棄式產品，提供「新鮮」保障之時，也看到即時性又弔詭地與永恆性糾纏在一起了。以下是美國公司杜邦(Du Pont)在1950年代推出的賽璐玢廣告(圖一)：



圖一：賽璐玢包裝平面廣告

在賽璐玢裡所有東西都是最好的狀態 (*Everything's at its best in Cellophane*)，

Du Pont, 1956

³⁰ 賽璐玢又稱作玻璃紙。它是一種由纖維素製成的透明包裝紙，因其能夠有效降低空氣、水份、油脂及細菌的穿透力，因此被普遍用作食品包裝。

在這個宣傳廣告中，小男孩被包裹在透明塑膠包裝袋裡，一旁寫著：「媽媽說我又新鮮又乾淨（有時候），要把我包進賽璐玢裡，好讓我保持這種狀態。」廣告的下方，則是強調此種包裝袋可以讓東西保持乾淨、新鮮，同時還能讓你看到商品的樣貌。「新鮮」本來就是具有時效性的一種狀態，因為食物不可能一直保持乾淨與新鮮。作為有機物質，食品跟人體一樣有必死性的主要特徵，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腐敗。但是，塑膠包裝的出現為打破生命時間的限制帶來了希望，它可以保存食物的最美好狀態，將時效的限制加以延長或是定格。宣傳語彙呈現的是對美好狀態的定格，而從實際效果看，則是對新鮮狀態的延長，或應說延後食品腐敗的到來。在某種程度上，這彌補了拋棄式生活裡神聖永恆性的喪失。至少可以說，透過「新鮮」的保證，我們在這類廣告中，似乎看到當代消費者在追求慾望即時滿足的背後，依然還保有對肉體死亡的恐懼，以及對永恆生命的渴望。只不過，永恆的承諾如今已不再以儀式獻祭的集體神聖呈現出來。

「永恆」直接挑戰了有機體生命的時間限制。當社會不再提供永續未來的承諾，現代消費者必須自行創造穩定感。Bauman (2001b) 甚至認為，現代人不斷追尋新刺激、新冒險的原動力就是來自對有機體死亡的恐懼，因為追求欲望的過程本身能讓我們短暫將注意力從死亡的事實上移開。但是，即便消費者社會提供斷裂的愉悅瞬間，保證欲望的無窮無盡，仍無法消解我們對於生命終結的恐懼與掙扎。失去了傳統宗教信仰的死後世界之寄託，我們只得在追尋某物的慾望狀態裡延後必死性的生命結局 (Bauman 2001b)。

廢棄總是讓我們立即聯想到死亡。簡單來說，死亡是廢棄的終極形式，是從有機生命回歸無機物質的還原過程 (Scanlan 2005)。所以，我們害怕廢棄，因為廢棄是死亡與消逝的信號 (Lynch 1990)。死亡命運是古今人類揮之不去的痛苦與掙扎；畢竟，眾多廢棄與污穢的傳統儀式，或多或少都與死亡、虛無或「另個世界」有關。在殯葬儀式裡，有些東西的廢棄是蓄意的，例如古埃及墓室裡的陪葬品、中國喪禮燒毀死者衣物等等。在這些儀式中，物品的生命隨著主人的生命一起逝去，或者前往下一段旅程、下一個國度 (Lynch 1990)。但是，現代社會對於

於死亡態度發生了改變 (Lynch 1990 ; Scanlan 2005)。Lynch (1990) 認為傳統社會敬畏死亡，但現代社會否認死亡。人們將高齡、重病、將死的人「隔離」到醫院，所有與死亡相關的空間都被安排在日常生活的邊緣地帶。死亡成為專業人員，比如醫生護士、長照看護、殯葬業者的工作。如今有關死亡的宗教儀式僅剩殘餘，反而令現代人更加懼怕有機體的必死性，並更積極防止、管控疾病與死亡。最極端的例子當然是人們開始將自己或親人的身體冰存起來，期盼在找到治病方法的未來社會再次復活 (Lynch 1990)。

很顯然，科技社會將原本存在宗教信仰和儀式裡的生命永恆從來世帶到了現世，提供一種克服有機體必死性的物質化可能 (Scanlan 2005)。憑藉科技的發展與進步，現代性創造出一種線性的時間錯覺：在神聖和自然的時間之外可以存在一種屬於「人類的時間」，物質不滅的現世烏托邦。也可以這麼說，現代性是基督宗教的雙生體，只是天堂不在另一個空間，而是指向無限未來 (Scanlan 2005)。消費者社會走得更遠，所謂天堂甚至不在未來，就在當下即永恆的新鮮。自「新鮮」的例證中，我們看到對於有限生命時間的人類焦慮從未消失，僅是從宗教永生的信仰下降到社會消費的價值，隱藏在日常行為的技術徵兆中。

2-5 乾淨的大眾：衛生觀念與廢棄精神

時間與生命是最貼近人類命運的概念，現代廢棄的建立也直指這兩個核心。現代性企圖擺脫有限時間對人類生命的束縛，這點在醫療技術與公共衛生的發展方面尤為突出。在現代生命觀下，「衛生」扮演廢棄文化的主要角色。

自古以來，廢棄就與「衛生」和「髒污」的對立概念脫不了關係。嚴格說，人類社會中有關髒污與衛生、疾病與健康的歷史也非常悠久。但 20 世紀以前，受限於資源、技術與知識水準，個人衛生只是特定階級的特權。並非家家戶戶都有可以洗澡的浴缸，而廁所也只能設置家戶外部供鄰里共用。在此情形下，個人衛生 (personal hygiene) 自然被視作中高階級標誌優越地位的道德指標之一。擴大到產業層次，城市環境的發展改善也讓保持清潔這件事變得更容易和更便宜

(Strasser 2000)。

乾淨的環境是門大生意。從城市建設的公共衛生，包括家戶自來水、都會下水道、個人衛浴品的安裝與更新，衛生儼然成為 20 世紀社會的現代化指標之一。一戰過後，私人浴室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基本配置，使得美國國內的浴缸銷售量在 1921 到 1923 年間增加了一倍。與此同時，有關細菌等微生物的科學知識也透過報紙、雜誌等媒體傳播，讓大眾對髒污有了更敏感的意識 (Strasser 2000)。「清潔」成為新時代的個人道德，同時也順勢成為推動拋棄式產品的主力動機。

以拋棄式產品來維持個人乾淨不算什麼新鮮事。在塑膠發明和普及之前，紙類在十九世紀是拋棄式商品的主要材料。紙袖口 (paper cuffs) 及紙領子 (paper collars) 可算是美國最早普及的紙制拋棄式商品 (Strasser 2000; Freinkel 2011; Rivera and Lallmahomed 2015)。Walter Hunt 於 1854 年發明並取得專利，但紙領子的流行在他離世後才真正開始。³¹ 1860 年代起紙質拋棄式用品就有不少產量，戰爭時期的棉花短缺更進一步刺激了拋棄式的紙衣物市場。拋棄式的紙袖口和紙領子在男性消費者中廣受歡迎。這一類的拋棄式衣物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打造足夠便宜、用過即丟，同時又保證一定的品質，讓消費者穿上一兩天。棉質的衣服可以穿好幾天再洗，但無法被外套遮住的領子及袖口則難以隨時保持乾淨。硬挺有領的著裝一方面符合當時流行的男裝時尚，另一方面可拋棄式的材質又可以與棉布料的衣著本體分離。這些穿髒即丟掉的衣著裝飾，滿足了那些沒有妻子幫忙洗衣，又請不起女傭或花錢送洗的單身男性的需求。

「拋棄式紙製品培養了這樣一個觀念：至少在為了保持乾淨這件事上，使用拋棄式商品來取代耐用商品是可以被接受的」(Strasser 2000: 174)。由此可見，從個人衛生的大眾化開始，伴隨著社會對於髒污與潔淨的價值轉變，還有工業生產的技術進步，「乾淨」逐漸成為養成現代廢棄行為的文化助力 (Lucas 2002)。

在日常實作上，廢棄顯然與自我照顧有密切關係。廢棄的行為習慣能夠讓我

³¹ Walter Hunt (1796-1859) 是美國機械師，同時也是多產的工業發明家。他還發明了縫線縫紉機、安全別針等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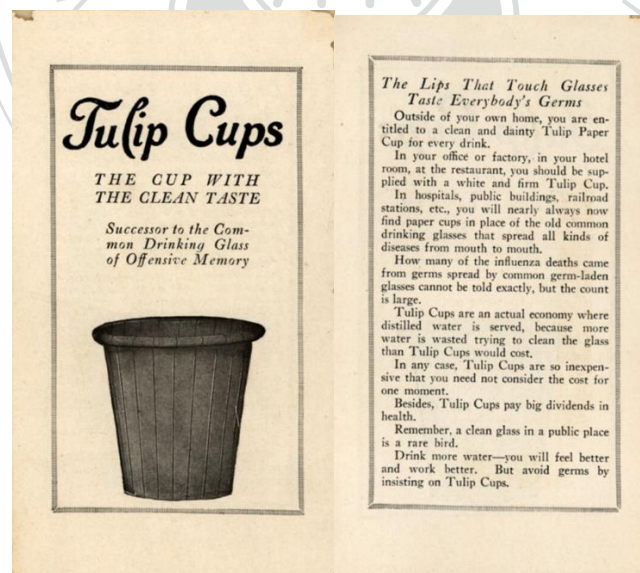
們自身感受到潔淨與舒適，同時也帶來其他「好的感受」(Hawkins 2006)。女性生理用品是最具代表性的拋棄式衛生用品之一，它的普及同時標誌著現代女性的「新形象」。³² 1921 年靠得住 (Kotex) 推出第一款拋棄式衛生棉，開啟了拋棄式生理用品的輝煌歷史。在廣告中，靠得住將拋棄式衛生棉描述成一款現代化的產品，暗示消費者若是選購其產品就能成為有品味、更講究的新時代女性，強調可讓女性在經期也能「快樂、自在、有效率」(Strasser 2000)。新女性消費者不再需要像母親或祖母那一輩自行用破布拼裝墊片；她們可以選擇採用拋棄式衛生棉，照著說明書步驟丟入馬桶沖掉即可，乾淨衛生又便利省事。在靠得住廣告中的女性不再以家務勞動為主要形象，因為拋棄式用品讓女性能夠走出家戶，自在地旅行玩樂。解放女性的傳統形象確實讓衛生棉這類「不登大雅之堂」的私人衛生用品有了擺脫禁忌，進入公眾視野的可能，而且電話郵購的行銷發展也讓女性能夠更有隱私地購買此類商品。但 Strasser (2000) 傾向強調，「乾淨」與「便利」的觀念普及才是靠得住之所以銷售成功的重要基礎。當時的一位管理顧問在她的市場調查報告中提到，使用拋棄式衛生棉的新女性世代比她們的祖父母輩「有更高的衛生標準」(轉引自 Strasser 2000: 174)。一張刊登於《畫報評論》(Pictorial Review) (1923) 雜誌中的靠得住廣告亦如此寫道：「習慣和傳統改變了。生活條件改善了。……如今，靠得住讓新的衛生習慣成為可能。」³³

伴隨個人主義的現代發展，衛生與乾淨也創造出「公共」與「私人」的區分新意。除了個人衛生，公共衛生也與拋棄式生活有密切關聯。有關微生物的知識隨著媒體宣傳進入家戶巷弄，大眾對於可能致病的細菌敏感起來。細菌理論 (germs theory) 的科學知識結合了公共衛生和政府政策，成功建築起現代廢棄的

³² 所謂女性「新形象」實際上是現代凝視的產物，不僅有男性對女性的性欲凝視，也有女性對女性的競爭凝視。靠得住藉由廣告的修飾傳遞了一個新興價值、一個女性樣板，那就是「現代女性」是「富裕的、時尚的、裝飾性的」。但實際上，靠得住的廣告並沒有完全擺脫社會對女性的傳統束縛，反而是變相將傳統女性的理想重新置入現代女性的氣質，創造出「自信」、「迷人」、「無暇」的女性形象。儘管靠得住的產品對生理衛生的保證看似意圖在解放女性的身體自由，但廣告中呈現的意識形態仍然在暗示女性的生理宿命 (Mandzuik 2010)。

³³ 《畫報評論》(Pictorial Review) 是 1899 年到 1939 年出版的美國婦女雜誌。

文化觀念。根據 Strasser (2000) 所述，二十世紀初的紙杯製造商聯合公共衛生權威向政府進行遊說，禁止民眾在公共飲水裝置使用可重複使用的普通杯子喝水。儘管紙杯的推行遭遇了一些阻礙，沒有那麼快地被接受，但製造商毫不氣餒，一再地拿出醫療證據，證明細菌確實存在公用裝置上，所以只有拋棄式用品才能保障乾淨衛生。從「鬱金香杯 (Tulip Cups)」(拋棄式紙杯) 的廣告中，我們能清楚看到，細菌學說與衛生觀念是如何被用於拋棄式產品的宣傳上。從廣告的標題就開始主打拋棄式紙杯是一個可以讓消費者品嚐的乾淨杯子。以往的飲水站提供的是重複使用的玻璃杯子，但在拋棄式紙杯問世後，共用玻璃杯被描繪成對個體健康的侵犯與威脅：「碰觸到玻璃杯的嘴唇就等於接觸了每個人攜帶的細菌。……我們不得而知到底有多少致死疾病的病菌是靠著玻璃杯傳播的，但數量一定很大。」除此以外，經濟效益也是拋棄式紙杯的一大亮點：可以減少乾淨水源的浪費，這無疑是計算清洗成本後的理性經濟選擇。如此一來，對於提供飲水或自助飲料的商家來說，除了衛生考量之外，也樂得省下玻璃杯及清洗的成本和麻煩。



圖二：拋棄式紙杯平面廣告及部分內文

鬱金香杯：可以乾淨品嚐的杯子 (Tulip Cups: The Cup with the Clean Taste) ,

Chatfield & Woods CO. , Unknown

新生活習慣的普遍建立，除了依靠新知識的推廣和新商業的行銷以外，新政治的公權力是不可或缺的推手。免洗餐具在台灣社會的推廣流行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林崇熙（1998）在《免洗餐具的誕生：醫學知識在台灣社會性格分析》一文中，論證了一九八零年代在多方社會力量的交織下，有關 B 型肝炎的醫療與衛生觀念為台灣社會帶來的行為影響。

70 年代的台灣，B 型肝炎盛行。即便肝炎本身的死亡率不高，卻對其他重大疾病如肝硬化或肝癌有一定影響。醫療專家們的努力終於讓政府了解 B 型肝炎對國人健康的危害，於是在 1980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肝炎防治委員會。B 型肝炎獲得政府部門的公開重視之後，立委們也開始密切關注公共衛生的相關舉措，要求政府制定相應的公衛規範。儘管當時醫學上還未證實唾液是肝炎的有效傳染途徑，但為了防範於未然，許多輿論都將矛頭指向餐飲業，要求衛生署推出一系列的稽查與規定，確保台灣餐飲環境的衛生安全。在一系列質詢中，立委們提出各種建議：對攤販做衛生稽查、確保自來水供給、穿著白色制服做生意、推行公筷母匙及免洗餐具等等。立委楊寶琳就提出，筷子很可能成為肝炎傳染的途徑，雖然「我們現已提倡公筷母匙，但是日本更進步，他們使用過的筷子就丟掉」。³⁴ 從此以後，一次性餐具被視作改善餐飲衛生的「先進」選擇。因為這雙筷子只會被一個人使用一次，用過後就丟掉，再也不必擔心店家清洗是否乾淨。在各方關切下，衛生署研擬一系列宣導及規範，規定攤販若不具有符合規定之餐具消毒清洗設備，就必須要準備免洗餐具。這一系列的宣導跟規範，讓台灣的一次性餐具需求量暴增了兩三倍之多。想當然爾，隨之而來的便是後續棘手的垃圾處理問題。免洗餐具的使用量增加，意味著台灣民眾已經接受以衛生為前提的拋棄式消費。免洗餐具成為「乾淨」、「衛生」的具體象徵，深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文明的餐飲秩序與用餐習慣。「免洗餐具在台灣出現不僅標誌著台灣民眾開始注意飲食衛生，更代表著台灣社會進入了大量消費的時代」（林崇熙 1998：1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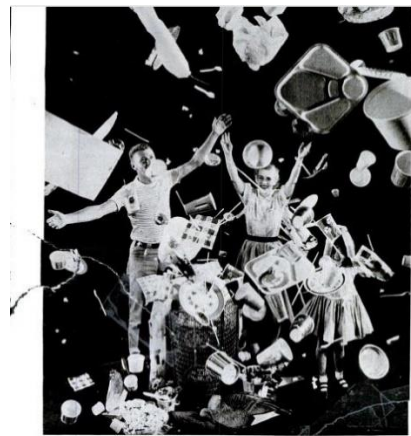
³⁴ 〈內政委員會第六十九會期第十一次全體委員會會議記錄〉，《立法院公報》71 卷，82 期，頁 125-126。轉引自林崇熙 1998：23。

現代社會的人們對於自身乾淨的維持和關照具有一定的敏感度；保護自己不受其他感染風險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動物性本能（Curtis 2007）。從男士的紙領子到女士的衛生棉，再到紙杯、免洗餐具，在在都強調拋棄式商品能更方便、更乾淨地維持個人健康及公共衛生。基於「衛生」的「清潔」是新時代的生活道德，為拋棄式商品搭建了文化和政治舞台，合理化這些商品用過即丟的短暫生命。以「衛生」為基礎的拋棄式用品無疑是現代廢棄精神萌芽的最佳見證物。

拋棄式生活的形成不是單一因素的作用結果。僅僅經由技術革新或廣告宣傳無法達到全面深入行為的日常生活改革。要理解廢棄精神如何成為消費生活的基礎，必須將之鑲嵌在歷史社會和文化政治的整體脈絡中理解。從計畫性淘汰到拋棄式家戶用品、衛生用品的普及，我們希望已經透過多方面的具體例證，凸顯現代廢棄生活的核心問題意識——「時間」與「生命」。我們無法避免地在討論中不斷回歸到「時間」與「生命」這對價值上，發現到現代廢棄精神在主觀上超越和客觀上隱藏的是面對人類有限生命時間的焦慮或者恐懼。始於計畫性淘汰、直到新鮮化包裝、再到拋棄式用品，都可以說是現代社會企圖延遲死亡時間、模仿永恆生命的具體例證，只是反諷的後果卻是生產了大量「被宣告死亡」的事物。正如 Scanlan（2005：37）所言：「時間提供了垃圾生產的基本條件，在它的框架裡，事物都變得容易腐敗而且無用。」

第三節 消費以廢棄為本：新奇時尚的勝利

1955年，美國雜誌《生活（Life）》刊登了一篇頌揚拋棄式產品的文章，標題為「拋棄式生活（*Throwaway Living*）」。文章中搭配了一張攝影（圖二）：一家人愉快地站在影像中央，伸出雙手擁抱從天而降的各種拋棄式餐具，欣喜地迎接新時代生活。



Throwaway Living

DISPOSABLE ITEMS CUT DOWN HOUSEHOLD CHORES

The objec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in this picture would take 40 hours to clean—except that no housewife need bother. They are all meant to be thrown away after use. Many are new; others, such as paper plates and bowls, have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but are now being made more attractive. At the bottom of the picture, to the left of a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trash can, are some throwaway vases and flowers, popcorn that pops in its own pan. Moving clockwise around the photograph come assorted frozen food containers, a checked paper napkin, a disposable finger (recently suggested as one reason for a rise in the U.S. birth rate) and, behind it, a table's leg. At top are throwaway water wings, foil pans, paper tablecloth, game board and a sectional chair. To right is an all-purpose bucket and,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picture, paper cups for beer and highballs. In the bucket are throwaway diapers, ash trays, garbage bags, hot pads, mats and a feeding disk for dogs. At the base of the bucket are two more for baskets to throw away: disposable goose and duck decoys.

圖三：《生活》雜誌中有關拋棄式生活的文章
拋棄式生活 (Throwaway Living), Life, 1955

現代廢棄建築於物質生活的豐餘和過度基礎上，是物質烏托邦的構成部分。拋棄式生活描繪了一幅社會整合的美好圖像，超越性別、階級、種族的階層劃分，使每個人的欲望都能立即滿足，並且無需負擔責任。

在本章論證中，筆者試圖說明，拋棄式生活的形成與文明社會的觀念建立和普及有密切關聯。首先，經濟效率的邏輯被轉譯成為日常「方便」的實踐，暗示拋棄式商品可使消費者從有限時間的束縛與關照事物的責任中解放出來。其次，塑膠包裝的使用讓「新鮮」的物質永恆成為可能，一定程度上反證了現代人對於有機體必死性的古老焦慮與不安。其三，「衛生」終於為拋棄式生活提供科學和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建立個人和公共生活的文明態度。

以現代性總結，廢棄的邏輯就是時尚的邏輯。所謂「時尚」是指形式上追求創新進步的線性時間，但內涵上卻產生新舊反覆的循環時間：它預設未來總是比過去要好，因此「在現代社會，基督宗教的永生概念被世俗化成一種無法逆轉的時間，這是一種承諾未來的進步會克服種種錯誤、缺陷與不完美的概念」(Scanlan

2005：34)。

操作時尚邏輯的現代廢棄生活，表面上創造了逃脫神聖和自然時間束縛的現世烏托邦，但抬高人類生命的代價卻是物質生命的貶低和漠視。對慾望即時滿足的追求不止改變了消費者的社會習慣，同時也改變了人們與物品的自然關係。Baudrillard 就認為，消費者慾望的是物品符號，而非物品本身 (Baudrillard 2018)。消費欲望是立基於自我缺失的外化追求 (Bocock 1995)。一旦物品成為符號之時，它也就變成可拋棄的了 (Kennedy 2007)。換句話說，消費物品對於現代消費者只剩下符號價值，掏空了物質實體。這樣說來，一旦商品的符號價值在消費文化中遭到貶值，那麼附屬的物質實體也隨之被判了死刑，無法聲稱其存在的理由。而幾乎就在消費行為的當下，符號的價值和意義也開始消亡；商品一旦被消費，就成為無用的 (useless) 和無力的 (powerless) (Lynch 1990)。人們不再重複使用和愛惜保存同件物品，不花時間和精神修復、改造物品，拋棄式生活終於成為消費者社會中令人注目的基礎和後果。

本章旨在論證，潛藏在「消費的欲望」之下有一種「廢棄的慾望」存在。當消費者社會宣稱「自由」就是消費的自由，同時也默認了廢棄的自由 (Hawkins 2006)。在以浪費為基礎的消費行為當中，消費慾望與廢棄慾望的關係產生微妙的翻轉。如今對廢棄與破壞的渴望反而成為消費的隱藏動力，與生產和創造完全脫勾。對「新」的追求同時意味著對「舊」的遺忘與毀滅。甚至於，所有「新」的東西在被生產之時就已經寫入了毀滅的基因，在不久的將來或時效的到來日子，就必須被毀棄。

廢棄生活是消費自由秩序的基礎，也是後果。廢棄不僅是丟掉無用的、不需要的，也是遺忘，是迫使消費者將眼光轉向下一個瞬間的推手。我們實現了無盡欲望的追尋，消解未來的等待，享受當下、遺忘過去。拋棄式生活的建構撐起現代便利、新鮮與衛生的永恆生命；我們不活在宗教神聖的來世，但仍活在廢棄之物的永生不死中。

第四章 治理的秩序：垃圾的公私兩極化

「在歷史上，原來是骯髒的城市座落在乾淨的鄉村之間，
後來是乾淨的城市被它們的廢棄物所圍繞。」

“The filthy cities of history, which sat in a clean countryside,
are succeeded by clean cities encircled at some distance by their wastes.”

Kevin Lynch

“*Wasting Away*”, 1990

拋棄式生活的形成展現了現代消費文化超越人類有機體生命與時間的慾望，但追求新奇時尚的結局卻是創造出不死的垃圾。恰是這種廢棄產物的事實存在，威脅了消費社會自由秩序的穩定。廢棄物成為社會生活的首要威脅，垃圾治理是現代秩序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換句話說，要討論廢棄在現代生活的秩序形成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不可能繞開有關治理的議題。在這一章，我們要從治理角度探討垃圾處理是如何透過整飾消費社會的暗影，成功地將爭論轉移到技術科學與管理政治的理性領域。在此，我們將垃圾治理看作是消費社會的後台場域，並嘗試將治理的秩序和自由的秩序扣連起來，旨在凸顯自由和治理、慾望和責任的一體兩面性。延續上一章討論的兩個核心觀念「時間」與「生命」，筆者將說明垃圾治理是如何延伸了消費自由的後端邏輯：人們為了逃出生命時間的焦慮與害怕，結果卻是掉入生命權力的科學治理中，成為承擔道德責任的主體。

第一節 從商品架到垃圾堆：浪費儀式的遺跡

在上一章，筆者以拋棄式生活之形成為主軸，討論了有關效率與衛生的現代觀念如何創造了用過即丟的現代烏托邦。基於時間和勞力的「節約」或「方便」，並且涉及生命健康的「衛生」或「乾淨」這兩組核心觀念，拋棄式商品被賦予了全新的象徵價值。當代的「廢棄」儀式表面上解放了消費者時間與生命的自然限制。

在拜物主義的符號學解讀中，物品的社會價值是被符碼系統過度決定的

(overdetermined)。因此，我們不僅是在使用物品的物理效益，還能在集體想像的層次上使用該物，透過各種儀式使得某些物件神聖化，變得令人渴望、讚揚與崇拜（Dant 2009）。筆者認為，若運用在拋棄式產品上，這樣的解讀會產生一種具相似內涵，但差異呈現的效果，而且更加有原始宗教的獻祭意味。具體來說，用過即丟的使用方式，就是透過貶抑物質實體來取用拋棄式商品的社會價值，因此具有一種神聖儀式的意涵。

拋棄式商品的物質價值貶抑是其社會價值提升的前提。例如，塑膠餐具的「衛生」與「方便」是此類產品的社會價值，但是當我們強調其社會價值時，被犧牲的正是其物質本體。構成餐具的塑膠材料，不僅在生產時就被製作成輕薄易碎，而且在其真正損壞、喪失使用價值之前就要被丟掉。我們常說現代人沉迷於物質主義，或是太注重物質生活，但這樣的說法並不完整。消費社會確實是一個物質豐裕的現實社會，但同時也是象徵氾濫的符號社會。至少在拋棄式生活的各項例子中所體現的，並不是名符其實的「物質主義」社會。我們實際執迷的是物品的符號，而非物質本身，那可感覺、又超感覺的符號價值，作為交換價值的延伸。消費者購買拋棄式產品時，被購買的正是其「方便」、「新鮮」、「乾淨」等符號價值，但商品被使用以後等同受到污染，其符號的社會價值大打折扣，立即失去了「衛生」的效用。在拋棄式商品的使用中，我們崇拜的是以「拋棄（disposal）」這種新使用形態所保障的新象徵價值。因此，「廢棄的自由」首先作用於物品的象徵層次，拋棄式產品大多是先在象徵社會層被宣告死亡，才失去效用而成為垃圾。

論述至此，日常用品完成了從「商品」到「垃圾」的形式轉換。進而問題指向到如何處理喪失了社會價值的物質本體：在完成其方便或衛生的使命後，成為垃圾的物品該如何處置（dispose）？物品的真實死亡，亦即其物質性的徹底毀滅或型態轉換，通常是透過掩埋、焚燒或者回收，在垃圾的治理系統中完成的。但這並不意味消費的系統與治理的系統能夠完全割裂開來。如果商品消費作為文化目的要在四處搜刮享樂，那麼垃圾治理作為技術手段就在後頭收拾殘局，協助處

理浪費儀式遺留下的碎片。

在討論技術系統如何進行垃圾治理之前，我們理應先回答，為什麼垃圾會成為一個需要被治理的社會甚且是政治問題？垃圾治理的正當性通常圍繞在「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的價值表述上，但這些還是屬於較下位的詮釋觀點。事實上，一旦我們把關注焦點放在「垃圾」代表髒污的一種形式，進而討論起它會如何對環境衛生產生威脅時，就首先掉入了技術治理的限制眼光中，從而忽略了垃圾處理作為日常治理的儀式意義。筆者試著跳出現代性的衛生觀念，來到象徵層次上思考廢棄物與社會秩序的關係。該分析取徑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垃圾治理與消費自由這兩種秩序之間的邏輯關連。

秩序與無秩序是相互證成的：在我們設置秩序的地方也標記出排除的位置。簡言之，我們在設計秩序的同時也創造了廢棄物；反過來說，界定廢棄物才可使得秩序產生意義。綜言之，廢棄物是秩序創造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結果是整個過程賦予了廢棄物一種矛盾性質，使其具有既神聖又邪惡的性格（Bauman 2018）。要將廢棄物分離進而除去，才是秩序創造的頂峰成就：

秩序的前景（任何新秩序的新前景）都來自「混亂」這一惡魔的巢穴。混亂是秩序的變體自我，是具有否定符號的秩序：它是某事物不在恰當的地方，沒有發揮恰當作用的狀態（如果可以想像出對其恰當的位置和作用）。這一「事物」既無處所又無作用，它跨越了區別秩序和混亂的障礙。將它除去是秩序建構工作結束前最後的創造行為（Bauman 2018：68-69）。

工具性的防治疾病或保護環境並不是治理儀式的唯一功效。在此之上，它首先是一種維持界線、確認分類、建立秩序的象徵行為。Douglas 指出，與原始文化不同，現代社會的儀式經驗並非集中在宗教場域，而是分散在不同領域：「我們現代人在許多不同的領域裡操作象徵行為」（Douglas 2018：82）。現代人通常會運用衛生科學來「證明」自己的規避行為是合理的，但其實我們的行為也帶有

象徵的涵義。若是可從秩序層面切入垃圾治理，就不難理解該日常實作中隱含的儀式意義，大致印證了 Douglas 所言：「負面儀式和正面儀式都一樣。那些禁令描繪了宇宙的輪廓和理想的社會秩序」（Douglas 2018：85）。

對 Douglas 來說，經驗秩序的法則同等作用在神聖和世俗的領域中，而無論是現代人或原始人皆是秩序法則作用之下的社會主體。只要在秩序生產的過程中，就會有失序的殘留物被產出；進而，這些「混亂無形」、「位置不當」的物就具有威脅、破壞秩序的力量，也就是 Douglas 定義的污穢（dirt）。正因如此，超越了公共衛生及環境治理的尺度，「對污穢的思考包含著對有序與無序、存在與不存在、有形與無形，以及生與死這些問題的反思」（Douglas 2018：17）。

廢棄物作為消費自由的秩序殘留物，反過來威脅了消費文化的自由秩序，因為它的存在大刺刺地證明了物質浪費，令消費自由背負污名。Lynch 是這樣描述廢棄物的：「廢棄物是對於人類意圖沒有價值或沒有用的東西。它是在不產生任何明顯有用之效果的情況下對事物的貶低；它是損失（loss）、遺棄（abandonment）、衰退（decline）、分離（separation）和死亡（death）」（Lynch 1990：146）。何謂浪費的認知與生產消費的條件有關，比如：沒有被合理使用的資源會被認為是浪費，但在正常使用下的損失則可被視為必要；另外，在無法預測的某些情況下產生的損害，例如自然災害的破壞，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當人們增進控制和預測事物的能力，也會同時增加浪費和損害產生的機率。這正是為何「廢棄物暗示了人類的疏忽與失敗」（Lynch 1990：146），意指人類對事物的預測和控制能力在理想上與現實上的落差。直言之，我們急於隱藏廢棄物的存在，於是創造出「垃圾（garbage）」這個類別作為治理的對象，以此來掩蓋浪費的事實，連同可能被揭露的短處（Kennedy 2007）。

Bauman 中也明確指出廢棄物處理是如何被併入現代秩序中的：

廢棄物是所有生產中最羞於被提及、最黑暗的秘密。它最好永遠是秘密。
實業巨頭們寧可根本不去提它——只有在大力逼迫下他們才承認。冗餘戰

略在設計生活中不可避免，刺激、鼓勵、加快了生產成果和廢棄物的產生，使得掩蓋秘密成了苛求。大量的廢棄物不可能被忽略或緘口不談。於是，廢棄物處理也成了現代生產中的一個分支（同時出現的還有安全服務，即以其他方式維持掩蓋政策，旨在延緩被壓制物的回歸），但是它永遠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現代生存——生命的現代模式生存——仰賴垃圾處理的靈巧性和專業性（Bauman 2018：64）。

所以，我們可以說，垃圾之所以必須被妥善處理，除了其增長現象已經無法令人忽略，還因為其增生既威脅了社會秩序，又威脅了人類生命。混雜的垃圾是對分類秩序的否定：不死的垃圾映照出生命的短暫，提醒我們企圖超越生命限制的失敗。換句話說，垃圾的存在不斷提醒著人類生命的必死結局，威脅到消費社會象徵的自由秩序，並且也確實在經驗層次上威脅了我們的健康。作為「被壓制物」的垃圾具有破壞秩序的力量，因此必須延緩或嚴防其回歸。垃圾處理成為現代生存必須仰賴的日常服務，也是維繫「方便」與「衛生」的現代生活之必要手段。

接下來，筆者將分別從公私領域的兩面治理，說明現代社會如何透過垃圾的處理維繫秩序的穩定，讓我們既可涉入治理系統，承擔起部分治理責任，同時又與治理問題保持距離？

第二節 公領域的治理：生命政治與公共衛生

在有關討論中，垃圾治理系統的建立經常被看作是社會現代化的技術指標。但在本質上，人類對垃圾的處理方式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可以大致區分出四種基本方式，分別為傾倒、焚化、回收、減量（Rathje and Murphy 1999）。只不過是，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由於城市發展、居住環境、物質使用、經濟活動與科技發展等等的因素差異，四種基本的處理方式會呈現占比的不同。即使大同小異，但隨著社會知識及權力的不斷變遷，圍繞在垃圾治理這個主題上也確實發展出現代特有的治理術。

簡言之，相較於技術處理的層面，治理秩序中的象徵權力及其運作方式才是區分傳統垃圾處理與現代垃圾治理的關鍵面向。更具體說，過去以民間經濟為主的垃圾處理方式，現在經由政府介入的集中管理，這才使得垃圾治理產生了現代的新意。

Michel Foucault (1991) 在《治理術》(Governmentality) 中談論了 Guillaume de La Perrière (1567) 對「治理」的定義：「治理就是為了便利的目的而安排的對事情的正確處理」(Foucault 1991：94)。Foucault 特別澄清，引文中談及的吾人對於事情的治理 (One governs things) 並非是把人與事對立起來，反而是表明了治理關聯到「一種由人和事構成的複合體」：

在這個意義上和治理相關的實際上是人，只不過這個人是與財富、資源、謀生手段、領土（具有特定特點、氣候、灌溉條件、肥沃程度的領土）這些事關聯、交織的人；是與習俗、習慣、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些事相關聯的人；最後，是與飢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這些事關聯的人 (Foucault 1991：93)。³⁵

由此可見，所謂對事物的治理實際上意指人與事的密切交織，不再是人類主宰事物，比較是人類等同事物、甚至被納入事物的秩序。除此以外，治理被定義為處理事物的正確方式，使得其目的被導向到「對每一項有待治理的事情來說都『便利』的目的」(Foucault 1991：95)。換言之，治理開始特定化多種對象，並且必須透過各種手段「處理」(dispose) 具體事情以達成治理目的：「對治理來說，問題不在於施加法律於人們，而在於處理事物：也就是說，運用各種手段 (tactics) 而不是法律——甚至使用法律本身也成為一種手段——來以某種方式安排事情，使得各種目的能夠透過特定方法達成」(Foucault 1991：95)。總結來說，現代性的治理心態開始於手段與目的之多樣化，而「治理的終極目的在被管理的事情中，在完善和強化指導的追求過程中」(Foucault 1991：95)。從人事複合體到對象多

³⁵ 譯文參考《現代性基本讀本》(張雲鵬、汪民安等編 2005：389)。

樣化，人口才取代了家庭而成為治理術的首要對象；換句話說，人口福利、財富增長、生命延長、健康水平的提高等等逐漸成為國家治理的優先目標：「人口是需求的主體，是慾望的主體，但同時也是治理的目標。人口知道自己面對治理想要什麼，但卻對於治理如何作用於它一無所知」（Foucault 1991：100）。

人口成為治理的首要對象，意謂著治理術具現在集體生命的形式中。Foucault 進而指出，人口作為政治問題正是從資產階級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開始，意思是資產階級發明了一種「針對人口、針對活著的人的生命權力」，這是一種「制作活著（faire vivre）」的權力。與致人於死的君主專制權力相反，生命政治的現代治理著重在如何讓人活著的民主自由權力。換句話說，「生命權力不再直接面對死亡和肉體形塑，轉而關注讓人『如何』（comment）活著」，因此各種干預與控制表面上看來積極正向，都是為了提高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張一兵 2016：466-467）。除此之外，生命政治考量的對象不再只是個別身體，而是「這些個體集合而成的『整體』（mass）」，例如：攸關群體生命健康的「出生率、死亡率、（平均）壽命」等問題，「以及會對這些生命數值造成影響的各類環境因素，如都市內墓地位置的安排、空氣流通與污水處理等」。據此推論，生命政治對於集體生命的關注焦點，開始從身體本身延伸到影響健康和壽命的環境因素，「醫療開始涉足原本不屬於醫療的領域，像是控管各種會對群體生命健康產生威脅的『疾病溫床，如監獄、船舶、港口設施』等；這也代表醫療開始掌管公共衛生領域而成為『健康的普遍技術』」（楊志偉 2020：73-74）。

治理技術與生命政治的理論觀點為垃圾治理的經驗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啟發。此即垃圾治理的核心是透過對廢棄物的有效處理，來達到維繫人口的生命安全之目標。由於人與物的密切交織、混同成為垃圾治理的複合對象，因此人們不再是被動地服從統治權力，反而為了自身的健康福利主動地實踐治理權力。大至國家與地方政府的政策規劃（甚至還可以進一步擴張為全球性的地緣政治），小至家戶與個人的生活習慣皆涉入了垃圾治理的秩序建構。垃圾的妥善處置除了有公權力的介入，也需要民眾自主地配合，意即從私人的身體出發，改變生活習慣與環

境行為以確保自己的生命健康。由此可見，在治理的秩序中，公眾「不僅是權力的客體，也是權力的主體，而且不再只受制於某一權力機制，而是具有一定自由，得以甚至需要自己治理或『管理自己』的主動主體」（楊志偉 2020：76）。

因此之故，垃圾治理的秩序與消費自由的秩序分享了相同的關懷核心——生命。治理系統建立和維持了乾淨的現代生活，使其不至於受到廢棄物的嚴重影響或破壞。在環境衛生的治理問題中，垃圾與水肥的處理向來是最重要的業務。早在台灣社會的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就對此下了許多功夫，因為垃圾與水肥的堆積往往是滋養流行疫病的溫床。³⁶ 所以，有效的廢棄物治理是傳染病防治與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一）》（1995a）的總論開宗名義地說明了「衛生」在近代社會的意涵：

衛生之經，乃為保全本性之常道。而今日「衛生」一詞，其涵意已演進為保持並增進身心之健康。衛生依其範圍，可分為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兩部分。個人衛生在達成一己之身心健康，包括生理的、心理的以及對環境的關係，包括物理的與化學的，如人對水、空氣、土壤、聲音、溫度、食物及生活習慣的調適，以促進正常發育，延長壽命。公共衛生則是以社區全體民眾、或全國國民，甚至全人類為對象，不僅要預防疾病，保持健康，而且要積極的促進健康，達到最高的水準。然而人類過著群體的生活，社會係由人的集團所構成，因此，能影響及威脅個人健康的因子，亦幾乎全能同時影響到社會全體的健康。尤其晚近，由於科技猛

³⁶ 台灣近代公共衛生的時程始於 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十九世紀中葉，日本進行明治維新，效仿德國建立普及的衛生警察系統，以加強國民健康管理，達到富國強兵之目標。日本領有台灣之後，便移植日本的公共衛生體制到台灣來。日人治臺之初，因不適應台灣亞熱帶的風土環境，曾遭受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因此，對日本政府來說，以國家力量推展台灣的公共衛生是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迫切需要。1898 年，日本政府動員總督府各高級官員，成立「台北市區計畫委員會」，針對台北市區人口膨脹帶來的衛生及流行疫病建立有效的衛生改革方案，以衛生觀點改造都市。隨後結合各式法規與機關的制定和執行，日本政府逐步將公共衛生的治理視作它在台灣的現代性統治基礎。早在 1900 年（明治三十三年），台灣總督府就公布實施了《臺灣污物掃除規則》，又在 1928 年（昭和三年）將日本《污物掃除法》施行於台灣，其目的就是要改善台灣的衛生環境，控制疫病流行，進而管理、開發這塊新殖民地。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公共衛生體制之建立，亦使得台灣傳統的衛生觀念產生前所未有的改變。傳染病的有效控制大幅降低人口死亡率，讓人口增長的台灣社會逐步邁入現代世界的發展行列（梁瓊尹 2005；董宜秋 2005）。

進，交通發達，縮短了空間的距離，也拉近了人與人的關係。處在今日之社會，誰也無法獨健其身而不受環境的影響。故發展至近代之公共衛生，已將個人衛生包括在內（行政院衛生署 1995a：3）。

以上論述直接說明了衛生在社會治理中以預防為主的積極作用：不僅要預防疾病，保持健康，甚至要「促進正常發育，延長壽命」。「衛生」涵蓋的範圍極廣，不僅有物理身體的健康，還包括精神心靈的健康，而且可向外擴張至身體與周遭環境因素的關係。可見在近代，人類社會對生命安全的認知越發嚴格，相比以往有顯著的層次提升。與此同時，個人衛生的治理與維持也是朝著上位的集體利益指向的；也就是說，個體衛生成為集體人類生命存續的保障，變成一種繫於集體的自我要求。反過來說，「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新興觀念意味著國家力量可以合理介入個人的醫療與衛生活動，進而達成針對個體與集體的生命治理。

在現代秩序中，圍繞「公共衛生」發展的治理術正呼應了 Foucault 所謂「如何讓人活」的生命權力，而廢棄污染的治理又是公共衛生安全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對於廢棄物的治理實際上就是針對社會人口的生命管理。

2-1 骯髒的城市：傾倒與掩埋

二十世紀的城市垃圾出現了兩項重要變遷。首先是每人消耗財貨與資源的速度持續加快，助長了廢棄物的產生。其次是化學工業的科技發展，徹底改變了垃圾的成分，對環境造成新問題的挑戰（Benton-Short and Short 2012）。

人類有很長一段時間將河流與海洋當作天然的垃圾場。根據 Nagle（2017）所述，紐約最早從歐洲殖民時期就將垃圾隨意丟棄在沿岸地區，但很快就變成刻意造地，導致碼頭被垃圾填滿，船隻無法停泊。1857年，州政府下令把垃圾倒到更深入港灣的地方，結果垃圾破壞了漁場和牡蠣養殖場，也阻塞了船運航道。政府只得不斷將垃圾運往更遙遠的海域，但海流和海風總是能把它們再次歸還給陸地。很顯然地，把垃圾丟進海裡不是最好的辦法，而如果佔地球總面積四分之三的海洋不能當作垃圾場使用，那麼這些垃圾就必須待在陸地上。

陸上的垃圾處理主要可分為兩種方式：一是「露天掩埋」，二是「衛生掩埋」。³⁷ 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是否將垃圾以天然土壤、或者人造結構掩蓋起來。在美國，有一座臭名昭著的露天掩埋場，名叫弗萊雪基爾斯（Fresh Kills），它的面積約 3,000 畝，位於紐約史丹頓島西濱。從 1948 年開始，那地方就充當紐約市唯一的垃圾掩埋場，直到 2001 年關閉為止；在鼎盛時期，該場址每天接受約 17,000 噸的垃圾（Benton-Short and Short 2012）。半世紀以來的垃圾不斷堆積，終於成為一座腐臭的垃圾山，晉升世界史上最大的人造結構，規模甚至類比中國長城、埃及金字塔，成為可以從外太空看見的人造物（Rogers 2005）。

垃圾露天堆放不僅破壞環境美觀，時常散發的惡臭也令附近居民苦不堪言。更重要的，長期經受雨水沖刷，許多有害物質又滲透進入土壤，污染地下水源。「衛生掩埋場（sanitary landfills）」作為露天掩埋的技術性修正，跟過往隨意傾倒的垃圾場不同，是經過嚴密工程設計和評估的，並且通常設置有完整的監控系統，以檢測垃圾場的污水及廢氣釋放（Rogers 2005）。在理想情況下，衛生掩埋場的防漏襯墊及污水流處理等系統，可以防止混雜有毒物質的垃圾液體流入周遭土壤或地下水層；進而，掩埋垃圾所產生的沼氣也可以收集起來作為燃燒能源使用。但實際上，衛生掩埋場的運作往往不如預期，因為污水滲透的情況幾乎在所有掩埋場中都會發生。雨水會滲透垃圾，帶出各種液體和毒物，例如氨水、氯化物、鋅、鉛和酸，再進入地下蓄水層，污染乾淨的水源和土壤（Benton-Short and Short 2012；Leonard 2018）。

進一步說，垃圾掩埋場因為擠壓嚴實，反而讓原本可以生物分解的有機廢棄物沒有足夠的空氣提供微生物和細菌進行分解。掩埋場裡頭的廢棄物高度混雜，

³⁷ 陸上掩埋場還能夠細分為封閉型、衛生掩埋型以及安定型，分別處理不同種類之廢棄物。封閉型的掩埋場為了防止事業廢棄物中有害物質的外溢，在掩埋場兩側及底部等外圍牆壁以混凝土完全封閉，場內亦有區隔設施，上方加蓋防止雨水進入。衛生掩埋型的處置場主要處理家庭生活的一般廢棄物，也就是不處理另外兩型掩埋場所處理的其他廢棄物，以及中間處理設施所產生的如戴奧辛、重金屬等有毒物質。衛生掩埋場亦有相關設施防止掩埋廢棄物因降雨而造成滲水，對周邊地下水、河川、土質等造成二次公害。安定型的掩埋場只處理含有玻璃、陶瓷器碎片和建設廢材這一類不溶於水、也不會腐敗發臭的廢棄物。由於此類廢棄物不會對地下水或土壤造成直接污染，因此僅在掩埋區域的周圍設置牆壁或擋土牆，防止廢棄物崩落即可（陳秋蓉等 1999）。

而且人們丟棄的大宗垃圾都可以回收、再利用或製成堆肥。但持平而論，垃圾堆積或掩埋阻礙了有機分解過程，這並非是當代才有的現象。考古學家 C.W. Blegen 就在青銅器時代的特洛伊城挖掘工作中，發現到建築物的地板每隔一段時日就堆滿動物骨頭和小東西。當時的特洛伊人並不是把這些堆積物清掃掉，而是重新舖上乾淨的黏土，直接覆蓋掉這些生活垃圾（Rathje and Murphy 1999）。在許多史前遺跡中，考古學家也同樣發現了眾多由貝類堆積而成的古老垃圾堆。所以，Rathje and Murphy（1999）指出：「事實上，雖然有時『生物可分解性』似乎被標舉為我們祖先垃圾的主要特徵，——這個特徵在今日由於塑膠與其他類似產品的發明而日漸失色——但是從有人類的時刻起，『生物不可分解性』才一向是垃圾不變的，甚至是主要的特色」（Rathje and Murphy 1999：44）。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兩點結論。首先，浪費行為並非專屬於現代人。誠如前章所述，自古以來，誇富宴式的耗費儀式就鑲嵌於人類社會，人們總是會想要把好好的東西給丟掉。其次，廢棄物的堆積問題或不可分解性也並非專屬於現代，意即不能完全推託給「塑膠」之類的人造材質。舉例來說，我們在購買或使用某些商品時，會認為紙類包裝是相對「環保」的；但是，垃圾考古學的相關研究卻指出，「紙」這種古老的材質並不如我們想像中容易分解。在廢棄物大量堆積的情況下，許多物質並不會同等地經歷自然分解過程，像是掩埋場裡仍然能夠找到可清晰閱讀的報紙和雜誌（Rathje and Murphy 1999；Strasser 2000）。更何況說，現今紙製的食品包裝大部分含有塑膠淋膜，屬於複合材質，因此增加了可分解的難度。所以，問題的討論焦點應該超越物質組成特性或數量的技術層次，進而指向垃圾生產和積累的集體意識及其行為。

反觀台灣都會區的垃圾處理史，我們亦曾經走過一段垃圾堆積、骯髒不堪的過去。台灣廢棄物的污染問題化可與整體社會的經濟產業史一併來看，而相關治理政策的發展歷史也在一定程度上鑲嵌於台灣社會及政治的變遷脈絡中。1950年代，台灣政府推行「農業扶植工業」政策，開啟了整體社會的工業化。1960年代，政府又開始推動各項經建計畫，進入「出口導向」階段的工業發展。煉油、

化學、金屬冶煉等重工業是由國家重點扶植的，而民間中小企業則發展紡織、電子、五金、塑膠等輕工業。由於這些產業發展是以西部地區為主，因此在台灣西部造成較為嚴重的環境污染（陳秋楊 2008）。然而，當時政府及社會的環保意識都尚未成形，而且國民黨統治下的緊縮政治環境，也使得社會民眾針對環境問題，相對缺乏發聲的權力與管道。與此同時，隨著人口及人均 GDP 的增長，國民的消費水準及型態亦發生了改變，垃圾量也在此過程中逐漸攀升。進一步說，消費型態的改變又影響了日常物品的使用，在材質與數量上皆與以往不同。舉例來說，在 1968 年的台北市商業及住宅區，垃圾組成中的塑膠類僅佔 3.2%，但到了 1990 年，塑膠類的佔比一路攀升到 20.44%。由此可見，國人在消費物品、製造垃圾的種類上，與以往相比已發生了顯著變化（行政院衛生署 1995b；紀駿傑、蕭新煌 2006；陳秋楊 2008）。

我們已知，在建立垃圾的處理技術與治理規範之前，河川與海洋是傾倒生活及工業廢棄物的主要場所。在 1950 到 1960 年代，受限於政府財源，以及廢棄物處理技術和法令的欠缺，水肥和垃圾都是以傾倒河川或海洋作為主要處理方式，結果造成嚴重的水污染。根據環保署 1989 年的統計，台灣地區的主要及次要河川共 45 條，其中有 28 條河川被 50 個鄉鎮作為垃圾傾倒場（紀駿傑、蕭新煌 2006）。

1980 年代起，民眾所得持續提高，台灣逐步邁向第三級產業的工商服務業轉型，消費社會的雛形亦逐漸形成。垃圾問題終於在此時期浮現出來，成為一般且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據《臺灣全誌：環境與社會卷》（2006）的描述，當時台北市的垃圾堆積如山，原因是在早期都市計劃藍圖中，並沒有垃圾場的規劃與安排，於是乎垃圾多被散棄在南港、永和等地。1970 年以前，台北市的垃圾都被集中掩埋在濱江基隆河畔，而當時的河景第一排基本上就是與垃圾為鄰。同樣地，淡水河畔與入海口也是垃圾傾倒的主要場所，持續堆積出一座座臭不可聞的小山。直到 1970 年，地方政府才找到內湖葫蘆里窪地，作為堆放城市垃圾的定點。1970 年啟用的內湖掩埋場是台北市第一個正式的垃圾掩埋場，經過 14 年的傾倒

與堆積，後來堆出了惡名昭彰的內湖垃圾山。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新的垃圾掩埋地越加難以尋覓。再者，過去「假借衛生掩埋之名而行空地丟棄的惡實已經造成民間對垃圾處理的誤會與忌諱，非但不願意賣出私有地，甚至對任何公有地，只消有半點風吹草動，鄰近地區居民便群起反對，竭力抗阻外區垃圾向計劃地點進軍」(紀駿傑、蕭新煌 2006：60)。

為了有效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台灣政府在 1974 年頒布《廢棄物清理法》，規範各級執行機關要在適當地點與公共場所設置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負責清運指定區域內的一般垃圾，並做出必要的衛生處理(陳秋楊 2008)。在此之前，我國的垃圾處理方式多以掩埋、填低窪地及傾倒為主，而且並無適當的配套措施或管理作法，因此容易造成環境髒亂、污染及衛生問題。行政院在 1984 年頒訂〈都市垃圾處理方案〉的初期，明確制定了短期以掩埋為主、中長期以焚化為主的國家政策，由中央補助經費，推動地方政府積極興建垃圾掩埋場或焚化廠，以解決垃圾處理問題。1985 年至 1992 年又訂定了三期垃圾處理的六年計畫，合計完成 584 處垃圾掩埋場(陳秋楊，2008)。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的環境資源資料庫，截至 2020 年，全台共有 107 座營運中的公有掩埋場，但其中 30 座剩餘可掩埋容積已經歸零，總掩埋容積僅剩下大約 11%。換句話說，垃圾掩埋場的飽和危機迫在眉睫。

2-2 大火燒不盡：焚化與能源轉換

根據廖明村(2008)在〈廢棄物焚化處理〉的介紹，垃圾焚化處理的原理就是：「利用垃圾組成中之可燃成分，於充分空氣供應下，燃燒分解成二氧化碳、水氣、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氫等氣體並放出燃燒熱；至於不可燃及未完全燃燒部分則形成灰渣排出」(陳秋楊 2008：221)。燃燒狀況是垃圾焚化非常重要的條件，亦是需要嚴密工程設計及監控的處理方式。為了達到良好燃燒，必須具備燃燒三要素及 3T 之基本條件。燃燒三要素是指可燃物、助燃物及燃點。在各種垃圾組成中，紙類、纖維布類、木竹稻草落葉類、塑膠類及皮革橡膠類等，皆

屬於可燃物。3T 則指溫度 (Temperature)、停留時間 (Time) 及充分混合攪拌 (Turbulence)。為了使垃圾能夠完全燃燒，這些都是必須嚴格掌控的工程條件。焚化的溫度夠高才能避免塑膠燃燒時產生戴奧辛，但溫度也得要夠低才不會產生太多氮氧化物。實務上，一般焚化爐燃燒室的溫度要控制在 850~1,050°C。

然而，焚化爐也同樣問題一堆；各種環境風險使之成為最具有爭議、成本最高的垃圾處理方法 (Rogers 2005；Leonard 2018)。若是垃圾焚化處理不當，除了容易產生戴奧辛等空氣污染，焚化後的灰渣處理亦是個問題。垃圾經過焚化之後並非完全消失殆盡，過程中會產生廢水與廢氣，以及餘留物「底渣」與「飛灰」。尤其灰渣中含有較多的重金屬等有毒物質，因此必須妥善處理，否則會造成嚴重的污染問題。儘管隨著處理技術的創新與精進，一定比例的底渣可以再利用，生產成為混凝土添加料及其他營建回填材料，但仍有違法回填底渣污染農地的實際情況發生。³⁸ 而且，過度依賴焚化處理亦可能造成焚化爐歲休或除役時，垃圾只得堆積的窘境。³⁹ 換句話說，焚化爐看似是能夠將垃圾轉化成為能源的有效利用方式，但說到底也是屬於「眼不見為淨」的垃圾治理方式，掩蓋了殘酷的浪費事實。

長期以來，棄置掩埋都是台灣垃圾處理的主要手段，但各城市很快面臨掩埋場飽和，無地可埋的公共衛生危機。不少縣市的垃圾無處可去，又對如何處理僵持不下，只得堆放於街頭或私下偷倒外縣市，結果全台灣各地發生了垃圾大戰。這使得行政院不得不正式提出新的垃圾處理方針，終於在 1984 年 9 月將大型焚化爐列入〈都市垃圾處理方案〉，並歸在 14 項重要建設的計劃之下。

³⁸ 根據「看守台灣」網站〈偷竊未來一部曲—焚化爐底渣藏毒於農地〉報導，在 2010 年台中市清水區，國姓社區農地有地主假借興建停車場基地的名義回填焚化爐底渣，惡臭與環境污染的疑慮引起當地居民反彈。2011 年龍井區西濱公路旁，約一公頃的農地遭回填焚化爐底渣 2 萬公噸，亦引起環保團體抗議。儘管回填物經過篩分再處理，可望符合政府規定的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CLP) 溶出標準，但其中所含有的部分重金屬含量仍然超過食用作物農地的管制標準，因而嚴重影響到農業安全 (黃煥彰 2016)。

³⁹ 根據公視新聞網〈中市焚化爐歲修，草屯、竹山累積大量垃圾〉報導，南投縣沒有焚化爐，垃圾必須委託外縣市處理；而協助處理垃圾的台中市焚化廠，又因為歲修停爐導致南投縣每日生產的 230 噸垃圾中，有近一半只得堆放在垃圾堆置場。垃圾堆放將近三層樓高，隨著氣溫升高，垃圾的氣味越發難聞，影響了鄰近居民的正常生活 (林健生 2018)。

垃圾掩埋場的飽和問題必須被處理，再加上拋棄式產品的普及化，眾多一次性產品皆含有不易降解且熱值高的材質，焚化似乎成為垃圾問題的救星。環保署於 1991 年訂定〈垃圾處理方案〉及相關推動計畫，確定「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政策方向。同年 6 月又增訂〈臺灣地區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興建計畫〉，並同時成立「垃圾焚化廠興建工程處」來負責興建 21 座焚化廠。但由於興建焚化廠經費龐大，為避免影響政府財政，於 1996 年再訂定〈鼓勵公民營機構（BOO／BOT）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計畫再興建 15 座焚化廠，以期運用民間資金，加速焚化處理之目標（陳秋楊，2008）。以台北地區為例，最後主要建置了三座焚化爐，內湖廠 1992 年開始運轉，木柵廠 1995 年啟用，北投則是 1999 年開始燒垃圾。

根據行政院環保署出版的《108 年中華民國環境保護統計年報》(2019)，2018 年全台一般廢棄物的焚化率為 42.68%。若以歷年資料來看，1992 年後因大型焚化廠陸續完工，焚化比率逐年上升，2001 年焚化率上達 44.84%，使焚化躍升為首要的垃圾處理方式。該情況持續增長至 2003 年，一般廢棄物焚化率再攀高到 55.86% 的峰值。之後因為回收觀念逐漸普及，焚化的比率才開始下降，回收再利用率則相對上升。與此同時，因焚化廠陸續啟用，衛生掩埋的比率大幅下降，由 2000 年的 43.78% 下降至 2017 年 0.89%。截至 2020 年，全台共有 24 座焚化爐，但垃圾問題似乎並沒有隨著從掩埋到焚化的方式變化而有實質的改善，因為仍有很多縣市面臨垃圾無處可去的景況。⁴⁰ 再者，台灣現正使用的焚化爐大多為 2000 年左右建成，以使用年限 20 年為界，基本上都進入了老化的階段。換句話說，若焚化爐老化停工，可能再引發全台垃圾危機。

2-3 分類再分類：回收與減量

回收（recycling）作為垃圾治理的一種方式，與早期社會中的拾荒經濟、舊

⁴⁰ 根據公視新聞網〈台灣有 24 座焚化爐，部分縣市垃圾扔無處可去〉報導，由於有些焚化廠優先處理事業廢棄物，導致可焚化一般家庭廢棄物的量受到壓縮。環保署指出，全台焚化廠的進場量有四分之一（171.3 萬噸）是一般事業廢棄物，導致家戶垃圾無處可去（林靜梅、王德心，2020）。

物再利用等實作相比較，看似皆是某種經濟運作，但是發生脈絡並不相同。Hawkins (2006) 以「回收的再發明 (reinventing recycling)」來指稱西方社會 1960 年代興起的新回收概念。她指出，對比 Strasser (2000) 在研究中描述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廢棄物再利用，1960 年代的回收概念萌發於社會激進主義 (social activism) 和大眾公共教育 (mass public education)，也更直接與自然危機的意識相關連，並且涉及家庭生活與價值的新論述 (Hawkins 2006)。

Hawkins (2006) 指出三個關鍵的大環境轉變，分別是：環境運動的興起、過度消費的後果，以及「垃圾危機」治理導致的產業轉型。其中，1960 年代西方社會興起的環境主義往往被看作是新回收觀念產生的最大主因。當時，環境主義的相關論述將污染源頭指向工業生產，也由此發展對於環境的關注。這些論述將自然描繪成深受資本擴張所威脅與剝削的脆弱受害者。這種人類活動破壞非人環境的說法是相當典型的現代性論述，令自然與文化互為對立的概念圖像更加固化。

超越環境主義的天真觀察，若我們接受 Hawkins (2006) 對新回收觀念的準社會學分析，那麼垃圾治理與道德規範的兩大秩序就變得難分難捨了。「回收給了廢棄實踐一個道德的面向」，甚至為實踐的主體帶來一種愉悅感，「這種愉悅來自於感受到自己是『好人』，感受到我為了環境付出努力，盡到了道德規範的責任」(Hawkins 2006: 94; Lynch 1960)。由此可見，回收並不是單純建立在市場經濟模型上，而是一種多元複雜的經濟理性，涉及財政的、個人的和道德的計算。廢棄物通常被視作物品的價值終點，但回收打破了這一觀點，呈現出廢棄物在價值動力學中可再活化的邊界位置。垃圾的資源化和市場化並非是資本經濟的單純結果，同時也是文化的、道德的 (Hawkins 2006)。

類似「回收的再發明」，台灣社會的回收實踐也能夠區辨出前現代經濟的廢物利用與當代治理的回收實作。根據台灣垃圾治理的政策發展史，台灣社會的回收再發明可以說是從 1990 年代才開始建立的。台灣的資源回收可分為兩大體系，一為拾荒者、舊貨業的民間回收體系，主動收集或購買有價廢棄物；另一為地方

政府的清潔隊回收體系，無價收集由民眾分類排出的資源垃圾。自從環保署於 1988 年修正《廢棄物清理法》，政府便開始逐步介入回收市場的經濟運作（黃大祐 2013）。1989 年，台灣政府開始推動垃圾分類的回收工作，從荷蘭進口大型「外星寶寶」資源回收桶，放置在主要路口及學校、社區、公園、部隊等地，讓民眾分類投擲，再由清潔隊負責清運。然而，外星寶寶體積大，佔據道路空間，而且資源回收的觀念尚未普及。於是，許多外星寶寶淪為垃圾桶，但外星寶寶對於教育民眾的回收觀念也產生了一定的啟蒙作用（陳秋揚 2008）。

邁入 1990 年代，台灣民眾面對焚化爐設置的公害抗爭，以及全球資源回收的發展意識，行政院於 1997 年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旋即在 1998 年全面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正式加強政府針對回收模式的治理力道。黃大祐（2013）的歷史研究指出台北市政府在一系列政策及環境的教育過程中，利用一種倫理規訓的手段，成功地讓市民與垃圾經歷了「再秩序化」過程，從而接受「垃圾不落地」與「資源回收」的新政策。這些環境的治理政策深入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造就了跟隨政策及垃圾車節奏來調整廢棄實作的道德化主體。垃圾治理的系統運作確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主體的行為實踐，而這種治理權力與自由主體的共謀關係，在以「環保」為主要訴求的分類回收實踐中，顯然格外地成效卓著。基本上，垃圾的生產者與其廢棄物的相互關係，還有個體處理垃圾的不同方式，可說直接體現了社會人群的文化資本及道德準則（Lynch 1960；Hawkins 2006）。作為一種政治技術，回收政策在環境現況、個人實作與經濟利益之間建立起三方連結。回收觀念也將環境政治的關注焦點從工業經濟的發展批評轉移到了消費家戶與個人的自我治理上。它將環境惡化的全球情況，關聯到消費行為、丟垃圾行為等日常習慣中，藉此達到個人化的修辭效果。回收的觀念在改變垃圾製造主體的日常習慣之時，也將個人道德責任與全球環境利益給聯結起來（Hawkins 2006）。

進一步考察，我們可從主體化轉向客體面來反思。分類回收被視作垃圾「源頭減量」的重要手段，但是當代日常生活用品材質組成的複雜程度為分類增添了

不少難度。這點可以從環保團體「看守台灣協會」在景美清潔隊試辦的「細分類」推廣活動為例看到。以往我們在分類時全部放在一起的「塑膠」如今必須按照回收標章上的材質編號做出更細緻的分類，投入相應的回收袋裡。下圖是「看守台灣協會」設計製作的細分類回收區，可見光是「塑膠」就必須再細分類別，理由是不同種類的塑膠製成不同，所以回收的方式、工法亦將不同，若是混雜在一起會大幅降低再利用率。



圖四：「看守台灣協會」在景美清潔隊試辦細分類的回收處

筆者攝影，2020年5月，攝於台北

紙類、紙容器、鋁箔包、鋁罐、鐵罐及玻璃瓶這一類的回收物是比較好辨認的。對前來試行細分類的民眾來說，困難的是塑膠回收物的分類。在消費者看來，塑膠容器的材質幾乎是難以辨別差異的。因此，塑膠容器上的三角形回收標誌就成為使用者進行分類的主要依據。根據《廢棄物清理法》(2017)規定，三角形回收標誌中央需指名該塑膠材質的種類，並且於下方印上該種塑膠對應的英文名稱，例如1號代表PET(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是寶特瓶的主要材料；2號則為HDPE(高密度聚乙烯)常被用作牛奶瓶、塑膠袋與盛裝食品的塑膠盒。但是，這類標示往往隨著容器大小而有差異，清晰度也不盡相同。何況，大部分的民眾回收前並沒有確實清洗，髒污的存在也影響了標示的判讀。這些使用遺留的痕跡具體限制了分類回收理論的實作效果。

回收的基本單位是「分類」行為，但髒污(dirt)本質上卻是反分類的(Kennedy 2007)。弔詭的是，「乾淨」如今是被廢棄垃圾能否用作資源回收的成功條件之一：在做分類回收時，民眾被教導要先適當將容器做清洗，除了降低病媒蚊蟲滋生的可能，也是為了提高可回收物的再利用率。如果說，回收是將「垃圾」再秩序化為「資源」的過程，那這兩個名詞的轉換就變得相當有趣且意義豐富。首先，「垃圾」是混雜的廢棄物集合，帶有髒污與不潔的隱喻。但是，「資源」是相對乾淨的、有價值的，才能夠稱做資源，這一點體現在清洗實作的重要性上。最後，資源回收根本上是在精緻化秩序的建立，透過分類的基礎手段維持治理的穩定。

不能否認，垃圾回收政策確實看到一些經驗成效。台灣每人每日清運量由 1989 年的 0.863 公斤增加至 1997 年 1.143 公斤，但是自從 1998 年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之後，開始下降到 2006 年的 0.605 公斤(陳秋楊 2008)。但是這些量化數據亦可能是「資源回收」的盲點所在。例如，我國雖然號稱是全球資源回收的優等生，但這幾年陸續有媒體報導指出回收體制的黑暗面。這連帶引出一個有關的核心問題，回收是否創造了一種綠色假象(Leonard 2018)? 根據環保署數據顯示，台灣近幾年的廢棄物回收率皆達到了接近 60%，但回收率的上升是否代表「資源」有確實再利用了呢? 此外，筆者認為，所有公共的治理政策皆產生相似的影響，那就是廢棄治理與人們之間維持著一段曖昧的關係，讓社會主體既涉入治理議題，負擔其中的一部分責任規範，同時，又與其保持一定距離，將後段處理全權交由政府機關或「專業人士」來進行。換言之，個體有其需要負責遵守的治理規範，但是只要垃圾一離開私領域範疇(例如丟上垃圾車或交給清潔隊員)，就形同被關入黑盒子當中，後段的處理基本上與個人主體無關。這讓我們更容易將垃圾治理問題歸咎於個人道德或政府部門，從而忽視了問題形成真正的脈絡——浪費式的大眾生產及消費(Hird, Lougheed, Rowe and Kuyvenhoven 2014)。

2-4 公共技術化：計算與管理

垃圾治理的公共化結果就是使廢棄物成為可計算、可管理的技術對象，問題也就滑向技術治理的層次。對於承擔廢棄物公共治理之責的政府來說，將垃圾問題看作技術治理是相對較單純且便利的。比如在陳孟瑜（2003）研究的反焚化爐運動中，台北焚化爐的建置資料裡就能找到許多有效的例證。

陳孟瑜（2003）指出，在台北建置焚化廠的討論初期，市府官員及支持人士都將它看作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因此在回答議員質詢時一再強調，技術的進步與完善能夠消弭民眾所擔心的公害問題。對於行政團隊來說，首先，垃圾焚化的相關技術在國外已相對成熟，引進台灣使用是比較容易的。其次，面對垃圾問題的急迫性，政府傾向採取能夠「及時」且「大量」處理垃圾的方法。焚化法對於地狹人稠的台北市來說，相當符合當時市府需求的治理方案。站在行政組織的立場，也顯然相對偏好穩定性高的施政方案。而且，具有隨收隨燒、大量焚燒這兩項功能的機械混燒式焚化爐，可以讓市府不用再購置「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昂貴的事先處置設備，也不用擔心後續的市場通路。機械混燒式焚化爐可以穩定、大量且有效率地焚化垃圾，至少可以保障行政體系在一段時間內不用擔心垃圾問題再次爆發（陳孟瑜 2003）。總之，這些既符合行政利益，又符合經濟效益的條件，終於讓焚化爐成為市府的第一選擇。此外，儘管議員針對技術移植及焚化爐公害等問題向政府提出質詢，但內容上也多圍繞著經費和數據打轉，例如余秉溪議員就針對煙囪高度是否可以順利排出廢氣，讓廢氣不會滯留台北上空做出質詢。⁴¹

綜合上述，垃圾在公領域的治理秩序中逐漸成為公共技術化的對象，被盡可

⁴¹ 余秉溪議員在質詢中提到：「……台北盆地的空氣污染是不可否認的，現在整個盆地為混合層所包圍，這個混合層平均高度為六百公尺，到了晚上會下降 20 至 50 公尺，……由於內湖是位於飛航管制範圍，因此煙囪高度限制在七十五公尺，這是不夠的，……剛才說到台北盆地上空的混合層有六百公尺，一煙層排出可以上升三倍，則起碼要建兩百公尺高才能排到混合層以上，而到混合層以上才能將煙層水走，不然的話這些煙層會逗留在台北市。……所以焚化爐煙囪的高度只有七十五公尺是不可以的……」（台北市議會第四次第二次大會議事錄〔二〕，p.1753-1754；轉引自陳孟瑜 2003）。

能地細緻歸類、轉換與計算，一方面換算成為重量與體積，另一方面轉換成為熱能、電能或殘渣。指派為技術治理的各種垃圾被重新歸類給環境工程、公共政策的專業領域，後者成為以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為目標的治理學科。除了科學理性，在垃圾治理的秩序建構中，也可見到從政府中心擴張的治理政治，正在利用數據的監控、計算與呈現，不只治理垃圾存在，也治理個人生命。與此同時，垃圾治理已逐漸成為道德責任的構成部分，牽連起私人生活與公共利益。

第三節 私領域的治理：個人衛生與家戶垃圾

公共治理以文明秩序及公共衛生為基礎和目標，將垃圾轉變成為公共化的技術治理問題。在治理術的建立和演變過程中，生命政治的權力同時滲入垃圾生產主體的日常生活，改變了我們在私領域的環境行為與衛生習慣。

在拋棄式生活中，廢棄行為是衛生與方便的保證。但是當一次性使用的商品結束其社會生命後，象徵價值歸零，無用的物質身體就成為「垃圾」，而這些存在具體、意義模糊的混合物卻反過來威脅到生活秩序。例如，拋棄式餐具的使用起初是為了「衛生」，在使用前還是「乾淨」的代表，是能夠具體指名的，還未被玷污的商品。但是，使用過後的塑膠餐具已經失去了使用前的潔淨，不僅被使用者的唾液污染，而且失去了保護生命免受病毒威脅的價值，成為「垃圾」。

垃圾象徵污染、無序，是與乾淨、秩序相對立的代表。去除髒污的行動是對環境的積極重組，而秩序的維持與再造就是我們對環境掌控的最佳體現(Douglas 2018; Lynch 1990)。我們如今很難想像裝有排泄物的桶子就擺在床邊的生活，或者是家裡使用的污水、垃圾直接往窗外一扔，任其堆積的樣子。但垃圾與人們的生活場域並非一直保有絕對的距離，而是曾經一度非常靠近、甚至親近的：

幾千年來，城市居民都在忍受不甚完美、甚至常是惡劣的衛生設備，終日在那些他們必然有能力處理掉的垃圾與污穢中，顛簸前進。人們對周遭垃圾的忍受度，在史前時代至啟蒙時代的這段時間中尚稱正常，但到了工業革命時卻提高至令人驚恐的程度。因為工業革命吸引了數百萬人

湧向原本已甚擁擠的城市，同時也大幅增加了消費商品的數量。而這些商品都將變成垃圾（Mumford 1961，轉引自 Rathje and Murphy 1999：48）。

反觀台灣社會，日本近衛師團軍醫部在《征台衛生彙報》中也描述了當時的衛生環境：

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家務為防土匪的攻擊，幾乎都沒窗戶，因此通風、採光皆不良，造成陰暗多穢氣，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各戶又將污水隨意排至屋外，造成庭院各處積有污水，且婦女們取用混濁的溪流、水塘當飲用水，並利用來洗衣、洗菜、洗廚具。而臺北城、台南城街道兩側污水滯留，發出惡臭，因此城內外皆惡臭沖鼻，使人噁心（轉引自董宜秋 2005：13-14）。

從現代的角度看，如此的生活環境是骯髒噁心的，但負面的感受實際上是時空背景與社會脈絡的差異使然。理論上來說，沒有更骯髒或更乾淨的客觀條件，我們多是因著差異化的感受及認知，才會對周邊環境進行整頓。過度地聚焦於髒污本身，反而容易忽略所謂骯髒與乾淨、無序跟有序是相互證成的（Scanlan 2005）。從以上描述可以歸納，早期社會的生活界線是狹窄且模糊的；換句話說，我們很難真正界定出所謂「公共」與「私人」的界線。房屋建築圈起來的區域大致就是所謂的生活邊界，而傳統人與廢棄物的距離更是比當代人要靠近得多。即便是在工業革命時期就已產生了大量垃圾，人們也並非是如今日的我們一樣積極地整理被廢棄物充滿的環境。反觀現代生活，從個人身體到居住環境與公共空間，我們在一個更高的標準上保持「乾淨」與「整潔」，幾乎已經成為日常的生活倫理。

Foucault 將現代秩序作用在有機身體的歷史規範稱作生命權力，透過一系列的規範令生命成為政治化的對象（Hawkins 2006）。排泄物（excrement）的治理

可作為一個重要例子。如果死亡是有機生命的終極廢棄，那麼排泄就是有機體經驗的原初廢棄。糞便具有兩種矛盾的性格：首先，它到底應該被視作生命的活動，還是應該視作死亡與腐朽？再者，它到底是無法討論的私人秘密，還是可以論述的公共問題？Hawkins（2006）以糞便為例，說明治理權力的介入同時使之擁有隱私與公共的雙重意涵。

Hawkins（2006）引用 Warner 的觀點，首先指出「隱私（privacy）」是「被公共地建構（publicly constructed）」的，再以 Poovey、Laporte 和 Osborne 等人的研究，說明人們與排泄物的關係轉變來自於政府治理的權力擴張。將糞便劃歸到私人領域其實正好凸顯了國家的治理力量。國家治理作為一種「淨化」力量，將排泄物與廢棄物等掃蕩到一定的秩序範圍之外。正是淨化的程序才劃出了公領域，也相對創造了私領域。排泄物被轉移到私領域，成為個體日常生活的道德義務。

董宜秋（2005）針對日治時期的台灣便所及污物的處理研究正好體現了以上觀點。日本殖民政府以公共衛生的建設計畫行使其在台灣中公權力，目的是「淨化」台灣骯髒的生活環境，同時改變與規訓台灣人的衛生習慣。透過法律的制定、公部門的建立、醫療和衛生知識的宣傳與教育，以及新型便所與下水道的公共建設，全面且漸進地改變台人的如廁習慣。早期台灣人的家中大多沒有廁所，不是在街道上挖一個坑如廁，就是在城裡或街庄的路中設置一個大的便所提供居民公用，主要目的是為了搜集糞肥。在鄉下更常見人畜共廁的情形。男性大多隨地便溺，女性則因外出不便，大多使用家裡的尿桶和便桶，而桶子就設置在床鋪旁邊，頂多用個布簾做遮掩。日本政府於 1900 年頒布《台灣污物掃除規則》以及《施行細則》，確定私人有掃除污物的義務，以及訂定政府有興建便所、處理和監督污物的職責。論述至此，我們大致看到了政府透過立法來確定治理主體的責任義務與位階。日治後期，政府開始推動家戶私人便所的設置，透過地方基層的組織、報紙、宣傳單、廣播等，大力宣傳傷寒傳染病的恐怖，鼓吹台人興建便所，進而

頒佈《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來要求每戶人家設置便所。⁴² 最後，政府以補助方式才終於促使個人便所的興建工作略有成效。

廁所作為隱私空間的代表，實際上需要公共的文化，以及私人的自我才得以建立：

公共建設是特定自我管理與自我倫理技術（ethical techniques of the self）的發展基礎，也是乾淨與骯髒、愉悅與羞恥兩造之間差異構造的基礎。廢棄治理與自我照料（self-care）的儀式（rituals）現在深深依賴在我們與化妝室（bathroom）這個具體空間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上。在這個家戶的私密空間裡，我們與自我是親密的（Hawkins 2006：57）。

現代的私人廁所已經成為家戶中消除廢棄的特定場所。我們在此處理身體的廢棄與髒污，同時廁所也被認為是家中最具隱私的空間。然而，若以秩序界線的觀點來看廁所這個廢棄處理的空間，將會發現它的矛盾性與含混性：此處是廢棄治理的公共權與隱私性同時都相對較強的空間。首先，廁所作為人體廢棄物從私人空間進入公共領域的邊緣地帶，秩序界線的穩定維持顯得更加重要。簡單來講，保持廁所的乾淨整潔似乎比家中的其他空間更能體現該家戶的衛生習慣。二十世紀廁所的空間設計與風格也和廚房等其他空間有明顯區隔：洗手台與馬桶採流線型設計，磁磚的主色調逐漸轉變為白色明亮為主，這些現代的設計風格都力求給人一種乾淨整潔的印象（Lucas 2002；Hawkins 2006）。其次，我們在此與最隱私的自我以及最私密的廢棄物互動的同時，亦背負著公共秩序賦予的私人治理之責。政府的淨化權力滲透進家戶空間：馬桶、水龍頭、下水道等裝置皆為了能夠快速排除對自我有極大威脅的廢棄物，維持乾淨的秩序是這些現代技術官僚的首

⁴² 為了改善台灣人畜共廁或隨意搭建簡陋便所而造成屎尿橫流的情況，總督府於 1900 年接續頒佈《台灣家屋建築規則》與《台灣家屋建築施行細則》，其中針對個人便所建材、規則、形式都進行了明文規定。個人便所得的設置首先在官廳宿舍的改建中進行，至於台灣居民家中需要設置個人便所的相關規定，則要等到 1907 年總督府修改《台灣家屋建築施行細則》時，才增加第二十二條，「規定每一戶居民都必須設有個人便所，如果是長屋型的建屋，每四戶就必須設置大便室一處，小便室兩處」。這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確要求每戶居民必須設置個人便所的措施，期望藉此能有效改善衛生的惡習（董宜秋 2005：36-38）。

要需求。與此同時，這些空間與技術的運作進一步形塑著現代的社會主體。

下水道不只是技術上的偉大成就，它同時也連結起作為公共問題與作為隱私秘密的糞便。下水道將一部分的隱私主體牽連到了公領域中，是呈現公民身分與主體性的混合地帶。所以，排泄物的治理所體現的不僅僅是技術與衛生的影響，更與道德和社會的因素緊密相關。現代的糞便既可以是關乎自我道德的私人廢棄物，也可以是屬於政府治理的公共廢棄物（Hawkins 2006）。

現代社會處在一個崇尚身體的治理時代。「衛生」在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提升與重新定義，就是自我技術與自我美學的具體呈現，強調一種預防性的治理價值。因此，在以「衛生」為基礎的治理論述中，垃圾總是被冠以各種糟糕的道德連結與感知，例如骯髒、疾病與死亡（Hawkins 2006）。污穢／污染與潔淨的區隔，以公共衛生之名，滲透進私人生活及個人身體，具體的施作就是透過各種自我管理、環境治理來排除、監控那些骯髒的、混雜的「垃圾」，藉此起到保護與預防的效果。以身體為例，定期的清洗，維持身體與居所的乾淨有助於保護生命不受疾病威脅，亦是主體具有乾淨美德與整飾環境的能力證明。所以現代的大多數人遠比生物所需的基本乾淨層次提高許多。因此，Hawkins（2006）指稱，乾淨的身體已具備有除了疾病防治以外的道德與政治意涵，而新科技不只令保持乾淨變得容易，同時也令我們對「衛生」一事更加焦慮。總而言之，個人的身體及其排泄物已經與治理技術和規範連結在一起了，而基於公共衛生發展的清潔新要求甚至進一步擴張到家務勞動上。

在方便與衛生的觀念引領下，處理廢棄物這件事理所當然也要以效率和乾淨為第一考量。美國奇異（General Electric）公司於二戰後推出的家用廚餘處理機（Disposall）就是當時期垃圾處理「眼不見為淨」的最佳代言。⁴³ 它讓垃圾處理

⁴³ 廚餘處理機又被稱作「鐵胃」，是透過安裝在廚房水槽排水孔的電動絞碎機，用來處理食物垃圾，絞成小於兩毫米的碎片，然後直接排入下水道。這種廚餘處理機在1935年被發明問世，其商業推廣則在二戰後才開始。不同於其他垃圾處理方式，它在市場推廣上亟需工程專家與政府政策的支持，但有些專家考量到可能的負面影響皆反對其使用。廚餘處理機在美國較為普遍，而台灣早期也有一些家庭裝設之。此種廚餘的清理方式有許多負面影響，例如它雖然方便，卻使得原本可以當作堆肥利用的食物殘餘直接進入下水道，犧牲了廚餘的可利用價值。此外，由於部分廚

被渲染成為自由生活的一部分。它提供了終極的「方便」，為現代社會重視的「衛生」做出了貢獻，同時也讓曾經可再利用的廚餘全部進了下水道 (Strasser 2000)。在廚餘處理機的廣告宣傳中，下水道取代了垃圾桶成為廚餘的新去處，而打包廚餘再丟進垃圾桶則被描述成「過時的」家務方式。1948 年的平面廣告「向垃圾永遠說再見！」(“Good-by Forever” to Garbage!)」就呈現了二戰後對於一個乾淨到毫無垃圾的樂觀世界想像。藉由廚餘處理機，家庭主婦就免去了處理垃圾的家務勞動，「廚餘被立刻處理，在它成為難聞的、有害的、黏糊糊的垃圾之前就進入水槽裡」無疑可以省下無數丟垃圾的麻煩。



圖五：廚餘處理機廣告

向垃圾永遠說再見！(“Good-by Forever” to Garbage!),

General Electric, 1948

另一方面，除了環境及身體清潔的工具性效果，家戶的擦洗和清掃等定期的儀式活動實際上也具有分割、建立界線的象徵意涵，據此可以「對家 (home) 作

餘含有較多的油脂，容易附著在下水道導致積淤，影響污水處理設施的使用情況。因此 2010 年，時任台北市環保局長沈世宏開出第一槍，宣示北市禁用俗稱「鐵胃」的廚餘處理機。隨後，行政院環保署水質保護處處長阮國棟亦表示，基於下水道系統的維護，建議內政部營建署修改《建築技術規則》，明文規範禁用鐵胃。

出可見的陳述，從物質的房子中創造出家的範疇」(Douglas 2018: 81)。Lucas (2002) 指出，現代家戶廢棄物的分類儲存，實際上就是家戶日常活動的分隔體現。例如，廚房廢棄物與廁所廢棄物的分離，正好就是烹飪行為與排泄行為作出分割、區隔的客觀結果。我們通常會在廁所擺放一個垃圾桶，專門放廁所裡的垃圾；而廚房也有屬於自己的垃圾桶，專門放置其他家庭垃圾。「把垃圾拿去丟」意指一個排除物的可能去處，將家戶垃圾帶到家門外、交給清潔隊的整個過程，也就是將家戶日常生活的排除物移至家庭生活界線之外，因而顯然是在空間及象徵上的移動。這種將垃圾分類放置，並且將其移往一個確切處所的行動再次確保了界線的維持與分類的運作。而已被明確歸置在垃圾桶或垃圾車裡的廢棄物就不再危險，因為它們待在屬於自身的分類界線內，正等待著被合理地處置。

現代垃圾的分門別類，除了關係私人生活的行為和空間分化，還與公共政策密切關聯。例如，我們會將廚房的垃圾再細分為廚餘、非廚餘，其他垃圾則細分為可回收、不可回收，可回收垃圾又能夠再細分下去。這都是為了因應政府的回收政策才逐漸學習、養成的人民習慣。而且，為了讓回收有良好成效，可回收的瓶瓶罐罐在丟掉以前還要經過清洗，這也是以公共衛生利益，配合政府治理政策而「再秩序化」的日常實作。這種再秩序化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道德秩序來維持的；反過來說，秩序的細緻化也讓秩序破壞所產生的衝擊相對增強。舉例而言，當垃圾被細分為可回收與不可回收之後，那麼錯誤的分類就有可能引致道德的批判；進一步看，當預設會被妥善處理的可回收垃圾最終竟然還是與不可回收垃圾一起被丟進焚化爐燒，那麼針對垃圾不當處理的社會譴責就更加強烈了。

治理權力的擴張劃分出公領域的範圍，同時亦創造私領域的概念。所有被認為是對公共秩序有害的皆不應該出現在公共空間。公共衛生正是誕生於這種秩序的建構邏輯，因此對公共衛生有害的排泄物與廢棄物都必須被小心且秘密地處理。廢棄物治理的系統化，包括下水道、化糞池、垃圾清運、掩埋場與焚化爐的建立，直接連結起私人廢棄物（排泄物、廚餘、垃圾）與公共治理術。廢棄物和其生產源頭的距離變得更大了(Lynch 1990)。垃圾治理的科技手段也讓人們與垃

圾的分離變得更加簡單而快速 (Hawkins 2006)。垃圾離開了私人家戶的界線以後，立即成為公共領域的治理對象，因此治理的責任就移交給政府機關來執行。與此同時，治理權力亦滲透進家戶空間，深刻形塑了現代主體對於乾淨與骯髒、公共與私人的認知，改變了人們與廢棄物、排泄物的關係，以及廢棄治理的個人習慣。

第四節 公／私領域的矛盾：私人廢棄的公眾問題

「在迫不得已的冒險中，我們小心翼翼地避開它們，或直接遠離它們。我們用最極端但有效的方法去對付多餘的東西：不去看它就不會看到，不去想它就不會想到。只有當常規的基本藩籬被迫打破，預防措施都失敗了——也就是當原本受到保護的、我們舒適而催人入睡的封閉『生活環境』陷入危險時，廢棄物才會使我們不安」(Bauman 2018: 19)。Bauman 在此指出，每一次的垃圾處理都是現代性秩序的界線更新，透過無止盡的分離活動來持存。根本上，治理是一項維繫界線的工作，目的在於確認秩序的順暢運作，並再次確認分類對象的性質與價值，以緩解基本藩籬被打破的不安。

建立廢棄物的治理系統，除了改善疾病與公共衛生，還有一個特別容易被忽略的附加效果，那就是重塑「垃圾」的性質與公私領域的界線。如今我們習慣將垃圾丟進垃圾桶裡，而垃圾桶又分別置於廁所或陽台的特定區域，因此可以說，這些日常生活的廢棄物暫時找到一個集中之所，等待被進一步清理出家戶生活的界線。在垃圾治理的實踐中，亦即分類、放置、丟棄的日常儀式裡，我們其實在不斷地維持私人與公共的界線。這些看似自然的處理方式，原來是透過長時間的社會化學習才形成的，亦是一種將現代秩序給主體內化的結果。⁴⁴

考古學的研究指出，垃圾的堆積與處理是逐漸從家戶轉移向外的。從原本堆

⁴⁴ 我們對於秩序的整飾不僅表現在身體的乾淨與家戶的整潔上，甚至已經延展到心靈的層面，強調整理雜亂的、拋棄過多的生活物品來淨空心靈 (Scanlan 2005)。舉例來說，Netflix 的實境節目《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在節目中，主角近藤麻里子透過指導生活亂糟糟的美國人重新檢視自己擁有的物品，並對其進行整理及必要的丟棄，從而達到重整生活乃至於心靈秩序的目的。

積在居住地周圍的食物殘骸，如甲殼、骨頭，到將排泄物、家戶廢水、垃圾往窗外扔、往街上丟、往河裡倒，我們可知垃圾的處理行為劃出一條日常生活的原初界線。但是，公／私領域分界原來還十分模糊，直到近現代處理廢棄物的公共制度建立與完善起來後才逐漸清晰。公共化的提升也同時代表著私領域的深化。屎尿之類的人體廢棄物，以及家戶的生活廢棄物，既成為治理的公共對象，亦擁有深刻的隱私性質。總言之，垃圾治理的現代系統化確認了公共與私人的區分界線，以及垃圾治理在兩個場域間的責任與義務。然而，弔詭的結果是看似明確的界線區分卻使得垃圾擁有隱私及公共的含混性格。

垃圾是最私密的日常生活產物，比如信件、帳單、食物、藥物、衣物之類。即便已成為無用或排除之物，但在進入公共垃圾場之前，仍在象徵上是有主之物，和丟棄該物的個人或家戶之間保有私密的聯結。即便「廢棄」行為在表面上是物與人之間的去連結儀式，但實際上難以完全切斷兩者的關聯。筆者在擔任細分類的志工時，面對各種被丟棄到清潔隊的廢棄物，經常浮現一種詭異的親密感，好似透過這些東西能夠一窺原物主最私密的日常生活。這也許是為何垃圾考古學以及探案電影中，會有翻看垃圾桶來拼湊關係人生活的方法與情節。這也是為什麼當別人翻看自己丟棄的垃圾時，會有一種隱私被侵犯的感覺。儘管在法律層次上，物品被丟棄成為垃圾應當意味物主放棄該物的所有權，但是從物與其主的互動歷史與情感等象徵層面上看，「丟棄」行為本身並無法立即切斷原物主與廢棄物的社會連帶。不僅如此，Douglas (2018) 亦指出，在垃圾桶裡翻找這行為本身就令人厭惡，因為這項舉動等同於意圖使垃圾堆的被棄物恢復其象徵價值。換句話說，廢棄物的原始性質可能藉此回歸，再次標記該物品（曾）是誰的所有物。在此反例中，翻找垃圾桶就是意圖協助廢棄物跨越有用與無用、有主物與無主物之間的界線，跨越界線的舉動往往被認為是充滿危險而令人不悅的。

可於此同時，垃圾又自相矛盾地是一個具有強烈公共性格的議題，透過公共衛生、城市建設等現代價值，成為公共治理的技術政治問題。當垃圾進入公領域成為治理的對象時，我們反倒不會因為漫溢的垃圾而感受自我隱私正被侵犯。完

全相反，它這時候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治理失敗的結果。廢棄物是對文明秩序（civic order）與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威脅，所以我們的反應通常是「他們」（政府部門）要怎麼解決相關問題（Hawkins 2006）？當代治理秩序運用垃圾這種跨越公／私領域的含混性格，結果是使得廢棄問題在特定程度上保有公共議題性，但同時又確保其僅止於一定的聲量，而不至於擴大影響到整體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也就是不會破壞到消費文化打造的自由秩序。Hird 等人（2014）正是將當代廢棄物治理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這種治理形式將廢棄物管理描繪為由社會規範性（normativity）和個體責任化之實作（practices of individual responsabilization）所支撐起來的技術議題（technological issue）。在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下，對個體責任的強調可以將廢棄用一種不會擾亂大量生產與消費的循環方式來處理，並直接地將廢棄物議題導向下游的技術治理層次，避開了對於過度增長和廢棄等有關社會倫理的問題探討（Hird et al. 2014）。

本章討論了人類社會中廢棄物的治理如何密切相關連於秩序界線的建構，基本上主張廢棄物的治理實際上就是界線的治理。從眼不見為淨的拋棄、銷毀，到資源回收的能源轉換，治理形式的轉變實際上就是治理界線的擴張，意即社會企圖再吸收廢棄物以保護整體秩序的系統運作。運作的結果有效體現在乾淨社會的空間擴張，並且可大致分出兩個方向。首先是向外的擴張，簡單來說就是將我們的廢棄物丟到社會的邊緣甚至社會界線之外，例如貧民窟、鄉下或落後國家，以此打造出專屬特定群體的有效的乾淨社會之範疇。借助科技治理的發展，我們打造了更多的排廢機（下水道、煙囪……），並在這些技術肛門的協助下，將廢棄物轉化成更細碎的廢棄形式（廢水、廢氣）向外排出；照此推論，海洋跟天空依然是我們最大的垃圾場，起到接收、稀釋廢棄的作用（Lynch 1990；Serres 2015）。向外的擴張除了技術肛門的「延伸」以外，還有政治的「排泄」，亦即先進國家透過垃圾貿易去污染後進國家。在全球尺度下，人類並沒有更加乾淨，只是把廢棄物送去更遠的地方，營造一個文明潔淨的公共空間表象。其次是向內的擴張，

意即以「衛生」和「道德」為價值訴求，將治理的秩序滲透到私人的日常觀念和實作中。

分析到最後，這種生命權力的客觀形式終於迫使人與物一同被納入治理秩序中。這意味著在任何東西都能廢棄的當代，人們也同樣面臨著被廢棄的命運。垃圾治理的形式與手段不僅體現垃圾製造的個體是否能夠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人，我們在生活中甚至已習得用自身和垃圾之間的距離來衡量社會地位。因此，技術治理的社會心理後果是承擔自我管理的基本責任。這不僅是現代人為了私人健康和公共衛生的積極作為，同時是暗中為了避免自己也落入社會秩序的邊緣、成為被廢棄的生命。總而言之，廢棄物的治理體現出公權力藉由介入個人的身體關照，以便針對社會人口進行生命管理。從公共觀點看，人與物混同成為治理的複合對象：人們不再只是被動地服從政治權力，反而主動地實行治理權力，自主配合改變生活習慣和環境，以避免成為社會的可棄之人。我們與私密的廢棄物互動之時也是在承擔個人責任：在這些私人垃圾的處理過程中，我們持續在分割、建立界線，同時形塑新的道德主體。

然而界線的維持並非易事。無論採取何種垃圾處理手段，最終都難逃廢棄物的反撲。諸般垃圾總是能以各種型態——可見的污染、可聞的臭氣、可感的噁心——再次提醒我們它們的經驗存在。或者，我們本來就從未真正脫離廢棄的生命動態；亦即，我們生存於廢棄之中，並始終從屬於物質生命運作的一部分。如今，面對廢棄物污染問題，我們不得不將眼光放遠，反思界線的跨越與重塑。當人造廢棄物遍佈自然環境，我們應該如何再思社會與自然的「分界」？

第五章 生命的秩序：廢棄物的流動生態

「標記人類世起始的，不是我們的骨骸，而是我們的殘渣。」

“Not our bones but our residue will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hropocene...”

Diane Ackerman

“*The Human Age*”, 2014

在上一章的討論，我們檢視了垃圾治理如何作為消費文化中浪費儀式的後續，撿拾與處置自由秩序所遺留下來的碎片，此即我們稱作「垃圾」的東西。藉由公私兩極化的治理術考察，我們看到治理與自由的一體兩面性，結果是衛生作為社會價值的領域擴張——分別向外及向內滲透——建立起純潔生命的世俗化信仰。

在治理術的操作下，人與物落入共同的治理秩序中，廢棄成為道德活動的合法和規範場域。在此治理領域中我們身負維持自身及環境乾淨的責任義務。有關垃圾治理的法律禁令與自律規範改變了我們如何處置物件的日常儀式。此外，我們還看到國家技術理性與日常生活行為如何結合並且相互影響，亦可見到家戶及私人如何與治理心態相互滲透（Hawkins 2006）。

然而，治理的界線實際上是社會秩序的設計產物，也就是一種象徵界線。在治理的視角下，垃圾被化約為純粹的客體，垃圾治理的責任被同時轉嫁給實作的道德主體與技術部門。但如此一來反而掩蓋了廢棄生成的社會脈絡性以及廢棄物質的不可治理性。前章已經首先點出運用技術管理垃圾的缺陷；本章則要進一步來談當代廢棄的最顯著面向——污染。隨著廢棄物的運行腳蹤，我們也要跨過、或可說打破社會／自然的界線，走出垃圾場、邁入生態圈。

第一節 溢出的垃圾：失效的治理

熱衷新奇事物的李奧尼亞人在日復一日的廢棄中創造了包圍城市的垃圾山：

「他們焦慮地看著那些垃圾山，心中充滿恐懼和戰慄——他們驚恐於他們所看到

的一切。他們憎惡這些山的醜惡，因為它們弄污了風景，不潔淨，不體面，令人不悅，甚至完全令人噁心；他們痛恨這些垃圾山，因為它們包含危機，那些與他們從前所知的一切危機都不相同的、卻偏偏擺在眼前的危機；他們恨這些垃圾山，也因為它們存蓄著危險，那些人們明明能看到，卻怎麼也猜不到的危險。他們狂熱地痛恨這些昨日新奇物品的留存，正如他們狂熱地喜歡新衣服和最新的玩具。他們希望這些山離他們遠遠地，希望這些山消失，希望它們被炸毀、壓碎、磨碎甚至分解」（Bauman 2018：23）。李奧尼亞人憎惡垃圾的不可腐蝕性，他們宣稱這是為了追求所熱愛與渴望的，但諷刺的是他們唯一做到的卻是使垃圾不朽，而終有一日這些無用、討厭、噁心的不朽之物將會帶來災難。或許，災難到來之日已經步步近逼。

老實說，垃圾處理的問題從未得到真正的解決。Bauman 指出，現代性秩序的設計就是預示廢棄物的永恆堆積和處理問題的不斷出現：

廢棄物的生產（因此也就是對廢棄物處置的關注）和類別系統及秩序設計一樣的現代。……它們之所以被廢棄，是因為它們公然蔑視類別系統，破除網格的癥結性。它們是那些不可混合的範疇中被否決的混合物。它們因抗拒區分而被判死刑（Bauman 1991：15）。

前一章已經說明垃圾的技術治理秩序說穿了就是在維護消費文化的自由秩序。此外，從象徵儀式看，我們亦參考 Douglas 的污染與禁忌觀，論證了具現污穢的垃圾是如何在治理的日常儀式中，再次協助確認和持存分類的秩序。垃圾處理「日復一日地更新與突出正常和病態、健康和疾病、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接受的和丟棄的、應該和不該、人類宇宙空間的內在和外在此界線」（Bauman 2018：64）。在所有區隔中，劃分「人類宇宙空間的內在和外在此界線」最為重要。現代人以其對宇宙秩序的主體想像建立起一條顯然是非自然的邊界，而這條邊界的維持必須倚靠日復一日的治理來維繫。秩序設計的意義就在於改造世界，讓世界根據設計的藍圖來呈現。為了讓設計成功，就必須簡化世界，將世界以二元的、理性的觀點

進行劃分：「現代性將世界的碎片化作為自己最大的成就，加以炫耀。碎片化是其力量的主要源泉。一個可以崩潰成問題氾濫的世界，亦是一個可以管理的世界」（Bauman 1991：12）。然而，「這個世界是一個自行其是的世界，它既非井井有條，又非混亂不堪，既非潔淨也不骯髒」；反而「是人類的設計在想像中將秩序的景象與世界的無序、將骯髒與純淨結合在一起」（Bauman 2018：52）。換句話說，自然宇宙有其自身的樣貌與規律，在無際的空間和無限的時間向度裡，從來沒有什麼潔淨／骯髒或是恰好／多餘的意義可言。但現代人性作為世界的一部分卻偏好無視自然的規律，並企圖替代以人造的秩序。這導致我們持續被非理性、偏見和混雜的力量所打擊、困擾、傷害與刺痛。在追尋秩序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不斷地與含混性（ambivalence）搏鬥，而此持續的抗爭就是現代性的徵兆：

含混性是分類勞動的副產品；因此需要作出進一步的分類。儘管含混性是源於命名／分類衝動，但是與它的鬥爭卻只能通過更加準確的命名以及更加精確定義的類別來進行。這就是說，只能通過那種對世界的分離性和清晰性提出更加嚴格的（反事實的）要求並因此產生更多矛盾機會的運作來進行。所以，對含混性的鬥爭既具有自身毀滅性也具有自身推進性。它之所以能以不竭的力量繼續下去，是因為它在解決難題的同時又在創造著自身的難題。然而，它的強度因時而易，取決於適宜對現有含混總量加以控制的力量之可利用性，並取決於這樣一種意識，即含混性的消滅是一個發現並運用恰當技術的問題：一個管理問題。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現代成為尤為慘烈的反含混性的戰爭時代（Bauman 1991：3）。

現代社會意圖透過垃圾治理維繫一個乾淨的社會空間，卻尷尬地遭遇各種挫敗。前章已經提及，幾乎所有的垃圾處理設備都有滲漏的問題必須面對。雨水沖刷帶出垃圾堆裡頭的有毒液體，會進入土壤及地下水，更別提垃圾焚化廠排出的廢氣、廢水和底渣。退役的掩埋場即使經過整治、美化成為「環保公園」，仍然掩蓋不了綠茵地下是層層垃圾的事實。我們先掏空自然、污染自然，然後再想辦

法創造自然。但這人造的自然景觀早已不是原來的樣子，因為即使外表披著綠意，內裡卻滿是人類生活的殘餘。以台灣為例，以早期城市發展為中心向外輻射，垃圾往往被丟棄在距離市中心較遠的沿海地區，不少垃圾掩埋場皆設置在此。但海岸邊有風浪持續侵蝕，長期以來加上海岸線後退的影響，結果造成早期掩埋的垃圾裸露四散，最終成為眾多海洋廢棄物的一份子。基隆的潮境公園、花蓮的環保公園，以及新竹、彰化沿岸地區都有類似的問題。所以諷刺地說，到頭來並沒有所謂的垃圾處理場，因為自然還是我們最大、最終的垃圾場。



圖六：海邊垃圾場

柯金源，1993 年 6 月，攝於高雄茄萣區

各種曾經被排除、「眼不見為淨」的廢棄物如今隨環境污染再次變得可見。2018 年，環保組織「Parley 為了海洋 (Parley for the Oceans)」拍攝了一段海洋廢棄物隨著海浪起伏、堆積在多明尼加沿海的影片，利用影像見證和訴說廢棄物污染的嚴重與急迫。海浪挾帶大量垃圾席捲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海岸：寶特瓶、塑膠盒、食品包裝袋、保麗龍碎片，還有其他各種難以辨識的廢棄物和深綠色的海草攪在一起，隨著海浪載浮載沉，一波波往岸上去。《複眼人》中描述的垃圾島撞上台東海岸的場景，在多明尼加真實上演。

同樣是 2018 年，強颱「山竹」侵襲菲律賓與華南沿海地區，帶來了強烈的風暴。海水倒灌進香港沿岸地帶，淹沒了街道。海水退去之後留下大量保麗龍及

塑膠垃圾。這些都是隨海浪返回陸地的海漂廢棄物，裡頭甚至有二十年前生產製造的寶特瓶。

這些廢棄物質提醒我們，人類社會的殘餘從未消失，甚至諷刺地重塑了我們生活的土地邊界。如今標記海岸線的不再是海灘、礁岸或斷涯，而是連綿不斷的人造物（海漂垃圾、堤防以及消波塊）。台灣的海岸在不知不覺中早已轉換了樣貌，而這並非危言聳聽。以下兩張分別攝於北海岸及澎湖海岸的照片，就是台灣海岸垃圾堆積的真實現況。塑膠製日常用品、漁業用具跟其他自然廢棄物如竹子、漂流木、生物屍體等混雜在一起，沿著海岸鋪展開來。根據垃圾分佈的高低，可以輕易推測高低潮的位置，成為海浪精心排列的風景（landscape）。⁴⁵ 我們若在地圖上標記出這些廢棄物的位置，繪製一幅垃圾地圖，那五顏六色的殘餘所勾勒出的，是否正是福爾摩沙的輪廓？



圖七：廢棄物堆積的海岸（一）

筆者攝影，2020年10月，攝於新北市石門區

⁴⁵ 根據全台淨灘數據顯示，台灣的海岸廢棄物中大約 90% 皆為塑膠或混有塑膠的複合材質，而且絕大多數是一次性使用的物件，包含大宗的一次性飲食包裝（Walther, Kunz and Hu 2018）。這些只不過是人造廢棄物「可見的」反撲。另外還有許多「不可見的」微觀影響，需要以更小的尺度、更長的時間範圍來加以觀察，例如塑膠微粒對於人體的影響，或是環境荷爾蒙對人類健康的威脅。筆者將在本章的後續論述中具體舉例說明。



圖八：廢棄物堆積的海岸（二）

筆者攝影，2019年3月，攝於澎湖縣湖西鄉龍門村

當我們談及溢出的垃圾，可能會想像一個滿溢的垃圾桶：漫出特定容器邊緣的廢棄物越過其應該被存放的區域、污染周邊環境。這是其中一個最直觀的層次。所謂「溢出 (spill)」不僅是一種動態的修辭，用來描述廢棄物超越了治理空間的界線、從不可見到可見的經驗事實浮現；在本章的論述中，筆者借引 Jennifer Gabrys (2009) 的論點，強調溢出一詞的理論意涵。Gabrys (2009) 指出，溢出是用來描述廢棄物移動與轉化的一種方式。⁴⁶「溢出」一詞在字面上帶有越過邊界的意思。在疾病生態學的領域裡，還有另一個相似的「溢出 (spillover)」概念，指的是「病原體從某一個（作為宿主的）物種的成員向另一個物種的成員傳播的現象」，這種現象也被稱作「外溢感染 (spillover infection)」(Quammen 2016: 42)。換句話說，病原體越過了物種界線，從某一物種溢向另一物種，進而感染其身體，造成物種疾病。對照疾病生態學的這個概念，在本研究的論題上談論「溢出」就是意指廢棄物跨越界線，從一個儲匯槽溢向另一個儲匯槽、從一個系統溢向另一個系統。

儲匯槽 (sink) 在科學的研究領域裡，就是指那些接受、吸收、容納廢棄物

⁴⁶ Gabrys (2009) 使用名詞的 “spills” 來指稱廢棄物在不同儲匯槽 (sinks) 之間的流動與轉化。但是該詞在中文語境的翻譯上容易造成動詞、名詞的混淆，因此「溢出」一詞在本章的使用以動詞為主，來描繪廢棄物在不同系統界線間的流動轉換，而「溢出的廢棄物」則作為具體的名詞指稱。

的區域 (Daly and Farley 2003, 轉引自 Gabrys 2009)。⁴⁷ Gabrys (2009) 指出, 若僅以工業生態學 (industrial ecology) 的觀點來理解儲匯槽, 那麼它只能被看作儲存、處理、移除廢棄物的技術空間。這種觀點將儲匯槽看作是辨認、解決廢棄問題的手段, 並直接導向注定失敗的「尋找終極儲匯槽」之主張。所以, 跳出封閉循環的技術邏輯, Gabrys 認為應該另行強調儲匯槽在自然—文化的生態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她以 Serres 的寄食者理論為基礎, 強調儲匯槽作為「廢棄、科技、生態、人類及非人類的不確定的混雜 (indeterminate hybrids)」, 是儲存 (deposit) 和流通 (channeling) 的地方。簡言之, 廢棄物的流動性 (mobility) 才是理解儲匯槽如何聚集與轉換的重要觀點 (Gabrys 2009: 667)。⁴⁸

廢棄物的移動與轉化呈現的是一種不定形的 (formless)、甚至是擾亂性的 (disruptive) 地理圖像, 而非順應明確的軌跡或網絡 (Gabrys 2009)。易言之, 我們無法明確繪製出廢棄物的流動路徑, 更不用說以某種人造的治理界線來將其框限在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社會空間中。Gabrys 的理論洞察為本章論述提供了重要啟發。透過溢出的廢棄物, 我們可以反證現代性治理的框架失效, 指出技術治理的謬誤偏見。此外, 廢棄物的流動生態也提供給我們理論上的洞見, 提供思考新界線、新秩序的可能。

治理界線的效果和設計之間出現落差, 迫使我們重新審視界線的意涵。所謂的界線並不是實在的、封閉的且不變的, 因為比起水泥牆瓦, 它更像是細胞薄膜。對於界線的討論可見諸於當代對現代性的反思或批判論述中, 特別是當非人因子進入分析視野的時候 (Latour 2012, 2019; Haraway 2010)。將界線想像成有序和堅固的實在, 早已無法解釋我們所看見的各項環境回饋與互動的經驗, 以及那些無法否認之人與非人間的交互影響。破除現代性想像的單向指涉性, 自然環境正在針對人類社會的所作所為產生回應。指向的反面箭頭已經越來越清晰: 從現代

⁴⁷ 這個用詞通常會與碳排放結合在一起, 稱作「碳匯」(carbon sinks), 用以表述生態環境中吸收、儲存碳排放或其他溫室氣體的地區。

⁴⁸ 有關廢棄物在各種層次的流動影響, 筆者於本章第二節具體論述之。

性論述的社會所分離、排除出去的自然如今正回頭來牽連、包含人類。

Serres 對於界線的思考可以啟發環境污染的經驗問題。他指出，所謂界線「儘管是線條，又抽象，即近乎無窮纖細，但十分奇怪，這條分界線（*démarcation*, *demarcation*）卻又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層在內裡，以其柔軟保護居民；最外層，以其堅硬阻嚇可能的入侵者。中間的一層則穿有孔隙、通道、門戶或孔洞，藉此，常以半導體的方式，人或物得以進入、禁足、出境、路過、攻伐、無望地等待……」（Serres 2015：96-97）。小至細胞膜、有機體，大至城市、國家甚或整個星球，都是類似三層的界線形式在運作著，維持既分隔又交流的內外關係：「開放、封閉、相遇……交易活動和剩餘物，或者通過邊界，或者通不過邊界」（Serres 2015：98）。界線一方面仍保有一定的分隔效果，以保護內部、嚇阻入侵者，但同時界線在另一方面也是可滲透的，並且正是在相互滲透的過程中，改變了界線內外的秩序運作。Serres 甚至將邊界的如是描述稱之為普遍的超結構（*ultrastructures*）。

界線不再用來區隔和分離社會與自然，或者人類與非人，從而在分隔中確立分類純淨甚至層級高低。界線的意涵開始更加接近中介，是界線兩側之小宇宙互通有無的通道、濾網（Serres 2015）。訊息與物質流透過此界線的中介往來兩側、傳遞信息。若循此思考，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社群向其他社群以何種形式、傳遞了什麼訊息？這個問題包含兩個要素：首先是訊息的傳播形式，其次是訊息的象徵內容。顯然，人類社會將生產與消費生活的渣滓送出界線，至於其所隱含的內容，Serres 給出了回答：我們傳遞的訊息就是「佔有」，亦是「主宰」。Serres 扣連污染與佔有慾，指出所有權的自然基礎：「佔有行為的基礎來自肛門……來自活生生的身體或是死屍」（Serres 2015：28）。從動物性的佔有，用尿液、精液來標記領地、配偶，再到宗教的污染標記神聖之所，污染畫出了一個佔有的邊界。

Serres 首先撼動了人類自認遺世獨立的例外立場。若污染即是佔有，且佔有具動物性，那麼人類便與動物無異：「生物藉由玷污，以取得或保存自己的東西」（Serres 2015：8）。兄弟姐妹爭糖果的時候，要是誰第一個把糖塞進嘴巴裡，或用舌頭舔上一圈，就等於宣告勝利。糖果被誰的唾液污染就屬於誰，如同河流被

哪個工廠的廢棄物污染，就沒有人能再喝河裡的水（Serres 2015）。反過來說，「『乾淨』反而就意味著尚無明確的所有者，人人皆可自由接近」，所以「公共財物就是要一塵不染」（Serres 2015：9，2018：166）。我們的社會透過治理技術創造出類似的共產空間：在骯髒的個人與骯髒的自然之間，存在一個乾淨的公共空間，一個屬於想像的集體或社會之共有空間。在這空間裡，沒有誰能夠用他的遺留物來佔領：家戶垃圾不能丟在公共垃圾桶、有主人的寵物不能將糞便留在公園。一旦發現類似情況，立即會有專業人員來處理或打掃，將「乾淨」的空間歸還給「所有人」。我們對待社會中公共空間的方式正是把空間給清潔乾淨，表示無差別的歡迎（Serres 2018）。

但問題在於，這個潔淨美好的文明社會空間以外呢？我們早已用各種方式污染了這顆星球。這樣說來，當我們談及環境污染，實際上是在談對地球的佔有：

我們已經殖民到這星球的每一寸土地，在四處留下指印，由海洋的沈積物，到大氣層最外緣的外逸層，也就是分子逸入太空、太空垃圾，和衛星軌道的地方（Ackerman 2015：27）。

從城市大量排放的廢棄物，標記著那裡的人口對周遭自然環境的佔據。不停地玷污四鄰，我們（誰是我們？）不知不覺地便把周圍的地方佔為己有。當我們說「環境」的時候，難道不是已經直言不諱了嗎？事物圍繞在人類周遭，便指明人類是中心。我們仍然說人類是所有者。當污染抵達擴張的極限，就意味著世界已被此物種佔據了（Serres 2015：115）。

在 Serres 這裡，弄髒東西是佔有慾的表現，所謂骯髒或乾淨，亦不是以衛生科學為前提的對照概念。對別人來說骯髒的東西，可能對自己來說是乾淨的，因為那東西屬於我，上面留有「我」的標記、「我」的殘餘。

有關污染與界線的問題是討論廢棄時無法避免的，因為兩者緊密相連，猶如雙生。乾淨與污穢在現代觀念裡看似截然二分，但筆者在此要指出，此種二分僅為形式上、認知上、象徵上的分別，其實乾淨與污穢之間的界線是模糊且混雜的。

根據 Serres (2015) 所述，在動物的世界裡乾淨與污染很難界定，比如牠們用自身的排泄物標記領地，用口水梳理身體。在宗教獻祭的層次，污染與潔淨也時常是難以分離的，比如信徒用血液、殘骸來祭祀，劃分出屬於神聖世界中不能被玷污的範圍。這麼說來，獻祭的血液到底是骯髒的還是潔淨的？獻祭時的暴力與狂亂到底是污染的儀式還是淨化的儀式？

同樣的，Douglas (2018) 提醒我們，即使是自認進步的現代社會，我們依然沒有逃脫污染的命運。從神聖祭祀的神壇下降到世俗衛生的領域，污染與乾淨的界線仍是象徵的。醫療衛生的發展反而讓我們對髒污更加敏感，甚至可以說，在衛生科學的世俗領域裡，污染披上醫療健康的外衣而更加神聖，令人退避三舍。總而言之，建立起「乾淨」的現代社會的附加效果就是，被視作可能破壞秩序的污穢反而更加猖狂地紮根在看不見的那些極度私密或極度開放的領域裡。垃圾、性愛和金錢，沒有誰更骯髒或更乾淨。

接著，我們回頭談標記污染的東西——廢棄物。我們可以不產生渣滓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從物理學的角度來說，做功就是會有損耗；從象徵秩序的角度看，混亂是秩序建立的前景，秩序的運作需要以排除物為其證成。從生命本質的層次來說，生命的工作核心就是建立秩序，就是與雜音做抗爭 (Serres 2018)。混雜在一起的東西有時合用，但大多是阻塞或障礙，因此「所謂工作，不過是作分類」，而分類就會產生剩餘。不只人類，其他動物和一般生物都會勞動。換句話說，勞動是生命的普遍特徵：

生命之所以為生命，正因它做分類、做挑選，借助馬克斯威的小妖，與死亡作抗爭。有機體接受秩序與能量，隨即把它打散，再行挑選、分類，並重組成適合自己的秩序與能量，最後再把廢料丟棄 (Serres 2018: 157)。

生命都在工作，生命是創作；生命是作功，是能量、功率、資訊。……
生命的工作在於創作與秩序，但假若沒有取道自秩序之外，便難竟全功。

它在這裡建立秩序，卻在另一個地方打亂秩序。它強化混亂，鞏固噪音（Serres 2018：159）。

雜訊與秩序無法分離。在建立秩序時我們必然也產生噪音，必然擾亂其他的秩序，這是生命存在的本質。扁平重複的秩序反而貼近死亡，生命注定要在雜訊與秩序之間定居（Serres 2018）。於是，問題就變成：我們在挑選、分類、建立秩序的過程中丟出了什麼樣的廢料？它在什麼範圍內作用，而離開此範圍後，又以什麼型態持存？跨越界線的排除物，可能在另一端起到不同的反應與作用，人造物脫離了消費文化與治理技術的邊界成為自然環境裡的入侵者，牽引著其他物種的生與死。廢棄成為雜訊，一切網格之間的流通訊息。

與跨界訊息的精神相似，Joshua O. Reno（2014）提出生物記號學（bio-semiotics）的角度，重新思考廢棄在成為象徵秩序的系統之排除物以前，具有跨物種的生命經驗，強調廢棄作為生命形式的標記（a sign of the form of life）。⁴⁹ 當然，這首先也是以排泄物（scat）來理解的。排泄物、體味等，在自然界有訊息傳遞的作用，告訴後來的動物這裡曾經有誰住過或者路過。有些動物會刻意隱藏自己的痕跡，來蒙混過關。在這其中人類或許是最突出但也最笨拙的一種。如前章所述，我們將垃圾打包送給清潔隊員，預設它們會被載到垃圾場掩埋、燒掉或回收，製成新的商品，總之是想盡辦法讓一切有關自己私密的痕跡在治理的過程中被破壞、處理掉。但結果卻是人類足跡到處都是，在這個星球的各地張揚著人類物種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張牙舞爪得很。

在社會秩序建構的框架下，廢棄物是「死物」，可計算的治理對象。此時，「生命」的主體是人，超越生命的限制是指人類超越有機體的時間有限性，是將人類與非人的生命徹底區分之偉大理想。但在環境議題中，這理想遭遇了巨大挫敗。我們必須將人類生命拉回地球，使人類變回動物。若這樣看，則生命始終是有限的、骯髒的、循環的，而廢棄物就是我們生命活動的痕跡、生命形式的標記。

⁴⁹ 生物記號學以跨物種的視角，將廢棄物看作我們與其他物種共享世界居所的標記。各物種的生活環境（umwelt, environment）既是獨立的也是相連的，這點與 Serres 對界線的思考相似。

第二節 再思廢棄物：跨界的流動

當我們慶賀消費文化帶來便利生活時，卻超支未來的土地與海洋，當作生活垃圾的墳場。廢棄物溢出治理的界線，進入大氣、海洋和土壤，甚至穿越物種與身體的界線，流竄在食物鏈、呼吸與血液裡。廢棄物的流動迫使我們將分析視角跨越社會秩序操作的界線。

過往的論述通常著重於廢棄物的保存與技術轉化，忽略了廢棄物質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人類社會的殘餘在生態的循環尺度下影響了更多的物種，大自然的各種力量和活動都在針對環境中的各項因子作出互動及反應。Latour 如是說：「地球不只移動，它還有行為，它會回應我們對它的所為」(Latour 2019: 122)。象徵秩序裡被排除的「死物」好似繼續在生態系統中「活著」。

前言已舉出海洋廢棄物為例說明人造物在自然環境中的普遍滲透及污染問題。在這一節，我們將繼續以海洋廢棄物為代表，考察人造物是如何持續在自然中動態地存在、流動與轉換，也就是重新與人類交融。⁵⁰

2-1 廢棄物藝術品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荷蘭大氣化學家 Paul J. Crutzen (2006) 指出，人類社會在地球上的大量活動已經在各種尺度上影響了我們周遭的環境。其影響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自然進程，成為地質變化的重要媒介。因此，有必要為我們生存的地質時代重新命名，從「全新世(*Holocene*)」變為「人類世(*Anthropocene*)」。我們開始思考世界的未來樣貌，想像當人類消失之後，地球會是什麼樣子？地質指紋會透露出哪些訊息？藝術領域已經展開這類論述。本章的引言出自 Diane Ackerman 的作品《人類時代》(*The Human Age*)，她試圖描繪一位未來的地質學家將有怎樣的地層發現，並且會如何解讀這些地質訊息所透露的先人生活。我們

⁵⁰ 廢棄物的污染問題複雜且多樣，海洋當然僅是其中一部分。筆者選擇以海洋廢棄物為主要的經驗現象來進行討論，因為它涵蓋不同種類的污染型態：大至太平洋垃圾帶、肉眼可見的各種廢棄物，小到必須依靠儀器觀察的塑膠微粒。從物理的到化學的，海洋廢棄物的影響層次多重且廣泛。

以動植物化石來研究恐龍或三葉蟲的時代，但未來的地質學家若要研究人類的時代，需要考察的未必是我們身後的骨骸，而是我們遺留的殘渣。那些刻在沈積岩裡的是人類佔有星球的殖民指紋：「我們以行動為這個星球紋了身，作品處處可見」（Ackerman 2015：33）。

除了文學以外，當代藝術亦以其他作品形式向大眾預示未來的人類足跡。瑞士藝術家 Julian Charrière 以《變質岩》（*Metamorphism*）（2016）向大眾展示了數位時代的地質標本。他將不同的科技設備溶化、製成人造熔岩，陳列在玻璃櫃中，看上去像是未來某個時間節點被重新挖掘出來的地質化石。在岩石的自然紋理中，鑲嵌著資訊時代的人造遺跡——那些是我們為了通訊科技，從自然地質中開採、提煉的稀土與金屬。⁵¹ 另一位比利時藝術家 Maarten Vanden Eynde 把來自世界各海洋中的塑膠碎片溶化，再製成仿生塑膠珊瑚。在海中漂流一定時間的塑膠碎片儘管受到海浪侵蝕，但仍保有鮮豔的顏色外觀。溶化成一團的塑膠，露出細小的纖維，模仿珊瑚礁的顏色與輪廓，產生一種怪異的美感，既沉重又靜默地展現海洋廢棄物的嚴重污染程度。⁵²

⁵¹ 該作品於 2018 年台北雙年展展出。2018 年台北雙年展的主題為「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由吳瑪俐與 Francesco Manacorda 共同策展，旨在探討人與自然之間緊密的互動關聯。

⁵² 《塑膠珊瑚》（*Plastic Reef*）為台灣國立美術館於 2018 年 3 月至 6 月所舉辦之展覽「未來簡史 2050」的參展作品。這是一件不斷在「成長」的雕塑作品，每次展出都更重、更大一些，藝術家要以此喚醒大眾對塑膠污染的關注。



圖九：變質岩 (*Metamorphism*)，Julian Charrière，2016

筆者攝影，2019年1月，攝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圖十：塑膠珊瑚 (*Plastic Reef*)，Maarten Vanden Eynde，2008-2013

筆者攝影，2018年5月，攝於台灣國立美術館

這些藝術作品以「未來視角」反思社會文明的殘餘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這種從未來預示現代的交錯時間軸，是以藝術為中介，在展間裡實現。筆者認為，這恰好符合 Serres 對寄生者系統的時間思考。Serres 指出，「生命有機體是一束束或一網網的時間，也可以說是時間的交換器」(Serres 2018：312)。所謂生命，就是三種可逆或不可逆時間流的紐結。第一種可逆的時間是指世界漫長的平衡，而後兩種則是不可逆的時間。熵與演化是不可逆的兩種時間，前者從生邁向死亡，

後者有創新的可能，創造複雜、差異與新鮮事。⁵³ 「歷史時間的不可逆，由人類寄食者的介入開始」，就像我們無法將岩石、土壤或海洋恢復到人類出現前的樣子（Serres 2018：312-316）。寄食者改變了系統狀態，擾亂了系統的平衡或能量分佈。因此我們無法回到過去，只能「回到未來」。

本節陳列的兩件藝術作品，是藝術家以人為創作的方式，改造廢棄物的型態，將其融化並重新接合，藉此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雙向互動。這種藝術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模仿了自然生態對於人造廢棄物的作用。正如動植物骨骸在沈積岩中受到自然作用力，人造物也同樣受到自然力的持續作用，或是破碎或是融合。下圖是筆者在澎湖海灘上撿到的海洋廢棄物。我們還能從中分辨出主體是一支廢棄牙膏，或許沾滿了漁船留下的黑色機油，又黏上了其他塑膠製品。這支廢棄牙膏下方似乎又與另一個化妝品的綠色包裝絞在一起，上頭還可零星辨別出「法國天然火山」的字樣（也許是一支洗面乳之類的東西）。其他白色透明和藍色的部分，看樣子是瓶蓋或別種塑膠製品。此外，還有一個金屬彈簧附著其上，用藝術創作的術語來說，可謂是「複合媒材」。當藝術家們埋首創作的時候，地球也在默默製成這些「作品」，每日在海灘上公開展覽，觀眾甚至毋需買票入場。



圖十一：海洋廢棄物

筆者攝影，2019年3月攝於澎湖縣湖西鄉

⁵³ 在此，我們又再一次回到有關生命時間的討論。Serres（2018）對時間的論述，顯然與現代性單向的線性時間不同。筆者認為，現代性的時間就是 Serres 所稱的「熵的時間」——我們被迫面對不可逆時間帶來朝向死亡的恐懼。換句話說，現代性過度放大或只看見了生命邁向死亡的時間線，因而不斷嘗試尋找或超越死後世界。

2-2 海洋廢棄物：塑膠污染與環境荷爾蒙

廢棄物問題已成為無法忽視的全球性環境議題，並且對海洋及沿岸生物多樣性造成嚴重影響。在這場環境辯論中，塑膠總是第一個成為眾矢之的。這難道不是我們錯誤且過度的使用習慣所造成的？1960 年代塑膠可是新消費的時代寵兒，如今卻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更別提它的發明還曾是為了取代象牙和玳瑁 (Freinkel 2011；Parker 2018)。從代表希望的新材質，到貼滿死亡標籤的環境殺手，我們對塑膠的態度轉變正是人類文化轉型的矛盾縮影。此外，塑膠特殊的物質性、它與環境複雜的作用關係亦使之成為人類廢棄物的典型污染案例。塑膠是用古生物有機體的遺骸製造出來的，現在竟也順理成章要成為人類的殘餘，就像 Ackerman 書中的描寫：

由於塑膠需要很久才能分解，因此它們也會出現在化石紀錄之中，不是壓扁的草地座椅和 PVC 管，而是微小的塑膠裂口紋理，和變性塑膠一樣分佈廣泛。至於準晶體 (quasicrystal，結構排列整齊但卻不重複的晶體)、透明鋁，和其他新發明的物質形式，也都會出現在化石當中 (Ackerman 2015：53)。

塑膠在 19 世紀末被發明，但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量產 (Freinkel 2011；Ryan 2015；Parker 2018)。1950 年代起，塑膠產業在全球範圍內的產量持續穩定增加，為消費社會帶來全新的文化體驗與便利的生活願景。然而，短短幾十年間，我們已經創造超過 63 億公噸的塑膠廢棄物，其中有高達 57 億公噸沒有進入回收系統 (Parker 2018)。這類聚合物的特性在於結構鏈結很強，而且很難生物分解。塑膠獨特的物質性正說明了它擁有跨世代作用的能力 (Liboiron 2015)。舉例來說，漂浮在海裡的塑膠圈非常容易卡住海豹的脖子，並隨著海豹的成長愈來愈緊，最終讓牠窒息而死。進而，只要被纏繞的海豹死亡、腐爛，塑膠圈又會輕易被另一位受害者拾起 (Derraik 2002)。但是，由於塑膠來到世界的時間相對較短，我們沒有足夠的經驗真正認識它，而這種複雜的時間性增加了我們了解它如何「在

荒野中」與其他物質關聯的難度 (Liboiron 2015)。

海洋塑膠污染無處不在，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從陸地上隨者河流系統、海浪沖刷或海風作用進入海洋，其次則來自海上作業的漁船等，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漁網、浮球等漁業用具 (Kane et al. 2020)。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SCBD) (2016) 的報告，四分之三的海洋廢棄物是塑膠。當它們裂解為更微小的塑膠片，將可以更廣泛地影響到圍繞著海洋生活的有機體。海洋廢棄物的分佈範圍之廣，從極點到赤道、從海岸到深海，都可見它們的蹤跡。即便如此，全球的塑膠產量仍然節節攀升。超過 800 種的海洋與海岸物種透過攝食 (ingestion)、纏繞 (entanglement)、幽靈漁網 (ghost fishing)、棲地影響 (habitat effects) 等途徑，遭受海洋廢棄物的威脅。不幸的是，受害的物種數量仍在穩定上升中。當所有海洋棲地都能夠發現塑膠微粒 (microplastics)，從初級生產者到金字塔頂端的掠食者，食物鏈的各個層級都難逃其入侵。⁵⁴

溢出的廢棄物如今成為科學研究的新對象。我們不得不承認對於自己創造出來的「混合物」不甚了解，而科學家們正在努力填補對廢棄物污染的知識缺漏。正如 Latour (2012) 所說，我們曾經不了解臭氧層破洞怎麼來的，有哪些影響？我們現在也不了解海洋廢棄物去了哪裡，海洋中的微塑膠聚集在哪裡，會對生態循環與物種健康造成哪些影響？我們對海洋塑膠的活動生態缺乏認識：它們與海洋生物網的互動作用讓我們難以評估塑膠微粒對海洋相及人類生物的健康影響 (SCBD 2016；Kane et al. 2020)。

地球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體系，各種物理、化學、生物作用時時刻刻在進行著 (陳明德 2020)。流竄其中的人類廢棄物也一樣，隨著這個動態體系不斷變化。海洋廢棄物正是在這三個層次不斷流動、移轉、轉換與滲透。日本海洋物理學者藤枝繁自 2003 年起開始「打火機計畫」。他透過打火機上印有的生產國資訊，來

⁵⁴ 塑膠微粒 (microplastics) 的普遍定義為直徑小於 5 毫米，且一般大於 0.0001 毫米的塑膠碎片或纖維。若是尺寸比 1 微米還要小，則稱作奈米塑膠微粒 (nanoplastics)。

分析海廢打火機的來源。拋棄式打火機在東南亞地區普遍使用，中空의堅固外殼讓其成為海岸普遍可見的廢棄物之一。除了在日本沿岸蒐集到來自中國、台灣和韓國的打火機以外，隨後幾年該計畫持續拓展，發現連距離遙遠的中途島上都能夠找到來自日本與台灣的拋棄式打火機（藤枝繁、小島あずさ、兼広春之 2006；Freinkel 2011）。

除了容易造成動物誤食或纏繞死亡以外，附著在廢棄物上的生物漂流到世界各地，也對生物多樣性帶來新的危機。海漂垃圾對於矽藻、細菌和浮游生物來說可謂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夏威夷大學的研究員甚至發現附著在塑膠物件上的植物比漂浮在海洋中時能夠製造出更多的氧氣（Freinkel 2011）。與此同時，外來物種也可以藉由人造廢棄物輕鬆入侵海岸與潮間帶。在美國，塑膠垃圾攜帶著來自其他地區的海洋無脊椎動物，經過漫長的漂流旅程成為海岸上新的人侵物種。這些無脊椎動物可以在海洋上漂流長達 6 年，跟隨日本海嘯發生後入海的塑膠一路漂到北美洲。生物的混雜（biotic mixing）是人類活動引起的大範圍問題，並成為海洋中原生生物多樣性的潛在威脅（Mckinney 1998；轉引自 Derraik 2002）。



圖十二：茗荷附著的海廢拖鞋

筆者攝影，2019 年 3 月，攝於澎湖縣湖西鄉

海洋廢棄物除了會在洋流與海風的作用下四處漂流，也會因洋流匯集等因素而大量聚集在特定區域。海洋表面的洋流系統是海面塑膠聚集的主要因素，這些交會的洋流將能夠令浮在海面上的塑膠聚集在一起，成為海洋廢棄物的聚集熱點（hotspots），一個儲匯槽（sink），例如我們熟知的「太平洋垃圾帶」。

但是，能夠在海面上觀察到的塑膠，大概只佔海洋中塑膠廢棄物的 1%。其餘的絕大多數都下沉到較深的海域裡，而其中又有大約 13.5% 是以塑膠微粒（microplastic）的形式存在。海底是另一個全球性的塑膠儲匯槽，然而，我們對影響海底塑膠分佈的物理機制不甚了解（Ryan 2015；Kane et al. 2020）。根據 Ian A. Kane 等人（2020）的研究，海底微塑膠主要以兩種型態呈現，一種是纖維（fibers），另一種則是碎片或微粒（fragments/particles）。⁵⁵ 他們發現，溫鹽洋流（thermohaline-driven currents）對海底塑膠微粒的流動與聚集有較大的影響。在洋流匯集的地方，廢棄物受到力的作用維持穩定的位置而匯集起來，成為海底的垃圾熱點（hotspots）。研究模型顯示，沿岸流（alongshore currents）打散塑膠微粒，強大的重力流（gravity current）將它們沖到深海，與此同時深層溫鹽流（deep thermohaline currents）將塑膠微粒帶入高度集中的熱點。深海的底層流（bottom current）則扮演者轉移（transfer）、集中（concentration）和儲存（storage）塑膠微粒的關鍵角色，控制著塑膠微粒在深海的命運。

不幸的是，洋流同時也是生物所需營養和氧氣的主要輸送者。隨著洋流而來的浮游生物、魚群等海底生物也會在此聚集。換句話說，垃圾熱點同時也極可能是深海生物多樣性熱點（deep-sea biodiversity hotspots）（Kane et al. 2020）。因此，海底塑膠在緩慢而持續的多重作用力下分解、滲透出的化學物質與微粒也更加容易混入海洋食物鏈中。塑膠微粒的直徑非常小，所以幾乎可以被生態層級中的所有生物攝食，讓塑膠微粒中所含有或附著其上的有害毒物能夠在各種生物之間移轉（Derraik 2001；Ryan 2015；Liboiron 2015；SCBD 2016；Kane et al. 2020）。在

⁵⁵ 在 Kane 等人的研究中，將塑膠微粒定義為小於 1 毫米的塑膠碎片或纖維。

生態循環下，我們人類當然也無法置身事外，早就攪和進了這塑膠污染的傳遞鍊中。⁵⁶ 總言之，那些被拋棄在象徵秩序之外的東西，還在動態地循環著，並且早已跨越了自然與文化的界線，穿越了人與非人的身體。

最後，我們簡單考察廢棄物帶來的化學影響。為了讓塑膠具有可塑性和延展性，製作過程中通常會額外加入另一種物質——塑化劑（**plasticizers**）。根據 Liboiron（2015）所述，塑化劑單子與塑膠分子結構之間的結合是相對較弱的，而這種弱連結意味著塑化劑可以輕易脫離塑膠本體。例如，被大量使用在製造塑膠瓶、罐裝食品、隱形眼鏡、食物包裝的塑膠中所加入的有機化合物酚甲烷（**BPA**），就很容易脫離塑膠本體，進入到使用者的身體裡。⁵⁷ 一份 2007 到 2009 年間的研究顯示，91% 加拿大受試者的尿液裡都含有酚甲烷。換句話說，我們早已持續暴露在化學物質的影響下，它們在我們無法感知的微觀層次自由進出身體（Liboiron 2015）。

大部分的塑化劑都是內分泌干擾素（**endocrine disruptors**），或可通稱作「環境荷爾蒙（**environmental hormones**）」。它之所以被稱為內分泌干擾素，是因為具有類似生物體內荷爾蒙的功能，能夠影響或抑制原荷爾蒙的作用，進而改變生物體內免疫、神經與內分泌系統的正常運作。環境荷爾蒙對野生動物與人體皆有影響，例如它可能導致女性乳癌和子宮內膜異常增生、男性前列腺癌及睪丸癌、降低男性生殖能力、引發不正常的性發育等。它在野生動物身上也具有類似影響，例如減少魚、貝和鳥類的生殖能力，改變鳥類和海洋哺乳動物的免疫力和行為（陳健民，2007：112）。在生物體內的微觀層次，廢棄物依然活躍。持久性有機污染

⁵⁶ 科學研究也逐漸證實，微塑膠可以被人體吸收且累積，甚至在胚胎與新生兒體內就能夠發現微塑膠的蹤跡（**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20；Ragusa et al 2021**）。微塑膠無所不在，導致我們已經無法找到實驗操作中的「對照組」，來比較塑膠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因為所有人都難逃塑膠微粒的侵襲（Liboiron 2015）。

⁵⁷ 酚甲烷（**bisphenol A, BPA**），又稱作雙酚 A，是一種化工原料，也是已知的內分泌干擾素（**endocrine disruptors**）之一。它被大量使用於製造聚合碳酸物（**polycarbonate**）、環氧樹脂及其他聚合物，並可添加於一些特殊建材、表面處理物質、燃料、樹脂類之補牙填充物、眼鏡鏡片等。BPA 使用範圍廣泛，且具有生物累積性，可以累積在生物體的脂肪組織中。人體可能因為使用含有 BPA 的容器或塑膠製品而與其接觸。研究發現，BPA 對哺乳類動物具有仿雌激素的作用，進而產生精子數減少、幼體發展較遲緩、影響前列腺等毒害（陳健民 2007）。

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在自然環境中長期滯留、滲透，遍佈世界各個角落。其環境的蓄積性讓它們可以累積在生物體內的組織中，並產生生物放大作用 (biomagnification)，意指這類物質在生物組織中的濃度會隨著食物鍊的營養層級上升而增加 (陳健民 2007：123-124)。

荷爾蒙與體內的激素受體 (hormone receptor) 相結合，從而激發或影響細胞內的 DNA 開始工作，發展出基因表現 (expressing genes)、建構組織 (developing tissue) 或製造蛋白質 (making proteins)。由於內分泌干擾素和荷爾蒙具有相似的結構，因此它會佔用激素受體，如同將一把假鑰匙插進鎖頭裡。換句話說，雖然環境荷爾蒙是「位置不當」的外來物，但卻能夠偽裝成原本存在體內的荷爾蒙那樣產生影響和作用，從而改變身體系統的運作 (Liboiron 2015)。

塑膠微粒與環境荷爾蒙皆是雜訊，從一個系統滲透進另一個系統，跨越界線去影響、擾亂系統的平衡。海洋廢棄物的諸多案例大體說明了廢棄物並非如治理秩序設想的那般毫無生氣，僅是可計算、被管理的惰性客體。實際上無機物質——特別是廢棄物——在新系統的建立過程中，以及在新的自然—文化關係裡，皆扮演生動的角色 (Hawkins 2006；Gabrys 2009；Liboiron 2015)。

2-3 廢棄與污染

我們習慣將污染問題放入科技治理或環境平衡的邏輯中處理，無非是以技術延遲污染的發生，或是積極估算生態失衡之前的最後門檻，試圖死守防線。但有關研究已經向我們展示自然界中的流動廢棄物具有豐富難測的變體，迫使我們必須改變對於污染 (pollution) 的認知。我們知道某些化學物質——例如塑化劑——對有機體健康有影響，卻無法確立其中的因果機制，這挑戰了傳統科學的線性模型 (Liboiron 2015)。此外，流動的廢棄物也複雜化界線的效果，我們再也無法確切區分實驗室與外在世界，亦無法分隔社會與自然 (Liboiron 2015；Gabrys 2009；Latour 2012, 2019)。最後，主體與客體的區別也變得模糊了 (Serres 2018)。廢棄物的溢出啟示了我們，在一個雙向箭頭交互影響與反饋的生態界中，再也難

以界定是誰影響了誰。

在生態圈的新圖像中，「平衡」的概念也變得抽象起來，不再是有多少東西輸入，就有多少東西輸出的經濟學模型。對於廢棄我們也如是思考，因此執著於計算災難發生的時間門檻與碳平衡。但是，「單就系統本身而言，它從不穩定」；「它的平衡純屬理想，或抽象，永遠無法達到」(Serres 2018：133)。雖然都涉及系統這個用詞，但 Serres 所描述的是一種開放的變換空間：

系統這名字取得不好。系統也許並不存在，也許從來不曾存在。世界自誕生以來便不停變換。系統其自身便是變換空間。此乃常理。一切都離不開變迭 (metabole)。我們視之為平衡，其實不過是放慢的新陳代謝罷了。我這身體是時間的交流道，穿梭著訊號和聲音，訊息和雜訊。在這大千世界，這絕非什麼新鮮事。同樣如此的，還包括動植物、大氣與冰晶、細胞與原子，還有人群與人造物品。變換，即資訊的扭曲 (Serres 2018：133)。

在寄食者的關係哲學中，廢棄物、噪音、雜訊扮演系統轉換的角色。在這個持續更迭的空間裡，寄食者寄居其中，不再講平衡，一切只與持續變動、轉換有關 (Gabrys 2009)。人類就是寄食者，在系統中帶入雜訊，其生命原則就是「盡量不被別人取代」；「因此它遇神殺神、見佛殺佛，把貯藏耗盡，將整個系統置於險地。但於此同時，它增加了複雜度，這可以是進一步扼殺，亦可以是創新；它激起生產，加速其宿主們之間的交易。」(Serres 2018：314) 所以說，寄食者「一方面招致混亂，一方面卻帶來複雜」；「在演化上，在生命不可逆的時間裡，寄食者是主動的操作者，或邏輯運作」(Serres 2018：315)。

無論以跨物種生態記號學，或是以寄食者關係哲學的觀點來思考人類廢棄物，並不是要試圖完全消解人類與非人物種的基本差異，更不是以動物性的本能來為人類廢棄行為進行辯解。畢竟人們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與動物的寄生行為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相較於動物的寄食行為，人類是另一級數的寄食者。差別在於：前者是單個，後者是整體，前者是時間，後者是歷史，前者是園子，後者是行省。前者踐踏園圃，後者毀滅世界（Serres 2018：160）。

人類寄食者的影響之大正表現在我們的廢棄物上，換言之我們的雜訊致使系統在空前的層級上發生了存在的改變。與此同時，我們又與其他物種一樣，面對系統的複雜與劇變，知之甚少。

第三節 新廢棄文化？從拋棄到永續的消費生活

Serres 區分了兩種污染形式，一種是指大型工業或垃圾場這類的「硬污染」，另一種則是指圖像、文字、商標、廣告一類的「軟污染」。而如今「軟污染」變得比「硬污染」還要堅硬，全面佔領了我們的眼睛、耳朵與靈魂。所以光用物理量來衡量，即用硬科學來處理污染是不夠的。Serres 提醒我們，「污染關乎我們的意圖、我們的決心、我們的約定」；簡言之，污染關乎我們的文化（Serres 2015：136-137）。

本研究從當代消費文化開始論述拋棄式生活的問題核心。面對廢棄物帶來的環境衝擊，近幾個世代以來人們並沒有放棄對消費文化的反思，但是成效似乎還很緩慢。Packard（1960）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對美國消費文化表示擔憂。他不僅歸納出計畫性淘汰的具體模型，亦為當時以消費生活為主流的美國社會提供了幾個應對的建議。Packard 關注的焦點與環境主義的論述戰場不同，而是將目光放在消費與豐餘這個在當時較少人討論的部分。他無疑為美國社會沉浸在物質豐餘與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樂觀主義敲響一記警鐘。

儘管 Packard 的論述常被批評有不切實際的懷舊情懷，他針對過度消費的反思與建議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發性（Strasser 2000；Hawkins 2006）。過度陷入懷舊情懷是危險的，因為那是另一種極端的逃避；但是我們無法全然否定過往的文化信仰，否則也會掉入現代性進步的邏輯謬誤中，以「新」、「舊」或「現代」、「傳

統」的截然二分來做判斷。事實上，在許多所謂的「現代」經驗中都能夠見到「傳統」的影子，僅是做出些許的修改或包裝罷了。誠如前文所述，我們以衛生科學來證明對髒污的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們的清理行為與原始社會的人並無不同，仍然帶有象徵儀式的意涵。那麼真正的差異到底在哪？Douglas (2018) 給出的答案是「宇宙觀」。宇宙觀的差異令我們以不同的思維去料想事物及環境，進而影響、建構了差異的儀式經驗。與此同理，本文論述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影響，從擴大的層次來看，就是再思人類宇宙的界線，易言之是一種宇宙觀的思考。

Packard 在 1960 年給予沈迷消費烏托邦的美國人以下幾點建議。首先，他希望美國的消費者可以重新變成具有風險意識、謹慎的消費者。消費生活已經將主權從消費者身上分離出去，理應要將消費者的主權歸還。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從更大的文化層面下手，讓謹慎購買成為一種消費者的驕傲。此外，足夠的訊息揭露是必要的支援。消費者團體可以合作推出量表或指南，推薦耐用的商品，以此協助消費者做自主選擇。這樣也可讓生產者有一定的市場壓力，生產品質較好的產品。

其次，他呼籲重新喚起生產者與消費者對商品耐久性和高品質的重視。他建議用等級標示的方法，讓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能夠有選擇的依據。當消費社會正在慶賀拋棄式生活的方便美好時，Packard 卻認為商品品質的耐久性才是重點。

其三，Packard 強調社會與自然整體的永恆平衡 (eternal balance)。自由化、個體化的消費文化帶來的結果是對於資源的過度取用。Packard 則認為平衡就是社會——人和動物——要在其人口／數量和其生活環境的資源之間取得平衡。美國人應該要從消費文化的道德沈淪裡醒來，重新檢視自己需要的東西及日常消費。他提議以共享經濟的方式，取消購買商品的擁有權，改以購買使用權。以租借服務取代擁有，可以讓商品的生產者更注重品質。在共享經濟中，商品可以用得更久，或者獲得適當的維護及修復，即可增加被租用的機會和時間，而更多人租用又意味著增加收益。這個觀點和我們正在普遍推行使用的租借服務幾乎一樣。

最後，Packard 的建議不僅是針對生產者與消費者，也強調社會總體的環境改變，特別是社會資本的有效提升，例如：有利於社群的公共建設，包含硬體的環境建設（綠化公園）和軟體的生活改善（教育、工時）等。他提出要縮短工時、減緩經濟、專注真正的科技突破、從生產轉型為服務工業。

Packard 提出的建議在一些人看來是無用的懷舊，在論述上也確實多處使用「恢復（restore）」一類的詞。但實際仔細檢視這些建議，我們不難發現，儘管 Packard 的用詞引人誤解，但也正確凸顯出整體社會的文化與制度轉型。此外，我們也必須指出 Packard 的思考中仍然偏向人類中心的觀點，畢竟他的建議是道德規範的，甚至是人文主義的。但若能撇開這些缺失，Packard 的觀點實際上與消費文化的當代反思相似，都一致強調消費文化的改革與轉型可能。看守世界（Worldwatch Institute）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同時也是《2010 世界現況》（*2010 State of the World*）的專案主持人 Erik Assadourian 就將從消費主義到永續生活的轉變看作是世界文化的轉型。他提出三個可以普遍適用的簡單目標，試圖翻轉現代性以降從歐洲到美國，再向外擴張而逐漸成為「自然而然」的全球消費文化。

這三個簡單的目標分別為：一、從鼓勵消費轉變為盡可能阻止過度消費，例如避免過度食用加工食品、抽菸、一次性產品、不必要的豪宅、豪車等；二、「以公共消費、服務消費、甚至極少或盡可能不消費，來取代私人的商品消費。」；三、將仍然需要的用品設計地更加持久，而且要以「從搖籃到搖籃（from cradle to cradle）」為設計生產的標準。所謂「從搖籃到搖籃」是 William McDonough 與 Michael Braungart（2008）提出的綠色設計提案；也就是說，產品在設計製造時就要考慮產品從生產到使用完畢的整個生命過程，考慮到生態效益（eco-effectiveness）。與現行的降級回收不同，「從搖籃到搖籃」理念的產品設計，在使用後能夠完全回收再製，甚至直接就使用可分解回歸自然的材料來生產產品。這是一種效仿生態循環的設計理念，在思維上扭轉了傳統工業思維——線性的，講求效率與廉價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生產模式。這是一種對現有生產消費系統的基進思考，從觀念上根本改變對環境、社會、工業製造及消費生活的思考，並試

圖重新設計「整個系統」，而非僅止於天真地透過個體禁慾行為來減少廢棄足跡。

當然，無論是道德先行還是對終極平衡的追求，甚至是效仿自然新陳代謝的工業提案，以上觀點皆有某種浪漫精神。但是它們也都提供了可能的另類選擇。而且，本研究更強調的是，在理論層次上它們皆展現了人類與環境、生命與時間的另類思考。例如，環境滲透與互動的層次開始出現，我們開始重打時間的扭結，注意更長時間的尺度之下循環及演化的網絡。

第四節 廢棄作為生命形式的標記

隨著廢棄物的腳蹤，本章將論述視角轉移到了更大的生態系統中。從消費、治理到污染，我們不斷擴大這個與廢棄相關的論述網絡。治理邏輯下可計算、可控制、可管理的垃圾，在環境的視角下成為流動的不可管理之物，於多個異質系統之間滲透、轉移、轉變。廢棄物溢出了垃圾場的物理空間，也溢出了人類生活的社會界線，進入海洋、土壤與空氣，首先宣告技術治理的框架失效。其次，廢棄物在不同物種的身體界線之間流竄。塑膠微粒與環境荷爾蒙的例子正用來說明廢棄物是如何以不同形式跨物種地流動。最後，廢棄物也在時間的向度上延展開來，從現在溢向未來。我們看到藝術場域對垃圾化石的未來考古，率先展示人類廢棄物對環境的深遠影響。換句話說，人類活動創造的任何一點殘餘都將會持續影響系統。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理解廢棄物的理論意涵，甚至重思界線效用與秩序運作。廢棄物不再單純是「垃圾」——治理脈絡中的惰性客體——它是跨物種生物記號學取經下的排泄物；是 Serres 寄食者關係哲學裡的噪音、雜訊。廢棄物是系統中介、轉換的訊息流、物質流，從死亡的代表變成生命形式的標記，從死物轉為生動的物質（Gabrys 2009；Reno 2014；Serres 2018）。相較於生態穩定的經濟模型，Serres 更強調系統其實是在不斷變動中的混雜空間，進而關注系統之內、之間的交換關係。廢棄物的流動生態不僅呈現了一幅更加動態的空間圖像，也為我們提供了思考生命新陳代謝新秩序的可能。

最後，溢出的廢棄物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污染，以及人類在系統中的位置。Serres 已指出污染其實是體現了人類的動物性本能，透過排放大量廢棄物來佔領自然空間。我們以為征服、佔有了自然就意味著可以自由取用自然資源，但實際上這恰是我們被動物性佔有慾所控制的最佳體現，是一種不自由。若想獲得真正的自由，反而要能擺脫失控的佔有慾，從自然的所有者轉變為世界的租客。如此才能從自然的排泄物裡自我解放出來，從佔有者變成寄居者，變成過客，來來去去，才是自由。



第六章 結論

將垃圾單純視作多餘、無用，甚至骯髒、危險的排除物，進而試圖盡快消滅之，這是技術治理的基本邏輯。這無疑是將垃圾繼續留在日常生活的陰影裡，甚至是將其鎖入自然科學的黑盒子。因此，有別於科學技術的視角，筆者希望探問過往研究中被忽略的面向，更全面地理解當代廢棄物。我們實際上是藉由考察廢棄物的當代性質，進一步描繪廢棄背後更廣、更複雜的系統、結構與文化，與此同時也對現代性做出反思。

總結研究論題，我們首先考察了拋棄式生活的形成及其社會背景，指出廢棄精神在消費文化中扮演的基礎角色。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社會，拋棄式生活透過時尚邏輯的操作打造了一個自由的現世烏托邦。拋棄式商品的「方便」將消費者從有限時間的束縛與關照事物的責任中解放出來。塑膠包裝讓永恆的「新鮮」成為可能，不只是超越有機體必死性的希望象徵，也弔詭地反證了現代人對於死亡的古老焦慮與不安。最後，「衛生」作為文明生活的新道德，為拋棄式生活提供了科學及政治的正當性基礎。我們不僅看到了新消費文化如何藉由拋棄式生活的全面崛起，擴張了商品經濟的運作規模，而且還超越有限經濟的價值思考，看到了在廢棄邏輯背後所隱藏的是現代性意圖超越有限時間與生命的人類渴望。

消費文化消解了神聖來世；但諷刺的是，避死趨生、跨越生命的時間實驗卻在還未創造永恆的生命之前，就先創造了不死的垃圾。廢棄物的事實存在威脅了自由秩序的穩定，成為現代社會的棘手問題。所以其次，筆者接續討論了消費社會的後台場域——廢棄物的治理，試圖點出治理秩序與自由秩序的共謀關係。作為消費自由的後端延伸，廢棄治理亦圍繞著「時間」與「生命」這兩個核心觀念。廢棄生產的個體為了逃出生命時間的焦慮與害怕，最終卻遁入生命權力的科學治理中，承擔起垃圾治理的道德責任；除此以外，我們亦透過廢棄物的治理來整飾秩序界線。當代治理術的發展導致垃圾產生公／私兩極化的含混性格：垃圾生產的個體既親密地與廢棄物相關聯，因而必須承擔治理的私人責任；同時又與廢棄

議題保持距離，佯裝其為科技政治的專業範疇。如此一來，垃圾治理順理成章地轉換成涉及健康與安全的技術治理問題，狡猾地繞開了面對消費文化的反身指控。

然而，垃圾的技術治理並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治理視角下被化約為純粹客體的垃圾實際上具有一種不可治理性，因為作為消費秩序的後端延伸，治理的基本作為仍是分類，而分類就必然會再產生不可分類的含混性。就實作層次而言，再嚴密監管的掩埋場或焚化爐都仍有污染滲透的問題。垃圾早已逃逸出社會秩序設計的治理界線，進入地球生態的惡性循環。因此其三，我們的分析也隨著廢棄物的溢出蹤跡，必須跨越甚至打破社會／自然的界線。廢棄物在物理、生態與化學層次跨界滲透、轉移、轉變的事實，體現了生命系統的複雜與劇變。治理秩序設想的可計算、被管理的惰性客體，那了無生氣的「死物」，如今在自然—文化的新關係裡扮演著系統的中介、生動角色。我們藉由廢棄物的流動視角，鋪展開一幅人物互賴的生命圖像，打破了現代性設計的二分邏輯。作為生命形式的標記，儘管廢棄物必然產生，但改變也不無可能。換句話說，我們仍有自省與行動的機會。

總結研究取徑，本研究旨在探究當代廢棄物的複雜脈絡，如同從果實順著藤蔓摸索，盡可能描繪出廢棄物的生長環境。隨著論述視角的移轉和尺度的擴大，筆者採取了多重理論的分析架構，目標是觸及消費價值、衛生治理與污染物質等多個層次。然而，在研究時間與資源的限制下，一定程度上勢必犧牲了特定歷史或理論的深入探究。再析言之，本研究以「秩序」為三章主文的論述前景。然而，儘管皆以「秩序」一詞來指稱，自由秩序、治理秩序與生命秩序的實質意涵並不相同。自由秩序與治理秩序分別是社會和技術設計的文化及政治產物。這裡頭共通的現代性操作試圖將應然的價值打造成實然的存在，而廢棄物的溢出恰好戳破了現代性的秩序幻象。隨著環境意識的高漲，社會系統試圖以各種方式模仿自然循環，從而吸收、整合秩序的排除物。但是大部分的實作設計仍在封閉、有限的系統概念下進行，可以說是一場針對物質性的社會化／技術化遊戲。這場遊戲的

無限擴張最終是否會導致社會整體成為自己的廢棄物？相對來說，生命的「秩序」顯然與前兩種共謀的秩序理性不同：它更加動態多變，而且不易捉摸；最重要的是，它並不追求純淨。

當代廢棄物作為人類社會生命活動的記號，在數量與物質組成上已經超越了我們過往所觀察、理解的生態循環歷程。難以降解的人造廢棄物持續堆積，並不代表物質流動沒有發生，只是超越了人類生命可觀察的時空尺度，同時也預先超越了我們舊有的循環理論框架。如同 Gabrys (2009) 所言，我們需要質問模型的概念，不僅是技術的計算模型，還包括文化的價值模型。跳脫工業生態學追求穩定狀態的封閉循環系統觀，開始強調動態轉換的新陳代謝觀，才有可能重新理解界線、秩序與生命的意涵。當人類寄食者在空前層級上影響了生態運作，我們該期待哪種新陳代謝的結果？是永續循環，還是毀滅災難？相較於執著在如何讓環境保持「乾淨」，另類認識人們與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恐怕才是建立新社會、新政治秩序的突破口。而此處要如何重新思考廢棄物在自然—文化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可是關鍵的第一步。

但有待反省的是，筆者在分析中並未完全地拆除現代性的思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社會跟自然的想像。並且，儘管多次觸及神聖象徵、世俗科學與純粹生命的有關概念，但並未進一步討論三者之間的歷史關係，也沒有根本上釐清隱含在各派論述中文化、政治與自然的理論聯繫。在社會分析的實徵論述裡，要以經驗事實闡明前述的基礎問題實有其難度，很可能複雜化理論結構或是模糊了問題意識。因此筆者策略性繞開了形上學—人類學，或說存有學—倫理學問題。

自從社會文化、轉進技術政治、再到生態物質，研究尺度的階段轉變也為本研究帶來方法論上的深刻反思。廢棄議題的複雜與迷人之處正在於它實屬一個跨領域、多尺度的研究對象。比如，我們既可以在單純社會的脈絡中討論消費物的價值交換，也可以在單純科學的領域裡分析廢棄物的污染。然而，當我們試圖在論述中將尺度逐漸拉大，從新陳代謝的生態視角來思考廢棄物時，甚至嘗試抽絲剝繭社會文化與自然科學的內涵相似性時，必然會遇到社會科學方法所設下的研

究限制。例如，我們必須面對人類或非人作為研究對象的存在模式差異。筆者在研究執行的初期，曾經嘗試設計並且進行初步的質性訪談，主要針對台灣零廢棄生活的實踐者，討論他們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思考與實作中面對廢棄問題。當然，受訪者能夠提供的在地視角以其周遭生活為主，難以涵蓋到生態視角中的所有行動者。簡單來說，如何讓沒有語言的非人行動者參與到生態論述的建構中來呢？就本研究而言，要根本處理此問題，要麼將論述直接推展到更加形而上的哲學層次（比如人類和動物、有機物和無機物的存在描述和詮釋）；要麼採取迂迴的論述策略來連結經驗與理論的證呈。為了說明廢棄物在文化、政治和生態環境中的多面、跨界流動，筆者綜合運用了歷史資料、官方數據、科學研究、藝術作品、田野紀錄、以及個人觀察來間接地呈現經驗資料。儘管許多的經驗佐證並不是研究者獨立蒐集的一手資料，但筆者還是盡可能考察異質領域的論述和現象，大量蒐集間接證據來支撐本研究的核心論點。

在分析終了，本研究要返回秩序界線及事物分類的基本問題進行反思。在衛生科學或環境美學之上，髒污是有關象徵界線的維持與跨越。所以，廢棄不一定是髒污，垃圾也不一定就危險，這些都取決於它們與系統的關係；進一步講，就是它們是否或者可能威脅到系統秩序的正常運作。所以，在討論廢棄議題時，我們必須留意既不能化約地將「廢棄」或「垃圾」等同於「位置不當之物」，亦不能忽視其成為「位置不當之物」的可能性，否則就會在分析過程中忽視了此類物質與系統秩序的關係。Lucas (2002) 在他的研究中就犯了類似的錯誤。他指稱「垃圾」並不是「位置不當之物」，相反地它在家戶空間裡反而恰恰是「有其位置」的。但實際上，Douglas 在其研究中早已說明，只要它清楚地處在一個確定的地方，那麼垃圾就不危險，因為沒有差別的地方就沒有污穢。從微觀的層次說，例如在家戶空間中，垃圾桶裡的垃圾確實並不危險。但是同時，它既然被放在垃圾桶裡等著被去除、消滅，不就是因為它在家裡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會構成污染的威脅嗎？所以，就垃圾最終必須被銷毀的命運而言，即首先隱含了它已經或者可能威脅系統秩序的前提要件。又不只廢棄物，我們也曾經、甚至如今依然這樣對待

自己的同胞。為了維持世界的乾淨與秩序想像，我們依舊經常只因彼此在種族、性別、階級或信仰上的位置差異就將其貼上多餘或危險的標籤：他們是異教徒、猶太人、原住民、窮人、難民或同志。

廢棄物確實是人類生命的一面鏡子。它不僅映照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的抽象運作，亦是技術政治和生態自然可能如何分類、排除、變動的具體縮影。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行政院衛生署，1995a，《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一）》。臺北市：衛生署。
- 1995b，《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臺北市：衛生署。
- 吳明益，2016，《複眼人》。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
- 胡嘉明、張劭穎，2016，《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紀駿傑、蕭新煌，2006，《臺灣全志，卷九社會志：環境與社會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 陳明德等 合著，2020，《海洋科學概論暨其時代議題》。臺北市：大石國際文化。
- 陳秋蓉、周良輝、邱馨慧 編譯，1999，《廢棄物處理》。臺北市：全華。
- 陳秋楊 主編，2008，《固體廢棄物管理》。台北縣：東南科大。
- 陳健民，2007，《環境毒物學（第二版）》，Pp.112-124。台北縣：新文京開發。
- 張一兵，2016，《回到福柯：暴力性構序與生命治安的話語構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雲鵬、汪民安、陳永國 編，2005，《現代性基本讀本（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董宜秋，2005，《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臺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臺北：五南。
- Ackerman, Diane 著、莊安祺譯，2015，《人類時代：我們所塑造的世界》。臺北市：時報。(Ackerman, Diane. 2014. *The human age: The world shaped by u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Barbon, Nicholas. 1905. *A discourse of trade*. Baltimore: Lord Baltimore Press.
- Baudrillard, Jean 著、林志明譯，2018，《物體系》，Pp.256-342。台北：麥田。(Baudrillard, Jean. 1966.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p.1-98.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auman, Zygmunt.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Pp.1-17. Cambridge: Policy Press.
- 楚東平譯，1992，《自由》。臺北：桂冠。(Bauman, Zygmunt. 1988. *Freedo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王志弘譯，2003，《工作、消費與新貧》。臺北：巨流。(Bauman, Zygmunt. 1998.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谷蕾與胡欣合譯，2018，《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都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臺北：麥田。(Bauman, Zygmunt. 2004.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td.)
- Benton-Short, Lisa and John Rennie Short 著、徐苔玲、王志弘及國家教育研究院譯，2012，《城市與自然》。臺北市：群學。(Benton-Short, Lisa and John Rennie Short. 2008. *Cities and nature*. Routledge.)
- Bocock, Robert 著、張君玫與黃鵬仁合譯，1995，《消費》。臺北：巨流。(Bocock, Robert. 1993. *Consump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Calvino, Italo 著、王志弘譯，1993，《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Calvino, Italo. 1978. *Invisible citie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Campbell, Colin 著、何承恩譯，2016，《浪漫倫理與現代消費主義精神》。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Campbell, Colin. 1987.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New York: B. Blackwell.)
- Dant, Tim 著、龔永慧譯，2009，《物質文化》。臺北市：書林。(Dant, Tim. 1999.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social world*.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 Douglas, Mary 著、黃劍波、柳博贊與盧忱合譯，2018，《潔淨與危險》。北京：商務印書館。(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Routledge.)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 著、汲喆譯，2012（2017 重印），《原始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Needham, Rodney, ed and trans. 1969.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London: Cohen & West.）

Featherstone, Mike 著、趙偉紋譯，2009，《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台北縣：韋伯。（Featherstone, Mike. 2007.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Sage.）

Freinkel, Susan 著、達娃與謝維玲合譯，2011，《塑膠，有毒的愛情故事》。新北：野人。（Freinkel, Susan, 2011, *Plastic: a toxic love story*. Text Publishing.）

Haraway, Donna Jeanne 著、張君玫譯，2010，《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Pp.243-293。臺北市：群學。（Haraway, Donna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Hawkins, Gay. 2006. *The ethics of waste: How we relate to rubbish*. USA: Rowman & Littlefield.

Kaza, Silpa, Lisa Yao, Perinaz Bhada-Tata and Frank Van Woerden. 2018. *What a waste 2.0: a global snapshot of solid waste management to 2050*. The World Bank.

Kennedy, Greg. 2007. *An Ontology of Trash: The Disposable and Its Problematic Nature*，Pp.ix-22&121-155. NY: Suny Press.

Latour, Bruno 著、余曉嵐、林文源與許全義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Latour, Bruno. 1991.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essai d'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 陳榮泰與伍啟鴻譯，2019，《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新北：群學。（Latour, Bruno. 2015. *Face à Gaïa: huit conférences sur le 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Leonard, Annie 著、吳恬綾與黃亭睿譯，2018，《垃圾與它們的產地：為什麼99%的東西半年後都被丟棄？》。台北：時報。（Leonard, Annie. 2010. *The story*

of stuff: How our obsession with stuff is trashing the planet, our communities, and our health-and a vision for change. Simon and Schuster.)

- Lynch, Kevin. 1990. *Wasting Away (with contributions by Michael Southworth, editor)*. San Francisco: Random House.
- Marx, Karl 著、李中文譯，2016，《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新北市：暖暖書屋文化。(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8, *Werke:--Ergänzungsband.*)
- McDonough, William and Michael Braungart 著、中國 21 世紀議程管理中心與中美可持續發展中心譯，2008，《從搖籃到搖籃》。新北：野人。(McDonough, William and Michael Braungart. 2002. *Cradle to cradle : remaking the way we make things*. New York: North Point Press.)
- Nagle, Robin 著、高紫文譯，2017，《垃圾天使》。新北：左岸。(Nagle, Robin. 2014. *Picking up: on the streets and behind the trucks with the sanitation workers of New York Cit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Needham, Rodney 著、汲喆譯，2012（2017 重印），《原始分類》英譯本導言。北京：商務印書館。(Needham, Rodney, ed and trans. 1969.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London: Cohen & West.)
- Packard, Vance. 1960. *The Waste Makers*. New York: Van Rees Press.
- Quammen, David 著、蔡承志譯，2016，《下一場人類大瘟疫：跨物種傳染病侵襲人類的致命接觸》。臺北：漫遊者文化。(Quammen, David. 2012. *Spillover : animal infec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pandemic*. W.W. Norton & Company, Inc.)
- Rathje, William and Cullen Murphy 著、周文萍與連惠辛譯，1999，《垃圾之歌：垃圾的考古學研究》。台北：時報。(Rathje, William and Cullen Murphy. 1992. *Rubbish! : the archaeology of garbag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Rogers, Heather. 2005. *Gone tomorrow: The hidden life of garbag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Scanlan, John. 2005. *On garbage*. London: Reaktion Books.
-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6. "*Marine debris: understanding,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the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on marine and coastal biodiversity*." CBD Technical Series(83). Montreal.
- Serres, Michel 著、陳榮泰與伍啟鴻譯，2015，《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污染世界？》。新北市：群學。(Michel, Serres. 2008, *Le Mal propre: Polluer pour s'approprier?* Paris: Le Pommier.)
- 伍啟鴻與陳榮泰譯，2018，《寄生者：人類關係、噪音、與秩序的起源》。新北市：群學。(Michel, Serres. 1980. *Le Parasite*. Paris: Grasset & Fasquelle.)
- Strasser, Susan. 2000. *Waste and want: A social history of trash*.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Thompson, Michael. 1979. *Rubbish theory: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Pp.34-56&77-1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著、李華夏譯，2007，《有閒階級論：一種制度的經濟研究》。臺北：左岸文化。(Thorstein, Veblen,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Macmillan.)
-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4, *State of the world 2004: Special focus: The consumer society*.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 鄭益明、李根芳等譯，2010，《2010 世界現況：文化轉型：從消費主義到永續》。臺北市：看守台灣研究中心社團法人看守台灣協會。

二、專書論文

- Bataille, George. 1997. "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 Pp.167-181 in *The Bataille Reader*, edited by F. Botting and S.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 Barles, Sabine. 2014. "History of Waste Management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Waste." Pp.199-226 in *The Basic Environmental History*,

- edited by S. N. S. Mauro Agnoletti. Switzerland: Springer.
- Crutzen, Paul J. 2006. "The "anthropocene"." Pp.13-18 in *Earth system science in the Anthropocene*, edited by Eckart Ehlers and Thomas Krafft. Heidelberg: Springer.
-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Pp.87-104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d, Myra J and Alexander Zahara. 2017. "The arctic wastes." Pp.121-146 in *Anthropocene feminism*, edited by R. Grusi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 Ryan, Peter G. 2015. "A brief history of marine litter research." Pp.1-25 in *Marine anthropogenic litter*, edited by Melanie Bergmann, Lars Gutow and Michael Klages. Cham: Springer.
- Singh, Ram Lakhan and Pradeep Kumar Singh. 2017.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p.13-41 in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edited by R. L. Singh. Singapore: Springer.

三、期刊論文

- 林崇熙，1998，〈免洗餐具的誕生：醫學知識在台灣的社會性格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2)：1-37。
- 許雅斐、葉穎超，2004，〈抗爭下的環境「異議」：大林反焚化爐事件分析〉。《政策研究學報》(5)：145-199。
- 梁瓊尹，2005，〈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史耘》(11)：117-134。
- 黃厚銘，2010，〈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社會理論學報》13(1)：1-35。
- 楊志偉，2020，〈傅柯權力與生命關係論述中的醫療與健康〉。《中外文學》49(3)：59-103。

- 潘淑華，2008，〈民國時期廣州的糞穢處理與城市生活〉。《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67-95。
- 藤枝繁, 小島あずさ and 兼広春之, 2006, "ディスポーザブルライターを指標とした海岸漂着ごみのモニタリング." 廃棄物学会論文誌 17(2): 117-124.
- Bauman, Zygmunt. 2001a. "Excess: an obituary." *parallax* 7(1): 85-91.
- 2001b, "Consuming Life." *Consumer Culture* 1(1): 9-29.
- Curtis, Valerie A. 2007. "Dirt, disgust and disease: a natural history of hygien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61(8): 660-664.
- Derraik, Jose GB. 2002. "The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by plastic debris: a review."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44(9): 842-852.
- Gabrys, Jennifer. 2009. "Sink: the dirt of system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7(4): 666-681.
- Gregson, Nichy and Mike Crang. 2010. "Materiality and waste: inorganic vitality in a networked worl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2: 1026-1032.
- Guiltinan, Joseph. 2009.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destructive creations: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lanned obsolesc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9(1): 19-28.
- Hird, Myra J.. 2012. "Knowing Waste: Towards an Inhuman Epistemology." *Social Epistemology* 26(3-4): 453-469.
- 2013. "Waste, Landfills, and an Environmental Ethic of Vulnerability."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18(1): 105.
- Hird, Myra J., Scott Lougheed, R Kerry Rowe and Cassandra Kuyvenhoven. 2014. "Making waste management public (or falling back to sleep)."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4(3): 441-465.
- Kane, Ian A, Michael A Clare, Elda Miramontes, Roy Wogelius, James J

- Rothwell, Pierre Garreau and Florian Pohl. 2020. "Seafloor microplastic hotspots controlled by deep-sea circulation." *Science* 368(6495): 1140-1145.
- Liboiron, Max. 2015. "Redefining pollution and action: The matter of plastics."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21(1): 87-110.
- Lucas, Gavin. 2002. "Disposability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7(1): 5-22.
- Mandziuk, Roseann M. 2010. "Ending Women's Greatest Hygienic Mistake": Modernity and the Mortification of Menstruation in Kotex Advertising, 1921—1926."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38(3/4): 42-62.
- Parsons, Liz. 2008. "Thompson's rubbish theory: exploring the practices of value creation." *European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8: 390-393.
- Ragusa, Antonio, Alessandro Svelato, Criselda Santacroce, Piera Catalano, Valentina Notarstefano, Oliana Carnevali, Fabrizio Papa, Mauro Ciro Antonio Rongioletti, Federico Baiocco and Simonetta Draghi, 2021, "Plasticenta: First evidence of microplastics in human placenta."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146: 106274.
- Reno, Joshua O.. 2014. "Toward a new theory of waste : From 'Matter out of Place' to Signs of Lif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31(6): 3–27.
- Rivera, Julio L and Amrine Lallmahomed, 2015,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planned obsolescence and product lifetime: a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Engineering* 9(2): 119-129.
- Walther, Bruno A, Alexander Kunz and Chieh-Shen Hu, 2018, "Type and quantity of coastal debris pollution in Taiwan: A 12-year nationwide assessment using citizen science data."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35: 862-872.

四、博、碩士論文

杜雅鈴，2000，《從拾荒到環保：資源回收體系的空間結構——以台南市為例》。

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玉墩，2007，《廢棄物永續管理策略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國立台北

科技大學環境規劃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怡瑩，2003，《環境風險，環境運動與媒體：以台灣焚化爐政策爭議的媒體再

現為例》。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孟瑜，2003，《結構鄰避現象：反焚化爐運動中的科技與民主》。新竹：清華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韋名，2005，《一般固體廢棄物管理政策施行成效評估——以台北市「垃圾費

隨袋徵收」為例》。台北：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大祐，2013，《垃圾的倫理化？台北都會區垃圾治理與資源回收體制的轉型》。

台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清和，2005，《拾荒者的空間經驗，從業歷程與性別差異》。台北：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五、其他參考資料

(一) 政府官方資料

行政院環保署，2019，《107年事業廢棄物申報量統計報告》。

——2019，《108年中華民國環境保護統計年報》。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資料庫，2020，營運中公有掩埋場掩埋場容量統計表

(https://data.epa.gov.tw/dataset/fac_p_02，取用日期：2020年10月21

日)。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7，《廢棄物清理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50001>，取用日

期：2020年3月4日)。

(二) 辭典

Hornby, A.S., 2007,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 (第 7 版)》。商務印書館、牛津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 2015,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線上辭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取用日期 2020 年 6 月)

(三) 新聞及雜誌資料

林健生, 2018, 〈中市焚化爐歲修, 草屯、竹山累積大量垃圾〉。公視新聞網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94775>, 取用日期: 2020 年 11 月 28 日)。

林靜梅 王德心, 2020, 〈台灣有 24 座焚化爐, 部分縣市垃圾扔無處可去〉。公視新聞網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77876>, 取用日期: 2020 年 11 月 28 日)。

風傳媒, 2019, 〈「雙十一」背後的环境災難: 幾十億件包裹帶來多少垃圾? 中國官方沒數據、也沒具體對策〉。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1934050>, 取用日期: 2020 年 8 月 6 日)。

黃煥彰, 2016, 〈偷竊未來一部曲—焚化爐底渣藏毒於農地〉。看守台灣

(<https://www.taiwanwatch.org.tw/node/1213>, 取用日期: 2020 年 11 月 28 日)。

Kunzig, Robert, 2020, 〈垃圾的終結〉。國家地理雜誌, 第 220 期, 2020 年 3 月。

Unkown, 1955, "Throwaway Living", *Life*, August 1, Pp.43,

<https://books.google.ca/books?id=xIYEAAAAMBAJ&printsec=frontcover&dq=Life+Magazine+August+1,+1955&hl=en&sa=X&ei=cwKzVKHwL4v5yQT3zoDACQ&ved=0CB4Q6AEwAA#v=onepage&q&f=false> (Date visited: April 30, 2020).

Parker, Laura, 2018, 〈塑膠〉。國家地理雜誌, 第 199 期, 2018 年 6 月。

Whitney Pipkin、蔡雅鈴 編譯，2018，〈海洋塑膠垃圾新威脅：入侵物種的歡樂郵輪？〉。國家地理。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6034.html>，取用日期：2020年9月)。

(四) 其他網路資料

綠色和平，2016，購衣習慣調查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E6%B8%9B%E6%B3%95%E7%94%9F%E6%B4%BB-2/>，取用日期：2021年1月25日)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20. “Methods for microplastics, nanoplastics and plastic monomer detection and reporting in human tissues”,
<https://www.acs.org/content/acs/en/pressroom/newsreleases/2020/august/micro-and-nanoplastics-detectable-in-human-tissues.html>.(Date visited: January 25, 2021)

The World Bank, Households and NPISHs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constant 2010 US\$) in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CON.PRVT.KD> (Date visited: August 6,2020)

Nichols, Megan R.. 2020. “The Top 10 Environmental Issues Should Make You Worry” in *Schooled by Science*,
<https://schooledbyscience.com/environmental-issues/> (Date visited: January 20, 2020)

Unkown, “Walter Hunt Biography (1796-1859)” in *How Products are Made*,
<http://www.madehow.com/inventorbios/90/Walter-Hunt.html> (Date visited : September 12, 2020)

Grom, Brenton. 2015. “Slaves of Fashion, Loafers of Industry: A History of Paper

Collars and the Men Who Wore Them”, In *Disposable America*,

<https://disposableamerica.org/course-projects/brenton-grom/> (Date visited :
September 4, 2020)

(五)、影像資料

柯金源，1993，〈海邊垃圾場 (017_海岸〔二〕)〉，數位島嶼。

<https://cyberisland.teldap.tw/g/qwhcsQptjYx>，取用日期：2021年1月25
日。

Pampers 電視廣告，196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AauCK9ox8>，取用日期：2020年8
月23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wICLJhMo>，取用日期：2020年8月
23日。

Swanson 電視廣告，195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wjNPpkTZA>，取用日期：2020年8月
23日。

D’Avella, Matt, 2016, 《極簡主義》 (*The Minimalism: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Important Things*)

Interview with Gerry Thomas, *History Channel*, Unkow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lkO8LIWrs>, (Date visited: August 23,
2020)

Du Pont, 1956, *Everything’s at its best in Cellophane*, in *Hagley Digital Archives*,

https://digital.hagley.org/dpads_1803_00417, (Date visited: August 23, 2020)

Kotex, 1923, *One Problem Less*.

<http://www.mum.org/kotadj23.htm>, (Date visited: August 23, 2020)

Swanson, 1950s, *I’m late -but dinner won’t be*.

<https://www.pinterest.at/pin/528328600018935535/>, (Date visited: August 23, 2020)

Swanson, 1950s, *How to catch the early, early show with an easy, easy dinner.*

<http://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13/08/peeling-back-the-foil-the-origin-of-the-tv-dinner/>,(Date visited: August 23, 2020)

Tulip Cups, Unkown, *Tulip Cups: The Cup with the Clean Taste*, in *Digital*

Repositories at Duke, <https://repository.duke.edu/dc/ea/A0481>, (Date visited: September 26, 2020)

